

《這，就是約翰·加爾文》

茜亞·凡赫爾斯瑪 著

王兆豐譯 / 張艷芬校

目錄

序	
第一部	上帝如此帶領我
第 1 章	1-2
第 2 章	2-3
第 3 章	3-5
第 4 章	5-7
第 5 章	7-8
第 6 章	8-11
第 7 章	11-12
第 8 章	12-14
第 9 章	14-16
第 10 章	16-20
第 11 章	20-24
第 12 章	24-27
第二部	屬於兩個城市的人
第 13 章	28-29
第 14 章	29-33
第 15 章	33-35
第 16 章	35-37
第 17 章	37-39
第 18 章	39-42

第 19 章	42-46
第 20 章	46-49
第 21 章	49-53
第 22 章	53-56
第 23 章	56-59
第 24 章	59-60

第三部 黑暗之後是光明

第 25 章	60-62
第 26 章	62-64
第 27 章	64-66
第 28 章	67-70
第 29 章	70-74
第 30 章	74-78
第 31 章	78-82
第 32 章	82-85
第 33 章	85-89
第 34 章	89-93
第 35 章	93-98
第 36 章	98-103

附錄

加爾文與宗教改革家們.....		103-104
加爾文的歷史地位	104-109

第一部 上帝如此帶領我

第一章

那女人和男孩從昏暗的5教堂裡走入「玉米市場」廣場的燦爛陽光之下，像往日一樣，廣場上熙熙攘攘，磨坊主賣完了麵粉後趕著驢子回鄉下去，大卵石鋪成的街上不時傳來馬蹄的響聲，走在人群中的那女人對這一切無暇顧及，剛才在教堂裡懺悔時的眼淚尚在她眼裡，嘴唇上也還在喃喃地向聖徒祈禱，人們稱她是個敬虔的女人，說她的虔誠猶如她的美貌，那就是說她的確很敬虔。

那半個身子藏在母親長裙裡的小男孩卻用他那雙敏銳的眼睛注視著周圍的一切，穿過鬧市後，他倆回到家裡，他們輕手輕腳地進門，因為家裡也是辦公室，坐在綠色含鉛玻璃工窗下的主人正在辦理教會的公事，熱拉爾·加爾文 [注：書 中法文

姓名均參照新華通訊社譯名室編輯的<法語姓名譯名手冊>] 是教會神甫和教士們的律師，又是主教的秘書。教會的工作人員總是在他家出出進進。他們不停地在他耳邊爭吵、吼叫，人人都想方設法要出人頭地；遇到麻煩時，他們就來找他們的律師幫忙。熱拉爾·加爾文在他這個要職上不知疲倦地為教會裡的人們工作。他精明能幹，人們都尊敬他，他尋求自己的利益也的確很精明。

這位教堂裡的律師在周圍的這個小小的世界裡奮鬥，自從離開老家以來他一直在奮鬥，他不願意象父親一樣做一個箍桶匠，整天和酒桶打交道，難道揮筆不比掄錘子要好嗎？他來到距老家半小時路程的挪揚城就再也不回去了。人人都說熱拉爾·加爾文很幸運，娶了美麗的富家小姐讓娜·弗朗，她父親是挪揚城裡退休的旅店老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叫謝爾，接著兩個孩子都夭折了，下面一個就是長著一雙敏銳眼睛的約翰，父母似乎都寵愛他，約翰生於1509年7月10日下午1點27分。接下來的是弟弟叫安東尼。小約翰才三歲那年，美麗的母親死於一場瘟疫。父親再婚後，他們弟兄三人又添了兩個妹妹。儘管加爾文很少提到他的童年，但他曾回憶寫到小時候的一次朝聖經歷：母親帶他走了兩個小時到河谷裡的一個地方去瞻仰聖安哪聖骨匣子，據說是主耶穌在地上的祖母。敬虔的母親抱起小加爾文，他吻了那個存遺骨的金盒子，周圍是燭光、鮮花和一張張朝聖者景仰臉面。據說這是一塊非常特殊的遺骨，固而此地總是擠滿了人。那時候，你不用走出挪揚城就可以找到其它的遺骨，每一處都被人虔誠地敬拜，那時，人什麼都信，據說那裡有施洗約翰的頭髮，主的一隻牙齒，舊約中的一點兒嗎哪，餵飽五千人剩下的碎屑等等，教堂裡有荊蒺冠冕上的一小段，還有一位叫矣盧瓦的聖徒遺物。神父們，修士們老是在為諸如這些遺骨遺物埋存何處而爭執不休，沒完沒了，連法蘭西議會都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小加爾文在這個皮卡迪省的挪揚市生活了十四年。這座城牆圍起來的城裡住了一萬多人。當時挪揚已是一座老城，主後五百年那裡就有一位主教。768年，查理曼大帝就在那裡被封為法蘭克國王；從十三世紀起，那座石頭砌起來的昏暗的大教堂，是城裡的龐然巨物。挪揚城裡神父、修道士、教士、主教助理和各種各樣的神職人員人滿為患，人人都盯著自己的利益，盤算著自己的進升；掌管眾人的是一位出身貴族的大主教昂斯特。大教堂是全城生活的中心。此外還有眾多的修道院和教

堂，每家都有一口鐘，每口鐘都不時的撞打。挪揚有這樣一種說法，你不可能連續說三句話而不被鐘聲所打斷，整個河谷地區處處迴響著鐘聲。尤其是到了節期，駛向奧斯河下游的駁船上，水手們的耳朵裡充滿了城裡傳來的合唱聲；被落日餘輝染成紫色的層層小山坡上，處處迴盪著教堂的鐘聲。

教會律師的老二就在這充滿遺骨聖物、頻頻節期、燭光、鐘聲、雕像的城牆之內長大，全身心都沉浸在此敬虔氣氛和母親那雙霧一般的眼睛之中。家裡那張寫字檯後面不時傳來父親的聲音，不是為教會人員安排獲得更多的葡萄，就是怎樣多收點麥子。這些人總是在抓東西，總是在設法變得富些，讓人更羨慕些。

晚上上床後，約翰的小腦海裡或許在想的是：那掛在大教堂裡十字架上只著一片布頭，真人一般高，流著血，頭戴荊蒺冠冕的主，在地上時他一點兒也不富有，會不會對這些在教堂裡為他工作的人們感動滿意？……看到他們穿著華麗的長袍，抓取、欺騙，是不是會高興？他會嗎？

第二章

熱拉爾·加爾文在為他的兒子們考慮將來。他需要錢讓他們受教育。他打算安排他們將來在教堂謀職，利用自己的關係，把他們列至教會的工資單上。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那時，一個孩子可以被任命為教會的職位，領取工資。只要請一個成年的神父做事並付給他一部分錢，其餘的錢家長就能留下。

實現此計劃要認識關鍵的人。這是違法的事，但法律常常是鞭長未及。伯努瓦作主教時才十二歲，蘭斯大主教任職時才五歲，挪揚的昂熱大主教十五歲就開始從教皇那裡領取一切的好處，人們對教會裡的這種罪惡的勾當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熱拉爾·加爾文認識挪揚的關鍵人物，他一直在為兒子們的位置留心。老大謝爾剛能在詩班唱歌就成了一家小教堂的神父助理。三年後，1521年5月小約翰獲得了他的第一個職位，他被任命在拉熱斯尼教堂裡任職。歲入三斗玉米，二十塊地的小麥，父親付給兩處的神父一點錢，其餘的就歸兒子們了，實在是樁美妙的安排。

十二歲的約翰莊嚴地在神父助理就職宣誓上簽字，剃了一個教士式的光頂，於是這個小傢伙儼然成了未來的神父助理。

只要有機會，神父助理的位置還可以換成更好的，十八歲那年在巴黎上學時，

約翰又謀到了另一美差，將原來的位罝傳給了弟弟安東尼；兩年後又換成了爺爺老家附近的彭雷維克的神父助理。

當時，昂熱主教的兩個侄子是約翰的好朋友，雖然這個教堂律師的兒子不屬於他們的貴族階層，這兩個男孩很喜歡他，約翰常在他們的大廈裡玩，他們教他騎馬。他們一起先是在私人老師那裡學習，後來又一起上了挪揚城裡的大帽子男校，那學校的學生們都戴一頂圓邊大帽子。

後來，在大帽子學校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學了，小昂熱們打算去巴黎學習，當時挪揚又鬧瘟疫，這也是離開挪揚的好理由，他們問約翰想不想同行，約翰非常興奮，父親也毫不猶豫地抓住此機會，教堂的教士們開會後還是同意了，雖然有些不情願，因為約翰一走，他的那份收入就泡湯了。

1523年夏，昂熱的孩子和教堂律師的兒子一起，帶著護衛騎上馬離開了瘟疫肆行的挪揚，向著西南方向約一百公里外的大都市----巴黎飛馳而去。

於是，十四歲的約翰·加爾文跨入了一個新的世界，加入了不同思想的人群。從此他再也沒有搬回到挪揚去。

第三章

挪揚城外的世界正在變化。當時帶著三重冠冕坐在羅馬寶座上的教皇是裡奧十世，他是歷代教皇中最不可一世的；據說他曾大言不慚地說：「基督的故事可真是叫我們名利雙收。」不管他說沒說過這句話，他確確實實是名利雙收----他的財富多得令人難以置信，藝術收藏也令人咋舌。此時，裡奧十世正在羅馬忙著建造聖彼得大教堂，但錢卻來得不夠快。於是他策劃出一個聚財妙計。教皇宣告說，誰要是為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捐錢就可以獲得一張證書，說他的罪可得赫免。這種贖罪卷也可以用來替那些已經死去據說等候在煉獄裡的親人贖罪[煉獄是羅馬天主教人為發明的，根本沒有聖經根據]。1513年約翰·加爾文4歲那年，一個名叫特謝爾的修道士正在德國境內兜售贖罪卷。特謝爾修道士的到來激起另一個修道士馬丁·路德站了出來，後者是位神學博士，在威登堡大學教書。馬丁·路德開始教書那年，加爾文尚未出生。1517年這個挪揚的小男孩八歲時，威登堡大學的教授在威登堡教堂大門上釘上了九十五條抗議書。路德宣告說，贖罪卷的錢決不能贖罪。赦罪是上帝賜下

的白白禮物。威登堡教堂的鐘聲敲響了許多人已經準備好、正在等候的宗教改革的戰鼓。

在瑞士的山區裡，烏裡奇·慈運理已經準備好。米蘭來的參孫修士此時正在瑞士推銷贖罪卷。慈運理的講道如此有力，以至參孫被絕於蘇黎世城門之外。蘇黎世邀請慈運理任該城格勞司·慕斯特教會的牧師。他有系列地按聖經宣講上帝的話。他所講解的聖經是人們幾個世紀來未曾聽到過的；人們也一直未曾讀到這聖經。1516年，偉大的荷蘭學者伊拉斯馬在巴塞爾出版希臘文新約，那實在是件奇妙的事，這本失喪的聖經被重新找到了。

此時，一千五百萬人口的法國也在發生變化。這裡，宗教改革由一位索邦大學[當時歐洲最出色的大學，巴黎大學的前身]的著名教授勒菲浮發起。這位出生於皮卡迪省的學者去過非洲、亞洲。他在巴黎寫作、任教，七十歲的勒菲浮重新找到了聖經的真理。

1512年，當路德尚在尋找靈魂平安，三歲的加爾文還在步履蹣跚地跟著母親去朝聖時，勒菲浮出版了拉丁文的保羅書信以及註釋，老教授強調：「上帝說『唯靠恩典』。」

他的學生中有一個來自山村的紅鬍鬚小伙子威廉·法雷爾，他充滿活力，無所畏懼，說起話來快而有力，他也在尋找，一天老教授對他說：「我的孩子，我們靠的完全是恩典。」法雷爾幾乎頓時以信心的眼睛看到了老教授的。從這天起，法雷爾以火一般的熱情到處傳講神話語的真理，勒菲浮對法雷爾說：「你會親眼看到，上帝要改變這個世界。」

也有其他人跟隨老教授回到聖經中去，巴黎附近的莫市有一位名叫布裡科尼的主教翻開聖經，看見了新的答案。他開始在自己的教區裡進行改革，他按聖經教導人，這在教皇的教會裡是前所未聞的。布裡科尼主教是位有影響力的人，在皇宮內也很受歡迎。他在皇宮裡講同樣的信息，國王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也轉信了。主教把聖經交在她手裡。

人們異常興奮。勒菲浮將新約聖經翻譯成法文，讓普通百姓自己讀。他來到莫市受到主教的鼓勵。法雷爾也來到此地，忙於在人群中工作。毛紡廠、釀酒廠的工人

們，周圍地區的農民們都在閱讀、談論聖經，他們的教會改變了，他們的生命改變了。那時，人們稱轉信聖經的人是「喝了莫市井裡的水」。

隨著新的信仰在法國傳開，敵人起來要撲滅她。其中有兩個身居高位的，一個是索邦大學校長，老奸巨滑的諾矣爾·貝達，另一個是貪得無厭的法國總理安東尼·杜帕雷。他們先是辯論加威協，最後就用火刑、絞刑來迫害。

感情易變的法蘭西國王弗朗西斯一世則處於中間位置。有時，他會聽妹妹瑪格麗特的話，後者會身心地接受新教的信仰，並一直為新約的人們求情。但更多的時候，弗朗西斯受到貝達，杜帕雷一夥施加的壓力，說他背叛神聖教會，允許可怕的異端在他的國家裡興起。

弗朗西斯一世比當時絕大部分向教皇彎腰的國主們更強硬些。法國不向教皇彎腰，歷代法蘭西皇帝常與教皇討價還價，有時還逼教皇同意他們。但由於對新教的壓力不斷增加，勒菲浮被趕出索邦大學。1525年，他的作品被定罪，他翻譯的新約被當公焚燬，但他卻繼續在莫市工作。路德寫的書開始被偷運進法國，並被翻譯成法文，它們都被列在索邦的禁書黑名單上。黑名單上也包括瑪格麗特公主寫的一本小冊子。此外還有許多被列為異端的讀物。任何人被發現擁有此類書籍都會付上重價，但人們還是照讀不誤，印刷機秘密地繼續印刷，整個法國都到處於激烈的衝突之中。

1523年夏，約翰·加爾文和他的同伴們來到的就是這時候的巴黎。他在巴黎又曲又窄的街巷裡找到了叔叔家。8月的巴黎上空正升起焚燒活人的黑煙：普拉斯·格雷夫一位轉信的奧古斯汀修士因「路德派異端」被判火刑，他是許多因信仰走上火刑架的人們中的第一人。

第四章

在巴黎的瑪爾謝學院有位名叫科爾迪耶的老師，專愛教新生。這位曾作過神父、聞名於法國的教師說：「我寧可教新生，給們打下良好的拉丁文、法文基礎。」約翰·加爾文是那些有幸在科爾迪耶門下受教的男孩們中的一員，在拉丁文和法文上打下了好基礎。後來加爾文以流利的拉丁文和生動活潑的法文寫作時，他對科爾迪耶為他在語言上打下的良好基礎表感謝；27歲那年更將他的《貼撒

羅尼加前書註釋》獻給老師。在前言中他寫道「邀請您來一起分享我的勞動成果是應當的，那年父親送我到巴黎時我還是個孩子……上帝的護理如此安排，我競有幸受教於您，使我學到了真正的學習方法。」那個14歲的男孩也給46歲的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科爾迪耶被這個學生深深所感，多年後，老人還來到加爾文辦的日瓦內大學任教。

塞那河岸巴黎的眾多學院中有所叫蒙太舉的神學院。她是巴黎最古老、最昏暗也是最骯髒的學校。加爾文結束了瑪爾謝三年愉快的學習生活後轉入此校。蒙太古是所名校，但之所以出名是因虱子、糟糕的飯食和用鞭子懲罰學生。任何人都不准說一個法文字，昏暗的走道裡唯一能聽到的只有拉丁文。學生們早上4點就得起床開始上課，加爾文每天早晨只得摸黑從叔叔家騎馬去學校。

那位著名的學者伊拉斯馬在回憶他在蒙太舉上學時感憾地說：「你不知道我在那兒吃過多少個臭雞蛋」法國大文豪拉伯雷稱男孩們黑卡袍上，宿舍牆上成堆的虱子為蒙太舉的「小黑俠」。

校長的名字叫湯培特，學生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暴風雨」[註：湯培特與暴風雨一字諧音]，他的前任就是索邦大學校長、臭名昭著的「異端獵手」貝達，貝達當時還到蒙太舉教拉丁文辯論法。「豬是怎樣被牽到市場上去的？是那根繫在它脖子上的繩子呢，還是拉著繩子的農夫呢？」諸如此類以及其它嚴肅的題目是他讓學生們花上幾個小時進行辯論的。

加爾文奮發學習，拉丁經典、邏輯學、教會先父如奧古斯汀、阿奎那的著作等等，門門功課均極出色，18歲那年便獲得了碩士學位。他的胃不好，劇烈的頭痛常常折磨他，但他那顆年青的腦袋勝過了這一切。這是一顆敏銳、嚴謹，已經準備好了的腦袋。

在那些緊張的年頭中，好在他有不少朋友----有少年時代的好友昂熱主教的侄兒們，從挪揚來的表弟羅貝爾也在巴黎，他稱表弟為奧利維坦。我們不知道這對表兄弟多少次在一起談論、辯論關於羅馬天主教，關於勒菲浮、路德所發現的聖經真理。

加爾文在巴黎也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像他這樣一個孤身住在巴黎的男孩子竟能博得許多重要人物的厚愛，是件令人驚訝的事。例如國王的瑞士籍御醫，學識淵博

的科普。加爾文是他四個兒子尤其中是其中的尼古拉----的摯友。他是科普家的常客，常在他們家聽到各種令人著迷的新思想的討論。他的另一位好友是紀堯母·布迪的兒子，因此他也是法國最著名的新思想家家裡的座上客。他還有許多非同尋常的朋友。看來，人們也把這位挪揚來的年青人年看作是非同尋常的。

第五章

在加爾文的五年學習生活裡，歐洲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1525年弗朗西斯一世在與聖羅馬帝國的查理五世的一場重大戰役中戰敗，被囚於馬德里，在忿怒與羞辱中被關了一年。後來以自己的二個兒子作人質才獲釋。對法國來說，這是一個出乎意料的失敗。在他被囚的這段時間裡，他母親路易攝政，她對異端毫不留情，使得索邦有了靠山。

老教授拉斐勒菲浮逃亡萊茵河畔德國的斯特拉堡，法雷爾流亡瑞士的巴塞爾，但莫市的布裡科尼主教卻動搖了。他曾領人到真理面前，自己卻缺乏勇氣為追求直理下監牢、去流亡、走上火刑架。他向貝達、向索邦低頭，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命令他教區內的抗羅宗牧師們閉上嘴。於是他保住了主教的頂戴，這頂漂亮的帽子使他仍擠身於法國的八十三位主教之列。

然而莫市的百姓卻讓他們的主教羞顏：他們不懼怕火刑，有位叫德尼的在走上火刑架之前斥責了他的主教，年青小伙子帕文尼站在柴堆上的那番感人的演說，令一位索邦博士感歎說：「我真希望帕文尼什麼都沒說。假如能讓他閉上嘴，哪怕教會需要付出百萬金幣也應在所不惜。」另一位人稱「利夫裡的獨居修士」在被火刑焚燒時，巴黎聖母院敲起大鐘吸引人閃來圍觀。毛紡工人勒克萊因被熱情誤導砸了聖像，為此，他被燒紅的大鉗子活活撕裂，再被焚燒。當時在巴黎做學生的加爾文難道會一次也沒有在人群中目睹這種酷刑嗎？

在羅馬，裡奧教皇的後任克雷芒七世也陷入麻煩。他敗於查理五世後被囚禁於凡帝囚的城堡裡七個月。1527年查理五世的軍隊攻入羅馬城，大肆掠奪。士兵們穿上大主教的紅袍，帶著主教大帽騎馬在街上招搖過市，教會的文件被撕成碎片來餵馬，藝術珍寶遭毀，一些粗野之輩甚至下到教皇尤里烏斯二世的墓穴裡，拿走死者手上的戒指。

在克雷芒尚未與查理五世達成協議獲釋之前，一個英國代表團來到遭劫的羅馬。原來英王亨利八世想要休掉元配凱瑟琳皇后。教皇自己已有夠多的麻煩，又怕得罪查理五世，便對英王的要求予以拒絕。亨利八世另出一招，設立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大主教宣告此婚姻無效，成全了亨利的離婚。次年，亨利八世自封為英國教會之首，與羅馬教庭決裂。從此，英格蘭走上了抗羅宗〔註：抗議羅馬天主教的基督教新教〕的道路。上帝使用一場離婚風波改變了一個帝國的信仰。

不僅是帝王們、教皇們陷入麻煩，挪揚城的熱拉爾·加爾文也陷在他的麻煩之中。不知何故，他拒絕交出一部分賬本記錄，教會的人被他們的律師惹惱了。或許他也被他們那些貪婪、骯髒的勾當所惹惱，他決定改變在兒子身上的計劃，要他成為一名律師。加爾文多年後回憶說：「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父親送我去讀神學，但後來他認為從事法律的職業可以致富，於是改變主意，叫我轉去學法律」。

馬丁·路德被父親逼著去學法律，但他卻自作張主去了修道院。有趣的是，加爾文從未違背父親為他前途作的安排。他聽命於父親，離開巴黎去了奧爾良。奧爾良大學的法律系很著名。

1528年，就在加爾文離開巴黎時，一位衣衫襤褸的西班牙人來到巴黎。他是37歲的羅友拉。他牽的驢子上滿載書籍，還帶了幾塊金幣和耶穌會的書面條例，他說這是聖母瑪利亞在巴塞羅那附近的一個山洞裡親口告訴他的。此人後來被羅馬庭冊封為嚴格而強大的耶穌會的創始人，而那個正離開巴黎，尚未寫成他的巨著的年青人日後則成為抗羅宗陣營的傑出領袖、重新找回上帝語話真理的衛士。

第六章

奧爾良是個美麗的地方。大學生們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那裡有40片網球場供他們比演、消遣，一條大河任他們駕駛帆船，還有沒完沒了的酒席、宴會。法律學教授萊斯圖瓦勒的大名吸引了各國的學生。

但那個從挪揚來的學生沒有加入這群娛樂之眾。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他比在巴黎時更發奮地投入學習。為了保持一晚上清醒的頭腦，他幾乎不吃晚餐，每晚只讓自己睡幾個小時的覺，清晨醒來在床上躺著回憶昨晚所學的東西，訓練記憶力、增加知識。一年之內，加爾文便以法律老師而不是學生而聞名，教授不在時，讓他

教。

他學的不止法律，奧爾良有位來自德國的出色的希臘文教授沃爾馬，他學過路德的思想。加爾文在沃爾馬那裡學希臘文，掌握希臘文後，他可以從原文研究新約聖經。他也貪婪地閱讀各種希臘文書籍。或許，沃爾馬在教這個學生希臘文的同時，也向他指明新約聖經中那些對路德和宗教改革者們極為寶貴的經文的意義。

後來他將他的《哥林多後書註釋》獻給了希臘文老師，加爾文感謝地說「我在學法律的時候，有幸受教於您而學希臘文」。

一年後加爾文離開奧爾良去布爾熱。這座城曾被凱撒大帝所毀，由查理曼大帝重新建，現在屬瑪格麗特公主所管的納瓦爾省境內，公主從意大利邀請了著名的法律學教授阿奇艾迪來她的大學講課，跟隨路德的希臘文教授沃爾馬也被邀來此任教。這是受瑪格麗特的保護也比較安全，許多學生慕阿奇艾迪的名而來生。加爾文也隨眾人來到布爾熱。在沃爾馬家裡，他遇到了一個學希臘文的小學生。當時加爾文二十歲，那個十二歲的小男孩西爾多·貝查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在一個他倆都尚未去過的地方，他會站在加爾文身邊，並成為他的接班人。

1531年加爾文回到巴黎短住。聽說父親病重，教會律師的兒子立刻趕回挪揚。綠色玻璃窗後面異常寧靜，但教會的人不顧他們律師的疾病，仍然來和他糾纏、爭吵。此外，大兒子謝爾已成為本地的神父，與他教會的同事們也不和。1531年5月熱拉爾·加爾文在此種種陰霾下去世。據說他的兒子們不得不向教士們乞求，讓父親的屍體得以埋在教堂的墓地而不至於落於荒野。

那年加爾文二十二歲。父親死後他又在挪揚住一個月，他和哥哥將父親拒絕上交的賬本還給了教會。加爾文在他掛名領薪的彭維雷克小教堂為父親主持了追思。在家期間，哥哥向他述說、抱怨教會人的不滿，或許兄弟倆也曾暗地裡取笑挪揚主教的大鬍鬚。雖然當時教會的法律中規定不准留長鬚，主教大人卻執意不從。一個禮拜天早上，主教身著華麗的大袍、戴著主教冠、手持金十字架來到教堂門前，教士們卻當面請他吃了閉門羹，他只好回家。

他們哥倆也有機會討論老教授勒菲浮的思想、路德的小冊子、固執的貝達和其索邦的同事們、老奸巨滑的弗朗西斯和他敬虔的妹妹，巴黎、莫市的火刑等等。

這也是一段思考的時間，父親去了，加爾文可以自由地為自己作出選擇，他既

沒有轉向貪婪而陳規戒律繁多的教會，也沒有轉向法律，他的理想是要成爲一個學者，爲此要更多地學習希臘文、拉丁文，閱讀更多的經典著作，做研究寫文章。除了需要一點兒錢租間安靜的小屋子，買點裹腹之物外，就可以躺進堆滿書籍的屋子裡，用墨水寫出自己的思想、見解，除此之外，誰還會有更多奢望呢？

要過這樣一種生活，就非得去巴黎。弗朗西斯最近使巴黎變得對學者們更具吸引力，在布迪的催促之下，這位法國皇帝辦起了皇家學院。這一決定使索邦大感不快，因爲弗朗西斯對時下流行歐洲的人文主義新思想很感興趣。

人們開始自己思考問題而不是由教會來替他們思考。那些有學問的人閱讀古典拉丁、希臘的智慧，以此來作爲他們自己思想的基礎。這種新的人文主義思潮不是基督教的，但卻具有其偉大的價值，她鼓勵人們獨立思考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教會告訴他們的。人們開始從學習聖經中發現許久以來被教會忽略的、藏起來的東西，上帝用這種新的學習方式，在許多人的生命中將他們帶回到他的真理上來。

加爾文步行了一百公里從挪揚去了巴黎，決心要成爲一名學者。到巴黎後，一位朋友願意爲他提供住處，但他謝絕了。他在福爾泰學院宿舍裡租了一個房間，那裡離學校很近，他可以直接去聽課。宿舍是一排排又小又窄的斗室，他住在樓上。許多像他一樣的學生、老師們都在此生活、學習。

加爾文一頭扎進了希臘文、拉丁文和希伯來文的學習，白天去聽課，晚上點支蠟燭到深夜。他埋頭學習、研究、寫作，也又一次進入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朋友圈子，進入那些像他一樣的學者們中間，他又回到御醫科普的家，加入布迪家裡的那些討論，這難道不就是他所嚮往的生活嗎？

正當加爾文埋在巴黎的書叢中的時候，蘇黎世的改教家慈運理死於戰場上。他作爲蘇黎世抗羅宗軍隊的隨軍牧師上前線，迎戰進犯的瑞士其它地區爲天主教而戰的軍隊。當時他正跪著安慰一個傷員，被人用槍從背後刺死，敵人咬牙切齒地將他分屍、焚燒，那天是1531年10月11日。

但那個在巴黎的學生即使聽到卡普爾戰場上的這個消息，也不太可能予以重視，他正深深的埋在書堆裡，沉浸在自己的寫作中，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天他會成爲慈運理的國家的一員，成爲比這位在路邊被刺死的48歲的改教家更著名的改教家。

第七章

七、八個月的辛勤勞動之後，書寫成了，這還不包括他上課、學習所花的時間。加爾文懷著一種青年學者的驕傲將手稿交給印刷商。他賣掉自己一點可憐的東西，借了一部分錢才湊足印刷費。他將此書獻給了童年好友克羅德·昂熱----挪揚主教的侄子。此時的克羅德已成為挪揚的聖矣盧瓦修道院院長，加爾文寫到「請收下我的第一個果子，她理應屬於您，我和我的所有都有負於您，我是在您府上長大的。」

1532年4月，加爾文的書出版了，這是一本關於羅馬哲學家西尼加的論著，西尼加生活在使徒保羅時期的。讀古代名人的作品，然後寫上篇評論，這是時下文人們的風尚。作為一個22歲的年青人，加爾文的《西尼加註釋》可算是驚人之作。他以優美的拉丁文寫成，除了引用當時的作家之外，加爾文引用權威的66位拉丁文學著，22位希臘文作家，7位教會先父的話，但整本書裡只有三處不重要的地方引了聖經經文。

可是這本書鮮為人知，賣不出去。加爾文求朋友們去買他的書，去推薦給別人，請他們的教授使用。他還寄了一本給巴塞爾的大學究伊拉斯馬，但還是賣不出去。作為一個新作家，不被重視已經夠糟的，所欠的印刷費更是雪上加霜。

無論如何，過這種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是他自己選擇的，不是嗎？不過，去完成因父親去世而中斷的法律學業或許不是件壞事。一大堆書和一點個人家當被運往奧爾良，他本人則只好步行相隨。

這個瘦瘦的，才華橫溢而從不參加宴會的學生仍留在奧爾良大學人們的頭腦裡。皮卡迪省來的學生們尊敬加爾文，選他來做他們的生活管理員，可是當他把本應用來舉辦慶賀他當選的宴會的錢交給圖書館用以購書之後，學生們大為不滿，不過他們對他還是很尊敬。

加爾文在奧爾良又學習了一年，第二年匆匆趕回挪揚，因為哥哥與教會的矛盾越鬧越大。他的法律課業眼看就要完成，可是他顯然沒有等到他的博士學位。在家鄉的玉米市場廣場上，他目睹了反異端、反路德的抗議活動。他參加了一個神職人員會議，因為他是正式列在他們名單上的，他到底替哥哥做了些什麼我們不知道。

1533年9月，加爾文回到巴黎，住在一個叫艾蒂安·拉福爾熱的布商家裡，他的

住處叫鵜鴿之家，三個月後加爾文從巴黎逃亡。

第八章

巴黎人民被鼓動起來了。巴黎大學校長尼古拉·科普在一年一度的聖徒節中對全校發表講話，他沒有提聖徒和教會的事，而是從「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開始，講到福音與上帝的白白恩典，他反對那些對回到聖經去的人們的迫害。他引用了伊拉斯馬的話，這在索邦是被查禁的。他的有些話聽上去很有力，像是路德說的，但他沒有說明那是誰說的。

索邦的教授們暴跳如雷，二個修士直奔議會要求立即法辦校長。他們找不到國王，因為他去了馬賽，為他第二個兒子與教皇的外孫女的婚事作安排，那姑娘剛巧乘船來覲見國王。校長的演說中還有件奇怪的事，人們私下議論說他的講稿採納了或是得到了一個叫約翰·加爾文的年青學者的幫助。不管怎樣，尼古拉·科普與加爾文間的友誼已有十年之久，他們常在一起，現在索邦發難了，怎麼辦呢？

1533年11月下旬，在那篇演講的一個月之後，科普正在列隊往皇宮去的學者們中，他身穿校長禮服，司儀手持金杖走在他前面，他要去回答議會的傳問。突然一個送信的跑來，交給他一封議員朋友的信，叫他立即逃命，索邦已經說服議會不可放走他，國王不在巴黎，救不了他。

尼古拉轉進一條巷子，扔掉帽子、袍子，消失在一群幫助他的學生之中。一小時後，化裝溜出了聖馬丁城門，他在急忙逃離中把大學的印章都帶在了身上。

這下子警察局長惱羞成怒，他下命法警們不惜一切代價抓住加爾文。可學生們又一次勝了當權者，幾個學生在樓梯口與法警糾纏，另外幾個用床單將加爾文從後窗吊了下去。加爾文躲進一個朋友家，他家有個葡萄園，他穿上打工的衣服，肩上扛著把鋤頭走出巴黎，法察們只逮到了加爾文的書。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使加爾文變成了一名通緝犯？直到這時，人們還不知道加爾文是誰，既使知道，也就是一個才華出眾的學生、年青的作家、新興的學者、一個將來要成為神父的年青人，他與尼古拉·科普分享的這些新思想令索邦怒不可遏，他們不明白他的這顆心是如何被擄去的。

加爾文聽到這些新思想已經很久了。他讀過勒菲浮、路德、慈運理的書，他從

表弟那裡聽到許多，也與他爭論了許久，他從深為敬佩的希臘文老師沃爾馬那裡聽過許多，也從哥哥的抱怨中聽到過，後來哥哥以"異端"被趕出教會。他在用學到的希臘文、希伯來文從原文聖經裡學到了許多。近來，他目睹了火刑架上的烈士，也在房東的家裡看到了人們將這些新思想付諸行動。這裡成了各地基督徒的秘密碰頭地點。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加爾文的心都沒有為此真理準備好，他說：

「我最大的心願就是享受寫作安寧，過一種自由而有名譽的生活。雖然我有過片刻的安寧，但離真正的心靈平安卻相去甚遠……我越是仔細省查自己，我的良心越是被擊打，試圖將一切都忘掉便成了我最大的安慰……我已經開始在追求走自己的道路，一種完全不同的教義傳開了，這不是要帶我們離開基督教信仰的教義，而是將我們帶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義，是要除去渣滓回到當初純潔的教義。乍一聽到此教義時，它的新奇令我很感刺耳，我承認一開始我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去聽的，我曾大動感情地竭力抵抗……我承認，至今為止我的一生都在無知與錯誤之中，最後我認識到，這就像一道亮光突然照亮了我。我這才發現所陷入的是一個充滿謬誤、藏污納垢的泥潭，我所沾染的是何等的骯髒與污穢，我恐懼戰驚意識到自己落入的可憐、可悲的光景。面臨那永死的威脅，我不得不立即下了決心。我首要的工作就是致力於神的道路，我以眼淚、痛悔遣責自己的過去」。

這段話是加爾文在尼古拉·科普的演講六年之後寫信給一位主教時說的，他是以前一個轉信抗羅宗的口氣說的，這也是他本人的經歷。他自幼在教會長大，奮發學習，寫作要想成爲一名人文主義的學者，他努力奮鬥是要尋找平安，就像保羅去往大馬士革的路上一樣，儘管很頑固最後不情願地被上帝轉了過來。

加爾文在他的《詩篇註釋》的緒中這樣寫道：

「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變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間燃起強烈的願望，要在真道上長進。雖然，我未完全放棄其它的學習，它們對我卻不像以前那有吸引力了。」

這樣看來，這一「突然」轉變一定是發生在他寫完《西尼加註釋》一書之後，因爲他在此書中極少提到聖經。最有可能的是發生在他在奧爾良的最後幾個月的學習期間，或許他被那光照亮是當他住在敬虔的鵜鴿之家主人拉福爾熱家時發生的。

不管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個未來的神父、律師、學者的約

翰·加爾文已不復存在，此時站立著的是基督耶穌的僕人約翰·加爾文。

第九章

自從十一月他肩扛鋤頭化裝成葡萄園工人走出巴黎以來，加爾文一直在流浪。先是悄悄地來到挪揚住了幾天，這時瑪格麗特公主聽說了他險些被捕的事，就說服已回到巴黎的國王，對加爾文施憐憫，於是加爾文溜回巴黎，受到瑪格麗特的親切接見。或許他離開巴黎時還在拉福爾熱家停了一下。

他去了安古萊姆，找到他的朋友、同班同學路易·杜蒂耶的家，後者是當地天主教會的教士，對勒菲浮的思想表示同情。他家的房子很大，從父親那裡繼承了4000多本藏書，在當時可算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圖書館了。加爾文在此受到歡迎，並住了幾個月。他化名謝德矣斯維。逃亡期間，他共用過9個不同的名字。

杜蒂耶的圖書館是個理想的安靜學習之處。加爾文全時間投入信仰學習之中，那是照亮他的光。他在那裡過得很愉快。他在寫信給奧爾良的朋友弗朗索瓦·達尼矣爾時說「從經驗中知道，我們對自己前面的路是看不清的。當我正在為自己設計要過一種安寧自在的生活時，那最沒料到的卻臨到我。在我看來是很糟糕的情況下，卻有一個安靜之處為我預備，完全出乎預料之外，這是上帝的工作。向他委身的人，他一定看顧」。

但人們卻沒有讓這個化了名的人留在他的安靜窩裡。來杜蒂耶家的知識分子們來找他交談，神自己把他從書房推出來，到鄉村、到百姓家裡去。這個穿黑衣服的消瘦人影在各處出入，在人們家裡秘密聚會，在河附近的小山洞裡向那些渴望的聽眾傳講。人們不顧自己的安全尋找他，要聽這個遭追捕的人講。

1534年4月，加爾文去見他從未見過的老教授勒菲浮。老人已近百歲，此時受瑪格麗特的保護住在內拉克，他的最新法文版聖經剛印出來。站在他面前這個不到二十五歲的年青人，已成為那些回到聖經中的人們的領袖。老少兩倆都熱愛他們的祖國---- 法國，兩人都出生於皮卡迪省，此地以許多富有勇氣與自由思想的人們而聞名。老人是法國宗教改革的第一位領袖，他選擇了一條和平的路線，希望在羅馬天主教內都進行改革。據說在他最後的日子裡，老人為此而感到遺憾。有人說，他告訴眼前這個被火燃燒著的年青人，與索邦教會對抗是不可能的，要想把腐敗、迷

信的羅馬教會轉回到上帝的話上來是無望的。他會不會對加爾文說：「你要成爲在法國建立上帝國度的器皿？」他是否意識到他的領導擔子要落在這個年青人肩上？

沒有人知道他們倆，一個瀕死的老人與一個火焰般獻身熱情的年青領袖到底談了些什麼。此次見面之後，加爾文再一次去了挪揚，他已作了決定。

不是象老教授那樣徒然希望教會的內部改變，新信仰必須有新的教會。不，這不是新的信仰，也不是新的教會，這是老信仰，比主的十字架更老，曾一度失喪又被重新找回。那將要重生的教會必須要像那老的教會，像那五旬節之後的初代教會，基督的教會是根據神的話建立起來的教會。

離25歲生日還有兩個月，加爾文站在挪揚大教堂前，他從小就在此教堂的陰影下長大。他告訴那些驚呆了的神職人員，那些從小就認識他的人們：他不會成爲他們的神父，他也放棄他的一切收入。

1534年5月21日，挪揚最著名的兒子最後一次離開了城門，踏上那條通往巴黎的路，那條他少年時代走過的路，此後，他再也沒有回過玉米市場附近的家，他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沒有家也沒有教會。

第十章

加爾文整整流亡了一年，他的異端已經夠上火刑架。在此同時，另外有群人在追他，那是爲了要聽他教導、傳講真理的人們。他後來回憶說「神如此帶領我，他通過不斷改變的情形使我不得安頓在一個地方……」

最後一次離開挪揚後，他去了巴黎。在巴黎他離不開那些信徒們，他知道他們的暗號，秘密聚會點，他曾又一次回到拉福熱爾家。他小心地出入那些忠信的人家，教導、鼓勵、堅固他們。他多次在秘密聚會上講話，這些聚會有時會被警察的到來所中斷，他知道如何從後門小徑，從窗戶，從火槍射擊下逃入黑夜中。在那些日子裡，講道結束時，加爾文會將雙手高舉說「神若幫助我們，誰能夠敵擋我們呢」[注：羅馬書8：31]。那些被警察抓住的，下一次聚會時他們的位置就空著，他們被關在監獄中等候上火刑架，他們就爲這些話的真實作見證。

拉福熱爾催促加爾文離開巴黎，他告訴加爾文「你在這兒太危險，整個法國都需要你，抗羅宗沒有領袖，我們需要你，立即離開這裡。」

加爾文還是沒走，巴黎人民也需要他。此外，加爾文已與一個比他小兩歲的叫捨維塔斯的西班牙年青人有約要見面，此人否認三位一體神性，大膽地宣稱只有他一人掌握真理。他在德國四處活動，但沒有找到信任他的，便來到巴黎約定要見加爾文，想要改變他。加爾文如期赴約，他化裝來到預定的那所房子，焦急地等著那個西班牙人，但捨維塔斯沒有露面。十九年之後，他出現在瑞士，面對他約定要在巴黎見面的人。

離開巴黎後，加爾文先去了法國西部的普瓦圖地區，那裡有他的朋友，他先是在公園裡，後來在一個秘密山洞裡點著火把演講、教導。據說加爾文在此第一次分聖餐，桌子是一大塊平的岩石，儀式很簡單，就是按基督的話掰餅、喝杯，沒有羅馬天主教那套浮華儀式。

加爾文也在普瓦圖第一次派出三位宣教士出去傳道、教導。警察又一次臨近，有人告密，說有一個穿黑衣服的人住在這裡。加爾文逃到了安古萊姆他同班同學杜蒂耶家。人們又找到他，要聽他講。這個自稱為羞怯的人說「我無論躲到哪裡，哪裡就成了公開學校。」

下一站是他曾學過法律的奧爾良。在此，他完成了信主之後的第一篇出版物，那是一份用拉丁文寫的小冊子，書名叫《靈魂待蘇說》。他在書中反駁那些認為人死之後靈魂進入睡眠，直到最後審判的觀點。他說，人死之後靈魂雖離開身體，但卻是活著的、有知覺的。在奧爾良，他也為表哥奧裡維坦翻譯的法文聖經作了兩篇緒。這些言辭真切的基督教文章出自於新加爾文，完全不同與《西尼加註釋》裡的學者口吻。

此時，大批的張貼和單張秘密運進了巴黎和許多法國城市，它們是用法文寫的，抗議羅馬天主教的彌撒，1534年10月18日，這些張貼一下子出現在許多公共場所，甚至還出現在皇帝陛下臥室的手帕櫃裡。傳說這些都是那逃到瑞士去的紅鬍子改教家法雷爾干的，這些張貼上的語言是憤怒的，挑戰性的，上面也提到了弗朗西斯的大名。皇帝大為發火，決心要報復，羅馬天主教更是怒不可遏。一時間，監獄裡「貼佈告者」人滿為患，火刑的黑煙滾滾而起。他們又發明了一種酷刑，做一個來回搖動的架子，將受害人從火中搖進搖出，慢慢烤死。對於抗羅宗人士來說，法國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加爾文騎馬向東邊的德國邊境萊茵河方向走去，心裡還想找到安靜之處繼續他的研究、寫作。隨行的還有杜蒂耶以及二個僕人，杜蒂耶扔下了自己的工作和那些精裝書籍，跟著加爾文走了。

他們到了離巴黎三百公里的麥茲，一路上寒風刺骨，每晚住宿，在小店裡都有可能被人認出，遭人出賣，一路伴隨他的還有頭痛、胃痛。有天早上起來，他們發現一個僕人偷走了他們的錢袋，騎上馬逃之夭夭。他們一下子變得身無分文，。另一位僕人還不錯，借錢給他們可以維持到穿過邊境到斯特拉堡，那裡的抗羅宗傳道人是加爾文的朋友。馬丁·布塞爾牧師在也那裡，幫助那些逃離迫害的法國難民，加爾文從前曾替其中的一位給布塞爾寫過信。

或許斯特拉堡還是不太安寧，他倆又繼續往南走。據說加爾文在路上曾去見荷蘭學者伊拉斯馬，後者編輯了新版西臘文新約，為世界重新找回了新約聖經。但這位為宗教改革鋪路的偉大學者吃驚地發現他下的蛋，路德和慈瑞理卻孵出了一隻完全不同的鳥之後，以拉斯馬從重新找回的信仰中退回，與教皇和好。教皇以一頂紅衣主教的頂戴換了他的那顆心，他作為一名與羅馬天主教正式聯在一起的人文主義者留在歷史中。伊拉斯馬比加爾文大40歲，加爾文見他時已入暮年，不知他是怎樣與加爾文相見的。

1535年，馬背上的三個人來到巴塞爾。此地是瑞士文化，印刷中心，他們的流浪生活暫告一段落。他們在此住了一年多，加爾文終於找到了一個安靜之處，他從克萊茵夫人家租了間屋子，關上門，開始工作。他的化名叫馬丁那斯·路卡尼司，聽上去有點像是馬丁·路德的名字。巴塞爾只有幾個人知道這位路卡尼司是誰，其中一位就是當年的校長尼古拉·科普。自從那天他從去皇宮的路上消失，加爾文人窗口用床單逃命之後，他倆還未見過面。在這遠離巴黎的異鄉，他們一起互訴發生在祖國的那些殘酷的迫害。說起這些來真叫人心碎，一個膽小的人入獄後為了免上火刑架，供出了那些參加秘密聚會的人，他們雖未參予張貼那些海報，也都遭害。那位敬虔、慷慨地將自己的家作避難處的拉福熱爾上了火刑架，他太太則被投入監獄；那個殘疾的鞋匠米隆被慢慢地烤死，加爾文認識他，他自己不能走路，靠替人做鞋餬口；那個參加秘密聚會的富商杜波也未能倖免；石匠普瓦洛的舌頭被用鐵釘釘穿，綁在胸前走上火刑架，因為他不停地提到他的救主。巴黎的秘密聚會點許許

多多的位子空了。弗朗西斯對抗羅宗的態度完全變了，對妹妹的請求也無動於衷，唯一的寬容是將她的三位傳道人從監獄轉入修道院，其中兩人悔過了他們的抗羅宗信仰，轉回到羅馬天主教。第三位叫科爾博，已經半瞎，後來得以逃脫，最後也來到了巴塞爾，告訴加爾文巴黎的近況。

弗朗西斯編造謊言來掩蓋他的迫害。他知道，抗羅宗各國特別是德國若知道真相，會對他感到憤怒，他需要這些國家與他聯合來對付神聖羅馬帝國的西班牙查爾斯皇帝，他曾是其手下敗將。於是他寫信給德國王子們說，他所投入監獄、送上火刑架的是暴徒、惡棍，企圖分裂教會，分裂國家的重洗派之流，等等。

難道慷慨大方的拉福熱爾，殘疾鞋匠來隆，那些加爾文所熟悉的面孔以及許許多多主內的弟兄們，都是暴徒、惡棍嗎？在法國，沒有人可以為火中的人們說話，沒有人可以說出這些烈士信仰的真相，但是有一位法國流亡者可以。

住在科萊茵夫人家的這個法國人坐在桌前，羽筆飽蘸墨水，奮筆疾書，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在寫完六章之外，又加上了一封信作序，帶著稿子去到朋友、印刷商湯馬斯·普拉特那裡，印刷廠所在地有一個黑熊的標記。

第十一章

加爾文寫作爲序的收信人從未讀過這封21頁的信。這封拉丁文的信是這樣開頭的「獻給基督教之國國王弗朗西斯陛下，約翰·加爾文在基督的平安與救恩中誠願……」但這位國王陛下卻忙於與情婦們在舞池中，忙於與人策劃、結盟來對付他的敵人而無暇顧及。假如有人告訴他四百年之後，此書仍然被認爲是對人們思想的形成起決定作用的幾本書之一，他大概會讀的。弗朗西斯陛下做夢也沒有想到，那封寫給他的信會被視爲一本火焰般雄辯的傑作，競被譯成多種文字，擁有數以百萬計的讀者。

約翰·加爾文的《基督教信仰要義》並不是向法國皇帝的請求信，這本書是爲了幫助抗羅宗的人們認識聖經的真理。宗教改革時期無人將這些真理條理性地寫成書，路德的貢獻是將聖經譯成德文，他也寫了一些專題文章，羅馬天主教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宗教改革的人們有上帝的話，但誰來領他們認真地、整體地理解上帝的話呢？誰來向他們展示關於神、基督耶穌和聖靈，關於聖餐與教會，關於信心與禱

告，關於基督使徒生活中法律與自由呢？

當他的朋友們在烈火中的消息傳來時，這個躲在巴塞爾的法國人寫下了這本手冊。接著傳來弗朗西斯的謊言，加爾文突然意識到他可以對著全世界來捍衛那些被污陷人們的真正信仰，他也看到或許他可以來感動法蘭西皇帝那顆狡滑的心。這本書不是一本學習指導，而是那些法國烈士們在火焰中印上標記的信仰告白。加爾文在寫給國王的信中說：

「陛下，當我開始寫此書時，根本就沒有想到最後是獻給您的。我的原意只是要列出基本原則，教導那些對信仰有興趣的人們，什麼是真正的敬虔。我的主要目的是為我的法國同胞們寫的，是為那些飢渴羨慕基督的人們寫的……；但我看到您王國裡的一些惡人發出的狂怒達到如此高潮，使這片地竟容不下真正的教義。於是我以為當盡上薄力，在將這些教導寫給他們的同時，也向陛下您坦承我的信仰，好使您知道那些狂徒們為之暴怒，在學國上下揮舞刀劍、燃起烈焰的教義之真相……因此，我請求陛下-- 這並非是一個無理要求-- 對整個事態有個完整的瞭解，因為整個事情都被那些肆無忌憚、無視法律之輩攪得一片混亂。請不要以為我這樣做是要為自己辯護，為了我自己可以返回祖國，儘管我心中的思鄉之情猶存，此亦人之常情；但是眼下的情形令我對自己的處境無悔無怨，我的申辯是向著敬虔的人們，也是向基督……。陛下，您決不可對此正義的辯護置罔聞……此事大局攸關值得您的關注……值得您的皇冠……我何必贅述呢？認真地思考一下吧，陛下，思考一下我們的所言所行，將我們視為最不齒於人類是因為您不知道我們是因為信永生上宙而勞苦忍辱[提前4：10]，因為我們相信，認識唯一真神並他差來的基督耶穌就是永生[注約翰17：3]，正是因著這一盼望，我們中間有的被鐵鏈所捆，有的被皮鞭抽打，有的被拖來拽去作為笑柄；有的被殘忍地折磨，也有的不得不逃亡……」

加爾文以他那受過律師訓練的嚴謹思路對強加在抗羅宗頭上的罪狀一一列舉，一一辯護。他引用大量聖經經文，他引用教會先父們的話。有時他的言辭尖銳無情，雖然是在向皇帝提出申辯，但因為是為真理申辯，他不顧忌他所使用的詞語。

「我們是和平、誠實的人」他為自己和那些在法國被指控為鬧事者的人們辯護：「既使是在流亡中我們也沒有停止為您的國家和繁榮禱告，我們因著神的恩典

學會更能忍耐，更爲謙卑，更有節制。我們中間若有誰以福音爲騷亂的借口，您可依法懲辦，但您卻不可責怪上帝的福音。陛下……您若心平氣和地坐下讀一讀，我們就不會輕視您的重新開恩……這是我們的信仰告白，這是向陛下呈上的我們的辨護。反之，您的耳朵若被那些惡人的切切私語所充塞而容不得被控之人的申訴，假若那些肆無忌憚的狂怒之輩在您的默許、縱容之下，繼續以監獄、皮鞭、抄家、折磨、火焰施加迫害，我們就真的是如羊被牽到宰殺之地，被逼到極處，然而我們必以忍耐等候神大能的手，他的手必定在時候滿了之時拯救那遭難的，懲罰那些藐視他的人，儘管眼下他們是如此無憂無慮。願主，願那萬王之王以公義建立您的皇位，以公平堅立您的王國」。

這些是那位弗朗西斯皇帝未讀過的雄辯之詞。此後，這本稱爲《基督教信仰要義》的書不斷成長，就如一顆種子長出的樹，再版四次之後，全文由最初的六章發展爲八十章、四冊巨著。此八十章都基於那六章的種子。五十歲那年，疾病纏身的他奮力完成最後一版時與那個二十五歲躲在巴塞爾的年青人對神的話所作的解釋絲毫未變。

1557年，《基督教信仰要義》的最後一版以《使徒信經》的順序討論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四個版本中，三個以拉丁文寫成，一個以活潑美麗的法文寫成。今天，此書被翻譯成至少十種語言，這本巨著是以綜合神的話所寫成的一個完整的教義系統。《要義》以神開始，以神結束，也以神爲萬事的依據，就是這三位一體的真神。加爾文以一個律師清晰的邏輯寫成此書；以作家般流暢的行文，充滿說服力地寫成；以一個極罕見的，能掌握神整體真理的頭腦，輝煌地寫成；以一顆完全獻給主的心，滿懷激情地寫成；因著他的靈魂單單由於神的恩典而被從罪的泥潭中救出，他謙卑地寫成此書。

從來沒有人如此寫過，至今爲止也沒有人能夠象加爾文那樣地接近宏偉莊嚴、至高無尚的基督教信仰真理，如此寫過。

但約翰·加爾文並不知道此書的成功。他從一開始就不希望出名，只打算關起門來，用一個假名寫一本小型的書。他說「我的目的不是要以此出名，書一寫完我就離開了巴塞爾。在那裡也沒人知道我是書的作者。」

科萊茵太太的房客馬丁尼斯·路卡尼斯在印刷廠花了很多時間。他在為這本以拉丁文寫成的書作最後一次的審稿，並簽上作者的名字：挪揚的約翰·加爾文。那是1536年2月。稿子全部審完之後，不到一個月書就出現在書店的架子上。但此時路卡尼斯和他的同事杜蒂耶已經離開巴塞爾。這一次他的名字叫謝爾·迪矣司維爾，意思是希望之城，杜蒂耶則成了路易·戴赫蒙，意思是高山。

於是，希望之城先生和高山先生朝南向意大利出發，那是一片教皇的土地，羅馬教庭的大本營。

第十二章

意大利北部的一個城堡裡住著一位法國婦女，若不是因為法律規定，王位只屬於男性，她原可以成為法蘭西的統治者。她就是法國皇帝路易十二的女兒瑞妮公主，她曾被安排先、後與西班牙的查爾斯皇帝和英國的亨利八世訂婚，兩次都是出於政治原因。出於同樣的理由，她後來被嫁給了意大利弗拉拉的海格立斯公爵。海格立斯與教庭關係很近，事實上他是一位教皇的孫子。公爵以紅毯、金號的盛大場面將夫人接到意大利的家。儘管他那巨大的費拉拉城堡因長年失修而開駘損壞，發出霉味，這裡的生活卻仍然是淫逸奢華，盡情享受；沒完沒了的舞會、酒宴、遊戲，還有猴子、鸚鵡和弄臣的嘻耍助興。

瑞妮公爵夫人從法國帶來的信仰不討公爵的喜悅。她是從老教授勒菲，從表姐瑪格麗特公主和其他人那裡學到的。開始的時候公爵還能容忍，他也不反對出現在宮裡的法國人，但羅馬教庭很快就提醒他，這些法國人是教皇的敵人，是跟隨抗羅宗的異端，教皇孫子的城堡哪有他們的份？

當巴塞爾來的旅客來到弗拉拉城牆外時，海格立斯公爵已經開始對夫人的法國朋友們進行控制。據說他們倆是化裝成修道士模樣進來的。公爵夫人急切地接待客人，或許夫人的秘書、詩人克萊芒·馬洛特偷偷地告訴她，那個年輕人是法國的抗羅宗領袖，馬洛特是被列為法國通緝單上第七號嫌疑犯逃到弗拉拉來的。

現在加爾文來了，公爵夫人當然要保護他，因為宗教審判團[註：即臭名昭著的羅馬天主教宗教迫害法庭]已經開始調查夫人的一些朋友，據說加爾文在安排給他住的房間隔壁的小教堂裡秘密地與夫人和她的女侍們相見，或許他還帶了些《綱

要》的稿子。有時他也小心謹慎地和宮裡的其他人交談。

當加爾文來到弗拉拉的時候，公爵夫人才二十五歲，等待著她的是許多黑暗的年頭，她後來被逼著回到羅馬天主教；她若拒絕，將被投入監獄，她的孩子們也將被從她身邊奪走，在羅馬天主教的教育下成長。爲了家庭團聚，她表面裝著服從羅馬；公爵死後，她搬回到自己在法國的一個城堡，並將它變爲被迫害的抗羅宗人士的避難所。在後來的法國宗教戰爭中，她的女婿成爲鎮壓抗羅宗一方的軍事領袖，但她卻堅守住了信仰。眼前這身著黑衣在鼓勵著她的年青人後來成爲公爵夫人在患難中忠實的顧問。

此後，她再也沒有見過加爾文；然而他的安慰與鼓勵卻一直幫助她堅守信仰，那些偷偷送進城堡或監獄的信經常成爲公爵夫人屬靈的幫助。

二十八年後，加爾文臨終躺在床上口述了最後一封給公爵夫人的信。那時她住在法國的蒙太舉城堡裡，擔心抗羅宗的人們會因爲自己是鎮壓他們之人的岳母而責怪她。加爾文再一次對她肯定的說「不，夫人」，儘管他自己的聲音也微弱得幾乎聽不出來，「他們只會更愛您，更尊重您，絕不會因爲您的這種家庭關係而對您另眼相看，您的正直與純潔的基督教信仰不單單停留在言語上，更體現在您的偉大行動上……對於我自己來說，我……只會對您的美德更加羨慕。」

但這一切都還隱藏在未來的日子中。眼下公爵夫人與加爾文是面對面地說話，他真希望他也能與意大利其他那些高位上的人們說話，但他對周圍的那些神父們、紅衣主教們的威脅，不敢掉以輕心，他沒有再繼續往意大利內地去。他到弗拉拉來的目的是堅固公爵夫人的信仰，她是法國人，也是宗教改革人士，他希望夫人能利用她的地位影響周圍的人，他甚至希望能夠有機會在此講道。但是不行，這裡是海格斯公爵的堡壘，控制嚴密。住在弗拉拉將近二個月的時間裡，加爾文發了幾封信，一封是給熱拉爾·羅素的，他是加爾文尊重的一位傳道人，也是前述被法弗西斯從獄中釋放的三位之一。那位半瞎的已逃到了巴塞爾，可是羅素卻承認自己的異端，回到羅馬天主教。爲此，教皇資賞給他一頂主教冠，羅素接受了。加爾文忍不住要寫信給他，信是這樣開頭的：

「約翰·加爾文寫信給昔日的朋友、今日的主教大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使您背棄了元首，跑到敵人的陣營裡來摧毀您曾一度發誓要以生命來捍衛的？……我自己

深有體會，離開家鄉成爲一個寄居者是多麼艱難，但是上帝卻將此在人的眼裡看爲何等痛苦的事變爲十足的喜樂……。」

弗拉拉的寄居者們突然離開。海格立斯公爵正在宮裡搜捕異端，有人開始懷疑叫迪矣司維爾和戴赫蒙的這兩個人。他們逃出了城門向北往阿爾卑斯山走去，有人說那穿黑衣的瘦高個一路走一路傳道，他們在一些村子受到歡迎，在另一些村子被趕了出去，沒有人知道這一路究竟發生了什麼，或許他們是從聖貝爾納山隘口穿過去的。阿爾卑斯山上積雪融匯成的激流衝擊著河床的卵石，奔騰而去。

現在往哪兒去？有消息傳來說弗朗西斯爲了要改變抗羅宗人們的信仰，決定對流亡在外的人們大赦六個月，使他們可以回到家鄉，回到羅馬天主教去。加爾文沒有錯過這一機會，他心情沉重的來到巴黎，知道那些原來要歡迎他的人們已經不在。

1536年6月2日，巴黎公證處有這樣一份公證「……本人姓名：約翰·加爾文，身份：持有法律開業證書，同意委託現住巴黎的職員安東尼作爲自己的全權代理人。」除了「持有法律證書」之外，他怎樣向公證人描述他自己呢？難道是寫成遊蕩者、異端傳道人、抗羅宗的作家嗎？這份公證書是委託弟弟安東尼負責處理挪揚老家的財產。

挪揚城裡的熱拉爾·加爾文的家消失了。這個一度曾廣受尊敬，對教會忠誠不二的家不復存在了。旅館老闆的女兒死得太早，沒能按教會方式將孩子們撫養成人；教會的律師與教會的人們相處時太固執；大兒子謝爾不是塊當神父的料，有一次在爲父親的事上得罪了持權杖者，更糟糕的是他竟放著神父不做，去從了那「路德異端」，年紀輕輕的臨死竟拒絕領聖餐，結果被埋在凡人墓地，靈魂未得教會的祝禱；那個老二約翰學業倒是不錯，已經開始走上了當神父之路，結果變成全家最壞的一個，他竟又寫又傳，吸引人、教導異端，想要另立教會與聖教會、教皇分庭抗禮，總有一天他會因爲他作的惡被焚燒——不是在法國就是在地獄裡，他做的是駭人聽聞的。他的另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家裡唯一信靠教會的說，這個約翰還改變了弟弟安東尼、妹妹瑪莉亞，他們竟願意跟他走！挪揚那些虔誠的女人們走過「玉米市場」廣場加爾文家時，都會聳聳肩——看這家落得個什麼樣的光景噢！

那個最壞的「約翰」再一次踏上離開法國的路。皇上六個月的赦期眼看就要過

去，他的祖國沒有一片可以像在巴塞爾那樣關上門、隱名埋姓的立足之地。他需要這樣的一個地方繼續他的學習、寫作。這將是他對新生的抗羅宗信仰的貢獻——寫書叫人們可以學習，可得鼓勵。或許斯特拉斯堡是個好去處，或者巴塞爾。

斯特拉斯堡在東邊，直接去會走進一片戰場。弗朗西斯正在與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爾斯皇帝進行第三場戰爭，戰鬥就發生在加爾文要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一路上堆滿了大炮、車輛和其它軍用裝備。加爾文不得不繞個大彎，經里昂向南朝目的地走去。有一天他計劃走到瑞士的洛桑，結果時間晚了，他只好在萊蒙湖西岸的日內瓦住下。

滿身塵土的加爾文走進老科爾納萬城門。守城門的是一個全付武裝的百夫長。加爾文報上姓名，拿到一張可以去日內瓦旅店下宿的路條。穿過吊格來到城裡，雖然又累又乏，但他打算吃點東西，好好睡上一覺，天亮之前繼續上路。他找到一家小旅館住了下來。

第二部 屬於兩個城市的人

第十三章

瑞士的山上、河谷裡住著歐洲最勇敢的人民。宗教改革時期，這裡不叫瑞士，這是一個由十三個稱為小行政區所組成的地區，他們從統治歐洲的公爵、國王和皇帝那裡贏得了自由，每個小行政區由公民組成的議會管理、自治。歐洲沒有一個地方像這裡的人們那樣不願做任何人的奴僕，雖然他們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

1500年後瑞士的這些小行政區很快就面臨一個大問題：面對橫掃德國各省並在他們境內開始了的宗教改革，他們該怎麼辦？

慈運理在中北部的蘇黎世大有能力的傳道，他的第一篇講道是在1519年新年那天，比馬丁·路德釘九十五條晚十四個月。此後，宗教改革在其它的小行政區也開始了，講德語的東北部地區正在辨論他們是留在羅馬天主教還是成為抗羅宗。有些地方宣佈效忠羅馬，另一些地方則轉向慈運理和路德所傳講的信仰，當時教會與政府是合為一體的，因此一個行政區要麼就是正式的羅馬天主教，要麼就是抗羅宗。

北方最強大的抗羅宗行政區是伯恩，伯恩的官印上是頭熊，各地都知道，熊若發出吼叫，聰敏點都會引起注意。伯恩開始向她控制下的地區進行宣教工作，這不

是件容易的事，羅馬天主教控制的地區隨時準備決一死戰。伯恩說的是德文，他們需要會說法語的人到西南的法語地區去宣教，他們差派了一位法國人，他就是長著紅鬍子、火焰般性格的威廉·法雷爾。法雷爾在老教授勒菲浮影響之下信主，在莫市、在巴黎奮鬥之後跑到瑞士。

法雷爾是位大無畏的宣教士，無論到哪裡他都帶著神的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他。伊拉斯馬曾說過「我一生中從未是過這麼勇敢的人，」後者稱伊拉斯馬為巴蘭（巴蘭是聖經中一位貪愛不義工價的先知）。

有一次，當一個宗教儀式結束之後，法雷爾從神父手中奪下所謂聖物扔進河裡。另外幾次他跑上講台，高聲壓過正做彌撒的神父。每到一處他都引起一場風暴。一個城鎮接著一個城鎮，在集市上、在家庭中、在大廳裡都傳來他那雷鳴般的信息。他大大地奮興聽眾，吼叫與嚴責，輕歎與呻吟，法雷爾的既大眾化又似刀劍的語言，如利箭般射入那些粗壯、未受過教育的人們的心裡。他和他們一樣不是文質彬彬的人，他們也能理解他的話。他對羅馬怒吼，他生動流暢、真情實意地宣告聖經的真理。人們對這個伯恩來的宣教士的反應只有兩種：要麼立即相信他，要麼就狂怒地攻擊他。

他在一些地方被毒打、踐踏，在另一些地方遭手槍、刀劍威脅。有一次他的臉上被打得讓一個從伯恩來的人驚呼起來，以為他被許多只狂怒的貓用利爪拚命抓過一樣可怕。但法雷爾從未止步，哪裡有未被福音收割過的禾場他就到哪裡去，不顧那裡是否受到伯恩的保護。

法雷爾也培訓出了幾個大無畏的助手，他們不怕飢餓、寒冷、死亡，也不怕任何人。他們每到一地只要不被趕出去，就會領人轉向抗羅宗，接著就報告伯恩。於是伯恩議會就寫信給此鎮上要求抗羅宗和羅馬天主教進行辯論，伯恩也會派代表主持辯論。結束時由當地人民投票決定是選擇抗羅宗還是羅馬，許多城鎮因此而加入改革宗，伯恩會告訴他們敬拜和分領聖餐應有的方式，廢除彌撒、雕像，祭壇--假如還沒有被過分熱情的抗羅宗人用石興砸碎過的話--被從教堂撤去，。

1532年秋的一天，也就是慈運理被害後的一年，法雷爾與一位宣教同工穿過吊橋第一次走進日內瓦城。

此時，加爾文正在奧爾良功讀他的法律學，他寫的那本《西尼加註釋》還沒買

出去。

第十四章路

世界上很少有哪一座城市象日內瓦那麼美麗，前面是湛藍的萊蒙湖，四周群山環抱，綠草成茵的山坡，白雪皚皚的山峰時常在雲霧中若隱若現，雪山融化的河流匯成藍藍的大湖，往下流去形成那波瀾壯闊的羅納河，一路穿過法國流向地中海。日內瓦位於歐洲的交匯路口，是重要的商業要道，她位於小行政區的西南端，面對周圍的鄰國。

凱撒大帝在他的歐洲遠征中發現了日內瓦，當時是基督誕生前五十年。他在那裡建造了護城牆，四百年之後，日內瓦成爲一個城市，基督教改變了原來那外邦人的社會，教堂在原來外邦廟宇處建了起來。宏偉的聖皮埃爾教堂位於全城最高點，是從十世紀開始造的，教堂建成十字架的形狀，堡壘般的塔樓矗立在群山之中。

法雷爾第一次來到日內瓦時，這裡正在爲自由而戰。她不屬於任何一個行政區，爲了獨立，人們殊死奮鬥。一百五十年來，日內瓦人民以鮮血與那些想要統治他們的主教和公爵們抗爭。

薩伏依公國的查理三世公爵統治著日內瓦周圍的地區，有多處保壘、據點，甚至還佔領了流經日內瓦城的羅納河中央的一個小島。統治城裡公民們的是一位主教，也是城內人民的敵人，後來他搬到城外山邊一個更舒適的宮殿裡去了。公爵是城外的敵人，日內瓦的愛國者們與公爵苦戰，1525年，查理公爵率領大軍包圍了日內瓦。

當他得勝地進入城市時，愛國者們逃了出去，留下的人宣誓順服公爵，刀劍架在日頭山，人們還有什麼可選擇的呢？那些愛國者們回來後，議會召開會議，否決了對公爵的效忠。這種頑強抵抗精神，令公爵目瞪口呆，他競不戰而退，離開日內瓦後再也沒有入過城。

1526年，日內瓦轉向強大的伯恩和付列堡，與他們結盟。此聯盟對於脫離公爵的威脅很有好處，但伯恩是抗羅宗，付列堡則屬羅馬天主教，面臨宗教之爭時，日內瓦仍是單槍匹馬。

1532年法雷爾來到日內瓦，他住進一家叫佩斯之旅的小旅館。第二天，他對聚

在旅館的人們演講，第三天對著人群講道。日內瓦城內的900位神父們跳了起來--他們聽說過這個大膽的宣教士在其它地方對羅馬天主教造成破壞。

法雷爾帶著伯恩的證明信，市議會對他沒有辦法。神父們糾纏集了一夥歹徒，向走在街上的法雷爾和他的助手逼近。他們手持棍棒、長槍又喊又叫地圍了上來，要不是一隊巡邏兵趕到，他倆恐怕就沒命了。士兵們驅散了暴徒，護送他們回到旅館，並留下一個在他們門口整夜守衛。

第二天一早，朋友們來把法雷爾他們接走，用船送到湖對岸的一個隱蔽處。對於此等歡迎儀式，法雷爾早已習以為常。他有了個新主意。幾星期後，城裡出現了許多張貼，人們饒有興趣地讀到：

「城裡新來的一位年青人打算教授法文，不論男女老少，文化程度高低，一律歡迎，一個月之後學不會不收費。上課地點：莫拉爾廣場附近的布依爾大樓，老師不但教法文，也免費替人治病。」

那間租來的屋子裡很快就滿了。這位年青人其實就是法雷爾的助手安東尼·弗羅芒。他不但教法文，也講道、解釋聖經。

屋子裡擠得水洩不通，人們紛紛到這位年青的老師面前聽講。1533年新年，來的人太多，弗羅芒只好移到廣場去。這個莫拉爾廣場是日內瓦人經聚會的地方，他跳上一個賣魚的攤位，在寒風中對人群講道，題目是《當心假先知》。

正講的時候，手持武器的神父們領著一群歹徒向他們衝了過來，弗羅芒逃進了一家藥店，結果很快玻璃就被砸碎。後來他趁著天黑下來逃出了日內瓦，但這兩個法國人播下的種子開始扎根、生長。

此時，信仰上的戰爭已經開始。抗羅宗的伯恩向日內瓦議會發出公文「尊敬的大人們，讓真理當道吧。」

城裡的人們開始分裂，七百多神父、教士和其他追隨羅馬的人們點著火把聚集發誓，對日內瓦的抗羅宗格殺無論，一個不留。第二天他們聚集在聖皮埃爾教堂的祭壇前，帶領他們的是全村武裝的韋利大教士。克萊芒斯大鐘敲響，這支七百人的軍隊扛著標語、十字架，手持刀劍、斧子、長槍、棍棒出發。他們向著莫拉爾廣場進軍，一路上也有人加入，婦女們用圍裙兜著石子作武器，入伍的也有少年人，他們擺出作戰的隊形，準備一戰。

抗羅宗的人們也集合起來準備迎戰他們的同胞。雙方在廣場的兩邊擺開陣式，突然有七位付利堡來的商人出現在他們中間，請求雙方和好，從而阻止了一場鄰居間的戰鬥。雖然神父們不從，但最後那些持武器的人們都回家去了。

幾個月後，1533年5月，韋利大教士又脫下長袍，穿上盔甲、佩上劍，帶領武裝的神父們於黃昏時來到莫拉爾廣場。消息很快傳遍了那些狹窄的街巷。警鐘響起，又一次震驚了人們。雙方的人數越來越多，最後打了起來。大教士手中的利劍在人群中左揮右舞，雙方鬥了一陣子，有幾個人受了傷，後來人們就退了，各自回家。第二天早上人們才發現韋利大教士死在家門口，一根槍尖深深地刺入他的甲縫之中。伯恩熊站了出來。因為這是一個三方聯盟。

這下麻煩來了，原來韋利家是付利堡羅馬天主教的貴族。付利堡議會要求嚴懲所有參加歐斗抗羅宗一方的人，不殺了他們就要與日內瓦斷交。但是伯恩也站出來支持，對日內瓦會議說：「你們如此對待抗羅宗人士令我們不能容忍。你們竟將我們的偉大僕人法雷爾趕出日內瓦，還逼迫弗羅芒。你們從巴黎索邦請來的那個教授專門傳講謊言、謬語，他褻瀆上帝、反對信仰，污蔑我們是猶太人、土耳其人、是狗，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們會派代表團到日內瓦與你們的議會一起安排全城人民進得辯論」。

於是伯恩再一次派出紅鬍子的宣教士到日內瓦布道，參予公眾辯論。1533年12日法雷爾又一次出現在日內瓦，他帶了個折疊式的講台，隨時可以架起來講道。弗羅芒老師也回來了，另我還有一位瑞士籍的宣教士維勒特，他很有學問，每到一處都受人尊敬，愛戴。他背上有道深深的傷痕，是被一位神父刺傷的。日內瓦面臨抉擇----拒絕公開辯論，伯恩將撕毀聯盟協議，同意辯論，日內瓦大部要變成改革宗了。與此同時城裡的抗羅宗人數不斷增長，法雷爾不得不移到一個能容納四百人的大屋子裡講道。後來抗羅宗又佔領了「河邊修道院」那裡可以容下五千人。維勒特為信徒施洗，也駁斥神父要焚燒所有聖經的命令。最後議會同意在聖皮才爾大教堂進行辯論。辯論進行了整個一星期，抗羅宗勝利了。但還未來得及進行公民投票，那個薩伏依公爵又來進犯。這回他與那個人人恨惡的大主教達成協義。付利堡已經退出聯盟，伯恩也不願意與公爵衝突，因為他背後有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爾斯五世和教皇撐腰。這下日內瓦真的面臨危險。

日內瓦周圍的那些城堡駐紮著公爵的軍隊，他向日內瓦發出最後通牒，命令他們趕走三位宣教士，重新接受，順服大主教，做個羅馬教庭的乖孩子，否則滅頂之災將臨到。

伯恩勸日內瓦向公爵投降，免得遭毀。瑞士其它的小行政區們也發來同樣的勸告：投降算了，你們是鬥不過公爵、主教、教皇他們的。

日內瓦人清楚地知道這張最後通牒意味著什麼----這不是一個宗教問題，而是自由與奴役的問題，難道抗爭、奮戰了這麼多年，還要生活公爵這個暴君之下嗎？

日內瓦議會給公爵的回答是：爲了自由，寧可玉碎不要瓦全。

第十五章

1534年8月，日內瓦人民決定拆掉城牆外的四個村鎮，不讓它們成爲公爵攻城的跳板。這四個鎮上共有六千多居民，這就意味著犧牲半個城市來保護另外半個城市。人們夜以繼日地拆毀房子、村子、教堂、修道院，拆下的石頭用來加固城牆。教堂的大鐘熔鑄成炮彈，城的四周變成了開闊地。人們擠在城牆以內，整個冬天男女老少齊上陣，修建加固他們的城牆。法雷爾和維勒特他們也和眾人一起工作，鼓勵守夜的。

1535年4月，有人下毒，要害這幾位傳道人。維勒特病倒了，他們住處的女僕承認在菠菜湯裡下了毒，法雷爾在喝湯之前正好被人叫了出去。議會審判了女僕，處以死刑。有人說是神父在背後指使，這下子城裡已經擁擠在一起、充滿壓力的人們更偏向於這幾位傳道人。

公爵開始切斷日內瓦的供應，抓住城裡出來的人就投入監獄折磨至死，但他還是沒有派出大軍攻城。

6月，聖皮埃爾教堂裡舉行了第二次辯論。這次持續了四個星期，人們擠滿了教堂來聽這幾位傳道人捍衛抗羅宗信仰。對方是兩位替羅馬天主教庭說話的修士，他們根本不是傳道人的對手，人們爲抗羅宗信仰歡呼。1535年8月的一個禮拜天，法雷爾被人們抬起來走向聖皮埃爾教堂。裡面擠得水洩不通，走廊、門口甚至外面的廣場上都站滿了人，法雷爾第一次站在天主教堂的講壇宣講抗羅宗的道。

第二天，日內瓦議會如召見法雷爾。他請求議會正式承認抗羅宗信仰，他說，

假如我們所傳講的被證明與聖經相背，我們心甘情願接受任何處罰甚至死刑。接著他跪下與議員們一起禱告，他站起來的時候，全場一片肅靜。議會也邀請了羅馬天主教神父、教士來談他們的信仰。。他們姍姍來遲，看上去漫不經心，也沒有熱情，其中一人承認他們自己沒學過，所講的是從他們的神父那裡學來的。

在這些證據面前，日內瓦議會作出了一重要決議：1535年8月27日，日內瓦正式宣佈脫離羅馬天主教。不再有彌撒儀式，雕像、祭壇被從教堂裡撤去。一所修道院改成了免費小學，供孩子們唸書。這是全歐洲第一所免費小學。另一所修道院改成了醫院，神父、修士、修女們可以選擇留下或離開，很多人走了。聖克萊瑞修道院的修女們怕留下會被逼著嫁人，也都離開日內瓦。她們中間有些人一生都在修道院裡，第一次走到外面，遇見羊、牛都當以為是飢餓的熊和獅子。宗教改革與自由同時來到日內瓦，公爵加速了這一進程，他站在主教和教皇一邊。反倒促成了那些渴望自由的人們傾向於三位傳道人和抗羅宗信仰。

公爵開始全面行動。他的艦隊從湖上，軍隊從陸上倉圍攻了城市。城內的饑荒開始了。終於有一名信使溜過包圍線，將求援信送到伯恩。正當伯恩議會辨論是否出兵時，有消息會傳來說，公爵的軍隊在日內瓦附近屬伯恩的地方搶劫。於是伯恩立即派出一支六千人的大軍，宣佈對公爵開戰。法國的弗朗西斯也加了進來，向公爵宣戰，並乘虛佔領了公爵的首都和兩個最富庶的省份，因為公爵正在包圍日內瓦。

1536年2月，伯恩的軍隊來到日內瓦城門口，這座湖上的城市得救了。

法雷爾開始向這個新興的抗羅宗城市介紹新的敬拜、講道和教會紀律。議會召集全城的人到聖皮埃爾教堂。大家站在一起，舉手宣誓以福音原則為生活的準則，棄決羅馬教庭的那套東西，那天是1536年5月21日禮拜天。

這一年裡還發生了許多事：荷蘭的伊拉斯馬死於巴塞爾，他曾向人們指出了聖經的道路，自己卻轉身離開。法國的宗教改革晨星----老教授拉菲浮在內拉克去世了，他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上活了一百多年。英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皇后安妮·博林在倫敦塔被砍頭。也在這一年一位年青人傳道從巴黎往斯特拉堡去。8月的一天，他在日內瓦一家小旅館過夜，這位旅行者計劃在此住一晚就走，可是上帝卻有一個不同的計劃。

第十六章

兩個人正在爭執。那壯實的矮個子歲數較大些，大部分時候都是他在說。他一會兒站著，一會坐下，一會兒在屋裡走動。他揮舞雙臂，用拳頭擊打桌子，他的話就像一股洪流不可阻止，粗啞的聲音幾乎像是在吼叫。坐著的那位瘦個子臉色蒼白，較年輕些，滿臉的鬍子裡一雙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他在搖頭，舉起手來想要打斷對方，終於在對方那一連串話語的縫隙中發出抗議：「我不行，不適用於做此事，我的個性內向、怯弱，身體也不好，我比較適用於學習、研究，是一個與書本打交道的人。若是被捆在一家教會裡我怎麼能為其他人服務呢？你不能這樣安排我，我以主的名聲求您讓我以另一種方式服侍上帝吧」。

桌上的蠟燭已快燃盡，他們的爭議卻仍未結束。最後，那位歲數大的以手指著天雷鳴般地說：「我以全能上帝的名義對你說，你若以自己的研究作借口不留下幫助我們做上帝的工，上帝要咒詛你，因為你尋求自己的榮耀而不是基督的榮耀！」

那雙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低下了。屋裡突然鴉雀無聲，爭執結束了，「我感到……就如神從天上伸出他的手來抓住我……我被恐懼所擊打，不得不中止我的旅途……法雷爾將我拘留在了日內瓦，」這位旅行者就是約翰·加爾文。

勇敢無畏，火焰般的法雷爾，到底為什麼要這個體弱多病才二十七歲的人留下呢？這個在各地常常以暴風雨般的方式奪得人的法雷爾為什麼偏要這個比他小二十歲怯懦的人呢？

沒有人能像法雷爾那樣為福音征服一個城市。但征服只是開始，接下來的工作更多。要計劃，要有力的帶領，也要建造。沒有人比他更清楚這些工作的重要性。在戰場上，他的偉大無以倫比，但在每天的計劃，堅固事工上他卻不在行。他不能為日內瓦這種爆炸性質的城市提供堅固而穩定的領袖。

日內瓦的宗教改革已經出現了問題。那些曾與公爵抗爭的人們回到正常的生活，許多人迫不急待地要回到那種放蕩不羈的生活。日內瓦是以此聞名的，他們對那些伴隨著為自己而戰而來的抗羅宗信仰已經開始不在乎了。公爵兵臨城下時，大家團結一致，現在不同，各種團體間的明爭暗鬥又開始了，人人都想要控制議會。這裡有羅馬天主教的殘餘，有自稱為真正的愛國者。這些愛國者們不喜歡法國進口來的

傳道人領導新的抗羅宗議會。

法雷爾和他的同事正在失去控制。人們不喜歡約束他們行爲的法律。形式上，人人都成爲抗羅宗教會的新成員，但其中有許多人的心根本就未改變過。若沒有一個能作全面計劃的決策者來將這個反叛的城市轉變成上帝的城市，這座剛成爲抗羅宗的城市後果不堪設想。

把加爾文當晚住在日內瓦的消息告訴法雷爾的，是加爾文的朋友杜蒂耶。法雷爾一下子看到了問題的答案：這是一位宗教改革的領袖、才華出眾的年青人，他所受的法律教育可以用來與議會和城裡各種人士打交道，最重要的是，這是一位當時對聖經教導理解最全面的人。此人可以將神的話教導人，在聖靈的工作之下，他可以改變日內瓦百姓的心。

加爾文是上帝爲日內瓦預備的，法雷爾毫不懷疑，他全速趕到旅館。現在加爾文同意留下了，他告訴這位日內瓦的弟兄，他必須先去一次巴塞爾帶一個親戚和自己的一點個人物品來，路上還要在幾個教會停留一下，一共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然後就回到日內瓦來。

加爾文實現了諾言。但從他寫給法國朋友的信上知道，一到日內瓦他就得了重感冒，又是引起牙周發炎，出血整整 9 天的時間，不得不加倍服藥。看來日內瓦並不歡迎加爾文。

從病床上起後來，加爾文開始工作。他每天在聖皮埃爾教課。他的頭銜倒是很有體面，稱作「聖經書信教授」但卻是沒有工資的教授。法雷爾請求議會聘加爾文教聖經，發工資給他。議會同意了，不過工資到第二年二月才開始付。其間，議會的記錄冊上寫的是「那個法國人」，人們不認認他，議會的職員大概也搞不清楚他的名字。

每天下午，他爬上通往聖皮埃爾的那條陡峭的小街，在拆除了雕像、祭壇後空蕩蕩的大堂裡講課。有一小群人來聽他講保羅書信。除了學習、寫信之外，他在寫法文版的《基督教信仰要義》。

他懷著沉重而氣憤的心情思考周圍所發生的一切：日內瓦人又一頭扎進從前的生活方式，酒店裡總是滿滿的，醉漢們在街上蹣跚而過，賭桌上擲骰子的聲音日夜不停，牌局忙得不可開交。男人們大白天公開與情婦、妓女鬼混。城中心的廣場上

搭起了巨大的舞池。在加爾文看來人們衣著既不整潔又不端莊，男人們穿著開衩的馬褲，女人們穿著大膽的時裝、珠寶招搖過市。

這一切就發生在這個正式宣告為抗羅宗的城市裡，他們當中許多人是當初站在聖皮埃爾教堂裡，舉手宣誓要按上帝的話生活的人，他們都屬於日內瓦的教會。一個陌生的法國難民怎麼來教導這些對信仰無知的人信仰呢？他怎麼能將人們從他們

習以為常的邪惡中引領到過聖潔生活裡來呢？或許加爾文在法國做地下工作時說的那句經文----「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抵擋我們呢」在那幾個月裡能夠安慰他。是的，誰能抵擋我們？

第十七章

1536年9月底，加爾文與法雷爾沿萊蒙湖向東，去了一次洛桑，見到了在那裡任牧師的維勒特。伯恩正在洛桑安排一場公開的大型辯論，目的是為了解決那些剛從公爵手裡奪得的地區的信仰問題。大會邀請了整個地區的三百多位神父。一百七十四位到場，但只有四人站起來參加辯論。法雷爾和維勒特是抗羅宗一方的代表，加爾文也出席，但沒有準備發言。

人們紛紛離開農莊，從四面八方湧進洛桑。這個地區的宗教信仰將取決於他們的投票結果，大家不想錯過聽到辯論雙方的意見。

十月一日，辯論大會在擊鼓聲中開始，法雷爾以一場主日講道開場。禮拜一早上七點接著辯論，人們在大教堂裡相互擁擠著，要看一看、聽一聽。主持會議的人們坐在中間，伯恩派來的五位代表也在場。他們著黑色緊身上衣，穿紅色長襪，戴寬邊的羽毛帽子。書記們手持羽筆，隨時準備記錄。

法雷爾列出十項主題，辯論持續了一個禮拜。有一天，羅馬天主教一方的發言人論說到基督的身體是如何真實地存在於聖餐裡的。他指責抗羅宗忽視古教會先父們在此點上的教導，他說，你們如果知道這些教會先父們是怎麼寫的，就知道你們的觀點是遭咒詛的。

加爾文按捺不住了，他在巴黎做學生時讀古代教會先父們著作所花上的時間派上用處。他站起來駁斥抗羅馬的代表。他以驚人的記憶力引述居普連良，屈俊多模，特土良，奧古斯汀和其他教會先父們的話，不僅引作者的名字，他還說出每一

本著作的名字。他清楚無疑、無懈可擊地闡明了他的論點。講完之後，人群騷動起來，人們擠著上前，要看一看這個這個他們從未見過的臉色蒼白的年青人。

一位方濟會教士大聲驚呼說：這才是真正的教義。他呼求上帝的名，求神饒恕他長久以來跟隨羅馬天主教的錯誤教導。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裡，洛桑周圍地區有110位神父、80位教士紛紛轉向抗羅宗信仰，整個地區轉變了。加爾文騎上馬往伯恩去，他的感冒在十月的冷風中還是不好轉。現在伯恩面對的問題是怎樣才能使各地的教會聯合起來，而不是每一個教會自己來解釋新的改革宗信仰。人們開始知道加爾文的名字，看到他起的領袖作用。回到日內瓦後，來聽他講課的人數突然多了起來。

接下來所面對的，是如何建造日內瓦的教會。他住的那間昏暗的小房子離聖皮埃爾不遠，他坐下工作，首先完成的是一份《信仰告白》，在這篇二十一章的《告白》裡，加爾文清楚地向日內瓦人民解釋他們宣誓要持守的福音信仰到底是什麼。

1536年月11日，《信仰告白》，議會收下後當作學習材料。加爾文提出人們應該宣誓依照《告白》的原則來生活。有些議員搶怨說不該強迫人們對他們不信的東西宣誓。但最後還是通過了。

日內瓦的百姓按居住所在地，一個區一個區的被召集起來，到聖皮埃爾去。十人個一排來到講台前宣誓，並由書記作筆錄。一天接一天，人們排著隊陸續來這裡是宣誓忠於《信仰告白》白中的真理。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來。牢騷聲也越來越大：哪道我們拚死拚活與公爵、主教抗爭就是為了成為城裡這幾個牧師的奴僕嗎？誰給了這幾個法國佬這種權力？羅馬教會的殘餘也在人群中攪亂，那些過慣了放蕩生活被稱為的放蕩派的人之所以發牢騷，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傳道人要叫他們按《告白》生活。愛國者們則感到這幾個外國人在控制他們的城市而怒火中燒。

加爾文的筆下產生了第二個文件。他和法雷爾一起帶著它來到議會大樓。門口的守衛官坐在一隻木雕獅子上，手持一根象徵權力的銀杖。他放兩位牧師進去。這裡是日內瓦的政權中心--小議會。小議會由二十五位議員組成，其核心是由百姓選

舉出來的四位行政長官。小議會下面是二百人組成的大議會，成員由小議會推薦，小議會又由大議會選舉，四位行政長官和財政部長例外。第三層的議會由日內瓦全體男性公民組成，投票決定城市中最重大的問題。穿黑袍的兩位牧師將這份要求日內瓦教會作出四項改革的文件交給了小議會，說：「我們知道不可能一夜之間就建立起一個良好的秩序，日內瓦教會的情況是因人民的無知所致……但現在上帝出於他的美意，要在此地建造他的教會。我們也以此為美事……考慮到這些……我們以神的名字 請求您……假若您同意我們的建議是基出於福音的聖言，那麼就當接受下列的幾條，並命令全城的百姓照著去行」。

小議會告訴他倆，等研究之後再說。那是1537年1月中旬。人們還在陸續地來聖皮埃爾宣誓，而那個法雷爾命令留在日內瓦的瘦瘦的年輕法國人還沒有領到過一分錢的工資報酬呢！

第十八章

這些牧師們到底要什麼？小議會的議員們圍在桌前讀起這份文件來：「尊榮的先生們」文件是這樣開頭的，這些尊榮的先生們不用讀幾行就能發現文件中那爆炸性的內容「毫無疑問，一個教會若不按理分領主的聖餐，是不可能有良好的秩序的……人若沒有一顆敬畏之心不可到餅和杯麵前來。為了維持教會的健全，開除教籍的紀律是必要的。」我們認為有必要建立起監督制度。

「開除教籍，原來如此啊！也就是說要把開除教籍這個大權交給教會，這是長期以來人們所害怕的東西。文件建議說「教會通過忠信的弟兄姐妹在城裡各處的觀察注意，可以瞭解到誰不按基督教導生活然後教會按基督在馬太福音十八章設立的順序進行勸說，批評，最後一步是教會作出開除的決定，由議令來執行。」因為當時政教是聯在一起的，牧師說「開除教籍是必要的」為的是不讓作惡的手伸向主的聖餐，但讓教會握有對那些過著罪惡生活和信從錯誤教義的人們除名的大權，這可是一顆炸彈哪，難道我們要在自己的城裡占一位教皇吧？許多議員們大叫起來，我們有權決定誰該受懲罰，我們有整本的法律可以用來懲罰惡人。牧師嗎，就講道吧。讓議會來管理百姓的生活。

加爾文不僅要求教會有權決定誰可以領聖餐，他也相信每個主日都應擘餅喝

杯，這應該成爲一個規定……每年僅有幾次不是主耶穌設立的……初代教會也是每個主日領餐的，但考慮到人們的軟弱，爲了聖禮的奧秘不至被誤解，可以每月進行一次。

後面的三項改革要求沒有引起議員們的火氣，加爾文要求婚姻法要按神的話重新審核，因爲從前教皇隨心所欲，發出的命令叫人無所適從。但在此文件中，教皇二字的地方留了空白，加爾文甚至都不屑寫上教皇這個名稱。

第三條是關於兒童教育。孩子們應該公開承認他們的信仰，教會應該以問答的方式寫一本基要真理用來教育兒童。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爲大部分人都忽視、不知道的話。父母教育孩子也是如此，父母必須以要理問答來教育他們的孩子。教會也應每年設幾次時間，由傳道人來問孩子們這些問題，由孩子們回答、解釋。他又加上一句說「讓我們樂意地去命令家長，要不辭辛苦，花上時間、精力去教導他們的孩子。」最後一條是教會應該在敬拜時唱詩篇。幾個世紀以來，會眾是不准在教會裡唱的，他們也聽不懂神父所唱的拉丁文，現在他們不再是麻木的旁觀者，他們也是參予者。人們可以以唱詩歌向神禱告，向神獻上讚美。眾入也可以同心合意地感謝主。那麼會眾怎樣才能學會唱詩篇呢？「讓孩子們事先練習……以清晰、響亮的聲音先唱，會眾仔細聽……直到大家都能同聲合唱」「不用風琴也不用合聲，以兒童組成詩班來領唱新歌，眾入唱出合一的讚美，」

以上就是加爾文建立日內瓦教會所定的四點計劃，這是他所相信的，也是效仿古代教會的模式。議員們會批准嗎？

議會拖得很長，他們不反對唱詩篇、教導兒童和按聖經教導制定婚姻法。這些可以寫進法律書中去，那裡已經有一百多條了，反正都不執行。這樣就可以打發牧師們了。

但是，在開除教籍和領聖餐的事上有很激烈的爭論。結果議會的多數不想作任何改變，領聖餐還是照舊，一年四次。至於開除教籍的事，先放在一邊，等以後於說。無論如何，瑞士的其它改革宗教會都沒有這等權力，熱愛自由的日內瓦不必在此讓步，尤其是不必對一個外國人讓步！

對於議會這個不冷不熱的反應，牧師們只好盡力做他們能做的。加爾文爲孩子們寫了要理問答。用來幫助父母們以神話語的真理來教養孩子。

他也開始在教會講道，他那清晰的、金屬般的聲音穿透教會的每一個角落。

他和法雷爾頭上的平頂黑帽子也在大街小巷出沒，他們拜訪家庭。有時候那位盲人老牧師庫勞德也與他們同行，卵石鋪的街上傳來他那根手杖擊地的響聲。

這些傳道人所到之處，人們的罪孽好像在嘲笑他們。擲骰子、發牌的響聲不絕於耳，鬧哄哄的酒店裡不時地拋出醉漢，趑趑趑趑地到街上，等著的就是整夜的打架、咒詛。妓女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向過路的人們賣弄風騷，晚上就更不知道是個什麼樣子了！

然而所有這些人都屬於日內瓦教會，每一個人都是會員，因為日內瓦宣告成爲抗羅宗。對於這樣的一萬二千會眾，牧師們可以做什麼呢？加爾文如何才能將這群叛逆的羊群帶進他寫在《基督教信仰要義》中的信仰與生活中去呢？

他可以傳講神的話，不是嗎？是的，他在傳講。從聖皮埃爾的講壇看著下面的人海，加爾文伸出他那骨瘦嶙峋的手，將人們的罪一一放在他們的心上，決無閃爍其辭。法雷爾在河對岸的聖哥維斯教堂裡，以雷鳴般的聲音同樣直言不諱，庫勞德則在另一間教堂裡對著他眼睛看不見的會眾發出火一般的信息。

牧師們一再的去議會大樓催促議會將只停留在書上的法律付諸行爲，按法律辦事。當時每個城市都有極詳細的法律，甚至象何時就寢、新娘應穿什麼樣的婚禮服、喜慶宴會應請幾位奏樂的，都有規定。違法的懲罰有入獄乃至死刑。有趣的是，許多法律在宗教改革來到日內瓦之前就已經成文了，另外一些是法雷爾出於抗羅宗的熱心，催促議會加上的。

但這些法律和其它許多城市的一樣。法律書上積著一層灰，直到牧師們來敲門要求，不管犯法的是窮人還是富人，都要依法懲罰。

第十九章

這時候來了兩個荷蘭人，找牧師們的麻煩。他們是重洗派，要求與牧師辯論。重洗派認爲，所有從羅馬天主教轉成改革宗的人都必須重新受洗。當時這些人在抗羅宗中被認爲是極端分子，馬丁·路德極力反對他們。他們經常號召人民起來革命，主張暴力。這類問題對於日內瓦來說是爆炸性的，在百姓原本已懷的不滿中，無異是火上加油。

接著來的是那位很有才華的卡羅利。他是洛桑的牧師，也是從羅馬天主教轉信過來的。但他已經開始轉向羅馬，為死人禱告，按羅馬天主教的教義講道。此人一向生活放縱，為此被法雷爾和維勒特從日內瓦逐出教會，那還是三年前的事。在洛桑，他以一貫的大膽說服了議會，讓他擔任資深牧師，甚至高過洛桑最早的改革宗牧師維勒特。這次他攻擊起日內瓦牧師們傳講的教義來了。他一來就信口開河地指責加爾文和日內瓦的牧師們不完全相信耶穌是上帝。加爾文被極度地激怒了，不信三位一體的神性，這簡直太荒謬了！對此，任何人只要讀過他寫的《基督教信仰要義》、《信仰告白》，都會一清二楚。加爾文在寫給梅吉德的信中說「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如此令人無法容忍的事」。他來到洛桑，在教會大會上為自己和他的同事們辯護。日內瓦的牧師們以嚴厲的話語回答卡羅利。加爾文發言時怒火滿腔，講完後竟精疲力竭、咳嗽不止，幾乎接不上氣來。

大會決定贊成日內瓦的牧師們。此後不久，伯恩的另一次教會大會鑒於卡羅利的不道德生活，罷免了他牧師的職位。他去了法國，回到了羅馬天主教。但他散佈的許多謠言卻如惡者一般影響瑞士的各教會。

不瞭解情況的普通信徒們對新的抗羅宗教會裡牧師們之間發生的事很納悶。加爾文被此事深深地打擾，要求伯恩再一次召開教會大會對信仰、教義作出一個公開的宣告。他寫道「我們自己必須對信仰有一個統一認識才能帶領會眾。……此事事關重大，不可遲移。召開大會對所有的爭議作出決議。卡羅利已經給教會造成了傷害」。

法雷爾雖然在許多暴風雨中都能站立得穩，可這次氣得幾乎失去控制。加爾文寫信到洛桑，請維勒特到日內瓦來，「我認您回到這裡對於幫助我們重新站立得穩極其必要，不然的話我們有可能失去法雷爾。我真沒想到像他這樣鋼鐵般的人，這次竟被搞得如此的焦慮、衰竭」。在這封拉丁文寫的信中，加爾文又寫到：「高山先生想回法國……可否請您將他的衣服和書籍送來」？這可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加爾文又要失去一位朋友。高山先生就是那位放下了手裡的工作、家裡的圖書館，忠誠地伴隨加爾文從法國到巴塞爾、又到意大利的旅行夥伴杜蒂耶。那天晚上也是他告訴法雷爾，加爾文當晚住在日內瓦。此後他也一直住在日內瓦。

杜蒂耶看著那降到加爾文身上的風暴是怎樣形成的，他目睹加爾文病倒、憤怒

甚至沮喪。性格溫和的他受不了日內瓦的這些風風雨雨，他開始懷疑他的朋友在這個叛逆、放蕩的日內瓦所試圖建立的教會。難道這是真的基督教會嗎？還是羅馬才是真正的教會？杜蒂耶不知所措，說他要回法國去。

他是悄悄地離開日內瓦的，先去了北邊羅納河畔的斯特拉堡，他躲進了羅馬教會。在穿過邊境進入法國時，他寫了幾封信給加爾文，向他解釋。他在信上問加爾文：「你心裡真的相信，你是被神呼召成為抗羅宗的牧師嗎？這真是基督教會嗎？」

信還未到達日內瓦，加爾文已經聽說他朋友做的事了。讀過信之後，他坐下寫回信。加爾文並沒有以氣憤而是用尊敬的口吻寫，但他的回信是堅定的：「我很想念您，最令我不安，也最折磨我的，是我有時很粗魯，很不文明地對您說話，冒犯了您，而促使您作此決定。但我敢肯定，我的粗魯不是造成您變心的原因，因為我心裡有的只是感謝您，而不是象對您說話時那種態度粗魯的我。當我聽到您的意向時，我實在是大吃一驚。這個如此突然的轉變實在太奇怪了，因為您以前讓我看見的您是堅定的、一貫的。我不能同意您信上提到的意見，但我不與您爭論。請允許我對您慷慨、仁慈地對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謝，我欠您的實在太多，若神允許……請在禱告中特別紀念我們……因為我們面對的困難比任何時候都大……我也求神保守您、引導您，使您不致走偏。因為您目前所站的是一條很滑的路……您的謙卑的僕人與弟兄：查爾斯·迪斯比維爾」。這，就是日內瓦的那位誠實的人。他承認自己的錯誤，但同時堅持自己所信的，也保持對朋友的忠誠。

杜蒂耶不僅是在路途上，看上去也是在信仰上離開了。但法雷爾仍在身邊。1538年二月，內瓦人選出了三位新的行政長官，都是與加爾文為敵的。大議會命令牧師們不得阻止任何人領聖餐，小議會找借口將那些同情加爾文的議員趕出了小議會。牧師們聽說之後到議會廳抗議，但吃了閉門羹。議會告訴他們，專心自己的講道就可以了，不要再到政府這裡來攪和，這裡沒你們的事。

對日內瓦以及周圍地區影響最大的伯恩發來了一個通知，要求日內瓦採用伯恩教會的規據（當初法雷爾將任何與羅馬天主教有關的規據都扔在了一邊）。例如聖水盂[註：羅馬天主教堂門口]、聖餐使用無醇餅。此外，聖誕節、復活節、升天節、五旬節都作為聖日來慶祝。所有的教會在這些事上合一是件美事。伯恩沒有說

出來的，是想要日內瓦在政治上也受其影響、控制。

大議會同意了伯恩的要求，竟然連問都沒問自己教會的牧師一聲，而這些規據是要在教會裡實施的。

瞎眼的庫勞德牧師在禮拜六早上六點就上了講台。一星期前下令不准他講道，因為他對議會干涉教會的事表示憤懣。今天他還是不願閉上他的嘴「我們的政府官員真就像是但以理異象中長著泥腿的那位，這簡直就是胡作非為」。還沒講完，議會派來的士兵將他帶走，投入臨獄。那是復活節的禮拜六。

加爾文和法雷爾擠著穿過向他們發出威脅聲、吐口水的人群，走上市政府的台階。他們對議員們說：「你們作惡了，你們投入監獄的是主的僕人。他說得對，在未與教會商量之前你們沒有權力決定教會敬拜的方式。」

議會對牧師們的憤怒很不自在。他們應付說，若你們同意解除庫勞德牧師的職務，我們會在你們點頭之後，才在教會實行伯恩的規據。穿黑袍的牧師們回答說，這兩條我們都不同意，市議會沒有權力將此強加在教會頭上。

外面的那群歹徒們吼叫著說：「扔進羅納河，把他倆扔進羅納河裡去！」有人甚至開始想像牧師們在浮著冰塊的激流中往下沉的情景。他們倆走出議會，有人用污移骯髒的話破口大罵，有更多的口水吐在他們身上，更響的威脅聲吼進他的耳朵，有些棍棒、拳頭甚至揮到了他們的鼻了底下。天黑下來之後，皮靴踢門的聲音，窗下的開槍聲和門外的咒罵聲不絕於耳，甚至有人在街上遊行，用下流的小調公開侮辱主的晚餐，觀眾則在一旁大笑。

對於這個二十八歲的，羞怯的法國人來說，這一切簡直就是一場惡夢。他坐在不時跳動的燭光下寫著，每一聲槍響，每一腳踢門聲都在驚嚇他。神將他安排在教會當牧師，而不是讓他在安寧的環境裡作研究，可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教會，什麼樣的一座城市啊！他還要在此暴風雨中站立多久呢？

當晚，街上的人群給手持銀杖的市議會守衛官讓開一條路。他打著燈，奉行政長官們之命來找牧師：若不接納伯恩的規據，明天就請你們下台。復活節的講道與聖餐，可以另找牧師。

第二天是復活節主日，教堂裡擠得滿滿的。鬧事的人群湧向聖彼埃爾，要等著看好戲。河對岸法雷爾講道的聖熱爾韋教堂也擠得滿了人。兩個牧師會講道嗎？是

的，他們決定照樣講道。一晚未眠，他們走進了各自的教堂。

加爾文站立在那裡，骨瘦嶙峋的雙手緊緊地抓住講台的邊沿，那雙具有穿透力的眼光直視著底下憤怒的、噦噦喳喳的幾千名會眾。他清楚、直率、堅定地對著人們講了復活節早上的道。他們如此頑梗地向被釘十字架的基督犯罪，怎麼還可以伸出手來領聖餐呢？神決不允許！復活節主日早上兩個教堂內都沒有聖餐。牧師們擠出翁翁聲的人群，回到他們的住處，身體未受傷害。下午他倆交換了教堂，接著講道。聽眾們靜靜地等待著，當加爾文直言不諱地談到日內瓦的問題時，底下的人跳了起來，手中的劍射出寒光。他們吼叫著湧向前去。加爾文朋友們衝了上去，用身體圍起一堵人牆。後來，據在場的人回憶說，那天簡直是個奇跡，一滴血都未流，人牆護送他回到住處。

他倆在家裡等著議會的下一步。下午，日內瓦行政長官召開緊急會議。禮拜一早上，大議會作出決議：牧師們三天之內收拾行李，離開日內瓦。

手持銀杖的來轉告此決定，加爾文回答說：「很好，我們若是在服侍人，這可算是以怨報德；但我們服侍的是全然美善的主，他賞賜我們。」三位法國牧師騎上租來的馬，走過吊橋，穿過護城河出了城門。他們離開了日內瓦。瞎眼的老人剛從獄中出來，紅鬍子的那位早已適應了被趕出城去的滋味。那位瘦瘦的，長著一雙具有穿透力眼睛的年輕人在此呆了二十個月，而不是他所計劃的一個晚上。那天是1538年4月25日。

第二十章

庫勞德身體不好，留在了一個小鎮上，那裡有他的朋友。法雷爾和加爾文繼續往前走。牧師被趕出教會可不是件小事，他們想在伯恩議會和全瑞士的教會大會上為自己辯護。

一路上，他們一直在思考。歹徒們的聲音已經消失了。靜下來思考，他們問自己：他們在一些事情上是否過於激怒，過於強硬，過於固執了？他們對於自己宣講的信仰毫不懷疑，他們對於教會需要有秩序、會眾生活應有紀律也毫不懷疑，但是他們是否使用了合適的方式來使這此秩序、紀律建立起來？

加爾文和法雷爾在蘇黎世的教會大會上，表示願意接受伯恩關於教會規據的建

議，但他們仍相信市議會不該為教會這些事作決定，他們也重申了建立教會紀律的必要性。

眾教會都希望不出亂子，大會希望他們兩位牧師能夠重新回到日內瓦教會。大會請伯恩派代表去日內瓦安排此事。但日內瓦議會予以拒絕，並派出一名信使去見加爾文和法雷爾。他們倆已經向日內瓦出發，若事情能順利解決，他們就回日內瓦。信使在路上遇見了他倆，信上申明不准他們進入日內瓦。

加爾文和法雷爾再次調轉馬頭，朝著皮埃爾教堂鐘樓相反的方向走去。還能做什麼呢？他們決定去巴塞爾，那裡是加爾文曾寫下他的《**基督教信仰要義**》第一版的安靜去處。巴塞爾距他們有230公里的路，1538年5月兩位牧師來到巴塞爾。

加爾文寫信給洛桑的維勒特：「我們終於到達了巴塞爾，但渾身上下濕透，人也筋疲力盡。一路上幾經險境，一次在過河時差點兒連人帶馬被激流沖走。但是，奔騰咆哮的急流對待我們要比那些我們與之相處的人對待我們溫柔多了……」

兩位單身的牧師打算住在一起，但很快法雷爾就被催著去納沙托市，那裡的宗教改革是他帶去的。斯特拉堡則寫信來，請加爾文去他們那裡。七月底，他拜訪了那裡的牧師們，他們請求他去作從法國受迫害逃亡出來的難民們的牧師。但加爾文還未準備好再作一間教會的牧師。

他在斯特拉堡寫信給杜蒂耶，就是那位離開他的朋友：「我會在巴塞爾退休，等候看上帝要我做什麼」。他一個人等在巴塞爾，最親密的朋友法雷爾去了納沙托當教師。他給法雷爾寫了封信，這也是後來許許多多的信中的第一封，他告訴法雷爾，關於日內瓦新任命的牧師所引起的麻煩，他寫到「但是……讓我們謙卑自己……神要我們謙卑，不然的我們就是在與神對抗了，讓我們來等候神」。

兩星期後又寄了封信給法雷爾。他不顧生命危險去幫助法雷爾的外甥。他寫道：「上個主日，你外甥染上瘟疫。他的同伴和那位曾在里昂為福音作見證的金匠將消息告訴了我，我當時頭痛正發作剛服了藥，無法親自去看他……一位婦女設法幫助他……我稍好一點後立即去看望他，跡象表明他已經快不行了。我盡力向他提供不是身體而是靈魂之藥。他神志尚清楚，卻似猶豫不決，但很快又叫我進去他的房間……為他禱告……今天早上5點左右他去了主那裡……那位金匠真好，因為去探望染上瘟疫的人而被僱主開除。我已為他寫了推薦信，送他去斯拉特堡，或許可

以在那找到工作……你外甥留下的衣服物品有一件襯衫、一把劍，都在房東那裡，但我肯定，他病倒時身邊沒有錢」。

加爾文為死者付了醫藥費和喪葬費。雖然他靠賣掉自己的圖書生活，為了幫助朋友的外甥，自己的金錢和健康他都在所不惜。那位金匠就是因為接觸了瘟疫病人而被僱主開除的，可見那瘟疫的可怕性。像

1538年9月初，離開日內瓦不過5個月，加爾文突然又從巴塞爾去了斯特拉堡。前面提到，一開始他沒有答應馬丁·布捨牧師和他的同事們。但布捨知道怎樣效仿法雷爾，當請求未遂之後，他威脅說「神知道如何找到叛逆的僕人，就像找到約拿一樣」。

加爾文搭乘一艘駁船從羅納河北上行行了150公里水路之後，來到斯特拉堡。他在給法雷爾的信上說「……我離開巴塞爾時匆匆忙忙，都來不及整理妥當……」上天來的手又一次將他從安靜的研究中帶走。

但此後三年斯特拉堡的生活比起日內瓦的恐怖來，簡直是場美夢。這是一座安寧的城市，著名的雅各·斯特恩市長贊同宗教改革。他在當地為孩子們建立了多所學校。改革宗的教會在講道、教導、聖餐上，都有良好的秩序。他們有家庭探訪，也有一套紀律，雖然開除教籍還是要由市議會來決定。

到斯特拉堡不久，加爾文又一次站在講台上，那是1538年9月8日。這次與上次日內瓦教會裡那場暴風雨般的講道真不可同日而語。他所在的聖尼古拉教堂位於城南，城外是一大片草原，會眾是一群從法國逃出來的難民。信仰對他們來說是如此珍貴，他們就是為此信仰從法國死裡逃生出來的。他們懷著敬畏、渴望之心聆聽牧師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對他們講道。一個月後，加爾文寫信法雷爾說「我們第一次在我們的小教會中進行了分領聖餐，按此地的規定，每月進行一次。」

這裡沒有暴徒，沒有吵架，沒有吼叫聲，沒有恫嚇的槍聲，也沒有叛道的人出現在聖餐桌前。加爾文可以在街上安全地行走。彎彎曲曲的依爾河穿過城市；兩岸供人散步的小徑伸向遠處，靜靜流動的河水反射著伸出河岸的樹枝。河的一邊是一座宏偉的羅馬天主教堂，典型哥特式建築的傑作。150公尺高的天文鐘高聳入雲。這口鐘在歐洲久負盛名。上面除了時間以外，還刻著許多星球，象徵十二使徒的十二根指針，每個鐘頭敲響一次。代表彼得的那根針在敲響時會發出金雞鳴聲，那只

鍾至今仍在那裡。

離此天主教堂不遠是小一點的聖湯馬斯教堂。馬丁·布捨博士在此牧會。教堂內的雕像、祭壇早已撤去，空蕩蕩的教堂成爲抗羅宗的敬拜之處。

布捨的家離教會不遠。加爾在他家住了一陣子，他不是唯一的客人。這個家是以「公義的旅館」聞名的。許多逃亡者和旅人都在火爐前取過暖，在餐桌上吃過麵包。除了不斷的客人，布捨有6個孩子，女主人伊麗沙白和布捨一樣好客。

加爾文現在是德國自由城市斯特拉堡的牧師。此城市被稱爲宗教改革的安提阿〔註：位於今天的土耳其境內，是第一世紀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出去後，第一個大教會。信徒被稱爲基督徒就是從這裡開始的〕。當時的日內瓦應如何稱呼——所多瑪？〔註：舊約中罪惡滿盈、遭上帝毀滅的城市〕

第二十一章

約翰·加爾文這個29歲的法國難民牧師，不僅以安提阿換了所多瑪，他自己似乎也改變了。他不像以前那樣容易激怒，他更能聽別人說，也更願意學。他在日內瓦的那段時間裡，顯然沒能順利地傳福音。他仍然在思考日內瓦所發生的事。在給法雷爾的信上加爾文寫道：「我們願意在神的面前承認……我們不夠老練……我們被神管教是應當的」。

在斯特拉堡，加爾文願意「按此地的規據，掰餅喝杯。雖然他不允許接生婆爲新生兒施洗，因爲這與神的話直接相違背，但對於教會裡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他也能容忍，並且也勸法雷爾說：「我們要盡力勸弟兄們不要爲那些小事爭論……」

他所教的學生們再也沒有人帶著劍進來。但對於他們穿著不整潔、不端莊他不會提高嗓門。他還告訴法雷爾：「也不必把紀律定得那麼嚴，以免搞得人人膽小慎微」。加爾文身邊火焰般的法雷爾換成了布捨。他成爲一位繁忙的牧師、教師和作家。他很享受在這個法國難民的小教會牧會。他的講道吸引了許多周圍地區說法語的人。他也小心地依照布捨所使用的教會敬拜順序，那是從路德宗來的。他們滿懷激情地歌唱令人興奮不已。1539年加爾文出版了一本詩歌集，其中有18首《詩篇》和《使徒信經》。有些曲子是他譜的，另一些是克萊芒·弗拉特作的曲，他就是1536年加爾文在意大利的弗拉拉城堡遇到的那位詩人。

加爾文將原來想在日內瓦教會實行的事一件一件付諸實踐。1539年春，他的會眾投票採納了斯特拉堡其他教會所用的教會紀律。他們也很喜歡自己的牧師。他常出各家控訪；他愛他們，教導他們，給他們講道，領他們掰餅喝杯。

加爾文也被任命為斯特拉堡高級中學的聖經老師。此校後來成為全歐州最傑出的學校之一，校長是來自巴黎著名的約翰·斯特姆，也是加爾文的好朋友。除此以外，他也答應給城裡的公民教聖經，就如在日內瓦時那樣。他寫信告訴法雷爾「我每天不是教課就是講道」。

他在這裡完成了《綱要》的拉丁文第二版，比第一版大得多。他也把這一版翻譯成法文，翻得極美，以至後來人們稱加爾文為現代法語之父，正如路德因將聖經翻譯成德文而被譽為現代德語之父。

1539年10月他的《羅馬書》講稿付諸印刷。這是加爾文寫的許多極為純正、精闢的聖經註釋中的第一本。他也寫了一本關於教會敬拜順序的小冊子，解釋了他認為什麼是根據古教會的，最好的敬拜順序，其中也包括聖餐的方式和簡單的婚禮儀式。

接著他出版了《簡論主的聖餐》一書。共有6個短章節，是以法文而不是學者所用的拉丁文寫成的。加爾文希望普通百姓也能讀，因為當時在教義上最大的爭論就是聖餐。在此教義上，路德、慈運理、教皇、加爾文和他們的跟隨者們都不能達成共識。奇怪的是，這位法國難民的牧師竟成了裁縫協會的會員。那時，一個人若不加入某一行業的協會，無論是屠夫、木匠，還是鋪路工、賣布商協會，就不能成為斯特拉堡的公民。

為了成為公民，他從羞澀的錢包中擠出了20福林交給裁縫協會。他是否真有裁縫天份，還是他教課的地方離裁縫協會很近而加入，這我們就不得而知了。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約翰·加爾文自從離開祖國法國之後，第一次成為一名公民。

然而，在此安寧城市中的這個大忙人，還是有他的麻煩和傷心。他一貧如洗，就如在日內瓦一樣，斯特拉堡議會答應付工資給他，但又把此事情忘了。等到他們發現時已經六個月過去了。他的工資是每星期1福林，勉勉強強夠他的生活費。他在給法雷爾的信上說：「眼下我幾乎撐不下去了，但只要是我欠的賬，一旦有能力支付，我一定全數還上。眼下我口袋裡幾乎一文不明」。

他和法雷爾仍欠他們在巴塞爾的房東錢。房東寄來一張帳單，其中包括一瓶葡萄酒的錢。可加爾文記得這瓶酒是別人送的。他寫給法雷爾，算出了各自應付的部分：「我們不必客氣……你住了七個星期又二天，我住了兩個月又十二天……我就這樣算：我付5個金先令，你付4個。但我欠你一個半金先令，只要一有機會我一定付還給你……我大概一共有20個巴塞爾先令。」他一分多餘的錢也沒有了。

有人主動願意來幫助這個窮牧師，杜蒂耶從法國寫封信來「您目前的處境大概不妙。假如您生活實在困難，請您不要在意……假如您願意，神允許，我會支援您」。

杜蒂耶在此信中建議加爾文可以回法國，並暗示可以回到羅馬天主教。加爾文回信說，他確信神帶領他在斯特拉堡，在抗羅宗教會服事。他不想花朋友的錢欠任何人情債。他很有禮貌地回信：「您主動提出要幫助我，實在令我不知如何來感謝您……但我不敢再給您增添負擔了……在過去的年月裡您已經為我花費了太多了」。

不久，一個說話很敬虔的騙子來找加爾文。他聽上去是那麼好的一位基督徒，說服了這個窮牧師借給他十八金法朗，加爾文不得不自己再去借一部分湊足款子，他留下一隻藍子，說裡面是他的財產作抵押，以表誠意，很快就會歸還。

加爾文在一封信裡寫道：「幾個月後他回來了，微笑著——不，是嘲笑著——問我，是否願意再借些錢給他，我告訴他我需要那筆借給他的錢」，騙子什麼也沒說就消失了。一年半之後，加爾文決定打開他留下的那只藍子，他請來了斯特姆校長和另外幾位朋友，一起打開，看見了裡面的寶貝：幾個爛李子，幾件破衣服，幾本舊書和一些從別人那裡偷來的信件。儘管是受害者，他也與眾人開懷大笑起來。

在布捨家住了一陣子後，他去租了一棟房子，一些學生也搬進來合租，但麻煩也不少。有時學生付不出房租，有時那個說話粗魯的女管家會引起一場大亂，有時候加爾文自己也會被頭痛、胃痛折磨失去控制而發脾氣。加爾文告訴法雷爾說，有一次他完全失去控制，原因是那個一度在洛桑任牧師曾指責日內瓦的牧師們不信三位一體的卡羅利再一次宣佈從羅馬天主教轉到抗羅宗，也再一次離開法國跑到瑞士，跑到斯特拉堡來。加爾文和法雷爾決定忘掉從前的事，以愛心接納他，假如卡

羅利真的改變了的話。但他卻是再一次來進行攪亂。他在斯特拉堡試圖說服布捨和其他傳道人，起來懷疑加爾文。幾位傳道人和卡羅利一起草了一份關於信仰教義的聲明，簽了名，當晚送到加爾文那裡要他簽名。這幾位傳道人爲了要達到和睦相處，同意了卡羅利的思想，但其中許多加爾文是不同意的。

假如他簽名，就對不起他的信仰；若拒簽，卡羅利就會指責他遠離朋友，一個人獨來獨往。加爾文非常氣憤，要求牧師們一起開個會，他們決定在其中一人家裡的晚餐上討論。加爾文寫信告訴法雷爾說「那次我犯了大罪，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竟被怒氣沖昏了頭腦，向眾人發火」。

他接著寫道「這裡當然有令人引起義憤的原因，但我若能在表達時有節制就好了……我表示自己寧死也不會同意……我跑了出去，布捨跟了出來，用他合情合理的話使我安靜下來，勸我回到屋裡……回到家後，我痛悔不已，痛哭流淚，幾乎不能控制」。這是一位基督耶穌的僕人，一個與他自己的罪掙扎的人，他在失去控制之後，痛苦地流淚。

在斯特拉堡還有更多的事令人悲痛，令人流淚。那是在加爾文來此一個月後，當時他還住在布捨家，傳來了盲人牧師庫勞德去世的消息。傳說他是在奧口沃比地區的一個鎮上傳道時遭人下毒而死的。加爾文在給法雷爾的信上說：「庫勞德的死令人痛苦得幾乎崩潰，甚至白天的忙碌也不能令我忘懷……白天的憂慮和苦惱只是在準備晚上更痛苦、更痛心的思考，我不僅僅是因由此而引起的失眠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整夜憂鬱沮喪纏繞著我……這種殘暴的行爲不是沒有原因的……主讓我們這些人尚在世上存留，讓我們在已去了的弟兄所走過的道上堅忍下去，直到跑完我們的路……」

不僅庫勞德離世去了，在意大利弗拉拉公爵夫人宮裡的奧裡維坦也死了，年僅32歲，據說也是遭人下毒而死。先是另一位傳道人遭害，下一位是他的表弟，就是加爾文在巴黎時從他那裡聽到改革宗信仰，加爾文也爲他翻譯的法文新約的聖經作過序的那位表弟。他們不僅在信仰上，也在血緣上緊緊相聯。

幸好加爾文在斯特拉堡並不是孤單一人。學校、教會有他許多的朋友，還有同父異母的妹妹瑪莉亞、弟弟安東尼。若干年前，他倆離開家鄉挪揚與這位出了名的哥哥在一起，他們在巴塞爾住過一段時間，可能在日內瓦風風雨雨的那二十個月

也在那裡，現在他們能與他一起住在斯特拉堡，使他很高興。然而布捨的話不時在他耳邊響起：「你必須結婚」。

第二十二章

加爾文寫信給法雷爾說：「我們希望新娘會在復活節之後就來此地，你若確定會來，我們的婚禮就一定等到你來……我要求你來……你也曾保證過你會來……我最希望的就是你來」。這場原計劃要請法雷爾來證婚、祝福的婚禮並未發生。此後也沒有再提及那位預料在復活節之後會來的女士。在朋友們催促之下，五月在給法雷爾的信上又提到了結婚的事。他告訴法雷爾他對心目中人的要求：「我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對方的美貌就會不顧一切墮入情網，連對方的敗壞行為都照樣接納無誤的人。吸引我的美乃是：樸實無華而富有耐心，不過分挑剔但善於勤儉持家，最好也願意照顧我的健康」。

到了來年2月，這位牧師還在盼望他的婚事，在給法雷爾的信中說：「在此種種混亂之中，我對自己競厚顏的想要娶妻這件事，倒還覺得平安。有人也曾為一位出身貴族的名門閨秀提過親，據說還有大量的陪嫁，兩件事使我不願與對方交往。一件是她不懂我們的語言法文，另一件是我擔心她會太看重她的名門出身和貴族教育。她哥哥是位敬虔之人，極力想促成這門婚事……她嫂嫂也很熱衷……後來我回答說，除非對方願意學習法文我才能訂婚。對方要求給她一點時間考慮。但後來那位貴族小姐不願意學法文」。這件事提醒加爾文不應再往前走，他接著寫道：「這以後，我請弟弟和一位德高眾望的人一起去代我向一位女士求婚。認識她的人都極力推薦說她人品極好」。這位侯選取人會帶來的大堆陪嫁不是金錢而是德行，他繼續寫道說：「假如事情順利——我們當然是這樣希望——那麼婚禮會在3月10日前舉行，我希望你能光臨，為我們祝福。不過，這一年多來我已過份地麻煩你了，這次我不敢要求你來……不然的話，這次結婚的希望若再次落空，我就實在是個傻瓜了」。

這次的希望還是落空了，加爾文不打算進入這個婚姻。3月29日給法雷爾的信上說：「我們的婚事又暫告停頓，我自己也極受困擾」。那位女士催促著要成婚，「除非主讓我失去控制，我不會娶她，但拒絕她又是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尤其是

牽涉到那些好心人，我真巴不得能夠從此窘境中脫離出來」。

加爾文成了問題的焦點。他怎樣才能有禮貌地拒絕一位不想要的人呢？只好找弟弟安東尼，他是此事的紅娘。這件事使加爾文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他下定決心，以後一定要極其小心，免得再陷入這種尷尬局面。到了6月，他在信上說：「我還是沒有找到妻子，常常爲此事憂慮不決，不知道我是否還需要繼續努力」。

接下來是1540年8月，加爾文結婚了。法雷爾從納沙托來爲他們證婚。加爾文在自己的會眾中找到了新娘。一旦找到她，他們沒有久等就成婚了。新娘是位有兩個孩子的寡婦，除了符合加爾文所列出的所有條件之外，她還非常美麗。

依多萊特·戴波爾來自吉德蘭省，現屬荷蘭。前夫是做生意的，叫斯多迪阿，是在斯特拉堡聽了加爾文講道之後從重洗派改信改革宗的，不久死於那場瘟疫。

加爾文再也不可能找到像他現在這樣的妻子了。但是從結婚開始，法國牧師這位善良的婦人一直沒有全部擁有過她的丈夫。搬進加爾文住的那棟學生公寓，首先遇到的是那位尖舌的女管家。但依多萊特從來抱怨過。她不僅富有耐心、甘心服侍丈夫、樂於分擔主交結他的工作，她自己也常去探訪病人，安慰受苦之人，與人分享她的信仰。

妻子的愛使加爾文得到了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過的幸福。布捨說得對，結婚很好，特別是娶一位善良的太太。難怪法雷爾也向他推薦說要結婚，儘管他自己已過五十還是個單身漢。

他倆婚姻上的烏雲是身體軟弱與疾病。在給法雷爾的信上加爾文說：「就好像是命定的……神對我們過分的喜樂作了調整，叫我們不致因我們的婚姻而忘乎所以」。婚後不到一個月，夫婦倆就開始被疾病所纏。

在此同時，又與女管家發生矛盾。那是一個禮拜一早上，女管家對弟弟安東尼說了很粗魯的話（她常常這樣），安東尼一聲不響地離開那棟房子，並發誓說只要女管家在，他永遠不來。接著是女管家自己也出走了，因爲她看到加爾文對安東尼的事那麼傷心。但她兒子仍在那裡，那天晚上加爾文吃得過多，「我經常如此……當生氣或被極大的憂慮攪擾時，就會濫吃……以致第二天早上都被不消化所折磨。」平時遇到這種情況，他就什麼也不吃，但這次他擔心管家的兒子：「我若拒絕，他會以爲是間接地表示要辭掉他」因此儘管胃不舒服，爲了不傷這個年輕人

的心，他還是吃了。

下午講道時就感到很難受，晚上竟暈了過去。接下去就是發冷又發燒，每隔一天發作一次「我病得幾乎連手指都抬不起來」。他還未恢復之前，妻子又因其它原因發燒，「連續八天來她病得都坐不起來」。

在九年的婚姻中，兩個病人一直被疾病所纏繞，但卻沒有抱怨。幸福已經叫他們知足——他們因對方而知足，因神決定送到他們生活中來的一切而知足。

第二十三章

神的工作是不能等到完全恢復健康的，甚至身體還在發著燒，加爾文與卡皮多、布捨他們「一起工作，就好像我很強壯似的」。

重任就在眼前，神聖羅馬帝國的意大利查爾斯皇帝想要使羅馬教廷與抗羅宗合起來，他需要此聯合，為的是要來對抗正從東邊壓境的凶悍的土耳其大軍。在此緊迫的情形下，若能把抗羅宗的日耳曼各國與羅馬聯合起來，對他極為有利。

於是皇帝決定安排幾次會議，這些會議被稱為帝國議會。從1539年到1541年共舉行了4次。日耳曼各省和那些自由城市都派出代表與會；每個省的王子都以當地教會的官方代表出席；每次會議都少不了漫長的辯論和談判，雙方代表每天都發生衝突。

加爾文作為斯拉堡的公民，被這個日耳曼的自由城市作為代表派去參加。他只是一般的代表，無論如何，他不過是個法國人，被這個德國城市派作代表已經是件榮譽的事了。此外，他對此類會議並不包括希望，怎麼可能使羅馬教廷與抗羅宗手拉手到一起呢？他在給朋友信上說：「對我自己來說，我並不抱希望」。但他那雙鷹眼卻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他仔細地分析每位帶領者，每次主要的辯論，他在給法雷爾的長信裡有詳盡的述說，就像當時的一位駐現場記者一樣。會議上也討認各種國際事務。

會議上，加爾文在這裡遇見了日耳曼各省的王子們、神學家們，其中最重要的是馬丁·路德的右手人物菲立浦·墨蘭頓。加爾文於1539年春在法蘭克福遇見他，倆人之間的友誼迅速發展起來，一直持續了24年，直到後者去世。墨蘭頓比加爾文大12歲，極有學問，在多種語言上，學術上卓有建樹。21歲那年被任命為威登堡大

學的希臘文教授。他為人隨和、友善，但有時太過於友善而在一些本該堅定站立的事上傾向於妥協。他的性格特點與他的主人路德正好形成鮮明對照。

墨蘭頓第一次遇見加爾文時一定對自己說「原來這就是那個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熟諳古教會先父們的年輕人哪，在那雙具有穿透力的眼睛後面是一顆什麼樣的腦子啊！」在一次會議上，墨蘭頓給他的法國朋友起了個外號。那次加爾文將一位羅馬天主教的神學家駁得體無完膚。從此以後，墨蘭頓與人談到加爾文時，都稱他為「那位真正的神學家」。要知道，從墨蘭頓嘴裡出來的這個名字，實在不是恭維而是讚賞。

加爾文稱墨蘭頓「具有無以倫比的知識……敬虔與美德，值得任何世代的人欽佩」。後來加爾文在給他的信中說：「我不過是個後生晚輩」同時他也親密地以名字而不是用姓來尊稱對方。然而，當這個德國人太急於妥協、調和、太不願意對德國眾教會注重諸多的儀式而缺乏紀律的事上站出來，加爾文會毫不遲疑，直截了當的地當面向他指出。他在寫給法雷爾的信上說：「對於這些事，我當著菲立浦的面直接向他提出。」

一方面，加爾文相信自己在聖經所教導的教義上站立得岩石般堅定；另一方面，他也能從未停止過努力催促，使抗羅宗教會的合一。只要這些不牽涉到基本教義，他願意忽略教會中那些人為造成的不同。在給法雷爾的信上，提到布捨時加爾文寫道：「他不同意在這些存爭議的儀式上我們應與路德分離，我當然也不認為這些是促成不和的理由」。

在神話語所教導的教義上，加爾文毫不妥協。但他仍花大量時間，努力使其他人也相信他所相信的。在給法雷爾的信上說「我事先已經寫信給菲立浦，說明了我對達成協議的事所作的聲明。我與他作了許多討論」。這位法國人和德國人之間討論的一個重大主題，是關於主的聖餐。基督的身體是怎樣體現在聖餐裡的？餅並非像羅馬教廷的追隨者們所說的，轉變成為身體。在這點上，他倆很快就同意了，但是基督的身體是否象路德所堅持的，是與餅同在？在餅的上、下還是在其中呢？加爾文以聖經為據，說基督的身體和血不是在物質上與餅和葡萄酒同在，基督的身體和血是屬靈意義上存在於聖餐中。」在與墨蘭頓討論之後，加爾文高興地寫信告訴法雷爾：「對於墨蘭頓自己來說，你不必懷疑，他與我們看法完全相同」。這是

不是路德宗與加爾文之間取得一致意見的開頭呢？問題是，在贏得溫和的墨蘭頓之後，也能贏得墨氏的主人和那些德國王子們嗎？

抗羅宗的另一邊是瑞士改教家慈運理的一派。他們跟隨慈運理，在關於聖餐中主的身體一事上，認為聖餐是一種紀念基督之死的儀式，他們不如加爾文注重此事的屬靈聖禮。因此，加爾文是站在路德宗與慈運理派之間，他想要一邊伸出一隻手將這兩派聯合在一起。他在寫那本《簡論主的聖餐》一書時就是抱著此希望的。他想要使這本書成為有利於抗羅宗各派討論的基礎。他在書中的語言是堅定的，同時也是很小心，他沒有用他常用的一些強烈語調。

1545年馬丁·路德在一家德國書店裡讀到這本由法文譯成拉丁文的書後說：「早知如此，從一開始我就會將這件有爭議之事整個地交給加爾文，若反對我也如此做的話，我們早就該和好了。」

馬丁·路德從未見過約翰·加爾文。這位偉大的德國改教家在寫給朋友布捨的信上說：「請代我向斯特姆和加爾文致敬，我特別喜歡讀他寫的那些書！」墨蘭頓告訴加爾文說，路德常常提到關於他的事。加爾文在給法雷爾的信中說：「菲力浦……在信上說，路德和波米拉諾斯特別要求問候加爾文，他們很看重加爾文。菲力浦還告訴我說，有些人為了刺激路德，把一段我寫的批評路德和他的朋友們的文章拿給他看，路德仔細地讀了那段文章後說，我希望加爾文有一天會把我們想像得更好些；無論如何，他今天就應該知道我們對他的好感」。加爾文接著說：「假如我們不被這種溫和的反應所動，則真是石頭一般了。對我自己來說，我為此深深地被感動。」

幾年後，當路德開始在聖餐之事上大動感情地發火時，加爾文站出來為他辨護。他寫信給慈運理派的領袖：「我們必須記往路德是何等偉大的人」他列舉了路德的偉大事績之後又說「即使他稱我為魔鬼，我仍然尊敬他，稱他為神的好僕人。」

加爾文也寫了封信給路德，那是路德臨死前幾年。當時他變得非常易怒，時常發脾氣。墨蘭頓沒有將此信交給路德。他向加爾文解釋說：「我沒有把你的信轉交給馬丁博士。現在他容易多疑，對於你在信上提出的問題，他不想讓他的回答被人傳來傳去」。在加爾文的這封未送到收信人手裡的信裡，他附上了一些他寫的東

西，請路德評論，並加上一句說：「假如我能飛到您那裡，哪怕是短短的幾個鐘頭與您在一起，我也會很享受……但知道在此世上我們沒有得到此機會，我希望很快我們就會在神的園裡相見。再見，最著名的人，基督最出色的傳道人，我永遠尊敬的父親。」

若是神選擇使改革宗的巨人們在他話語的基本真理上合起來，誰能想像得出抗羅宗教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假如那一天曾臨近過，那就是諸如加爾文、路德和墨蘭頓這樣的人能夠面對面，或通過信件來互相認識、互相瞭解的那天。儘管有分歧，他們仍將對方看作是基督裡的弟兄。今天我們或許能從這些偉大的改革家們身上學到一課。

第二十四章

加爾文哭了。他幾乎被抽泣所窒息。他將臉埋在雙手之中。

在這位哭泣的人面前，是一封信。幾位騎馬來的信使跑了幾百公里路，將這封信送到他手裡。他們先是到了斯特拉堡尋找那位法國牧師，議會告訴他們，加爾文牧師在沃姆斯，他代表我們城市在那裡參加第三次帝國議會。

信使騎馬繼續向前奔去，進了沃姆斯的城門，穿過熱鬧的街市，一路打聽，終於找到了收信人。他們莊重地將信交給他。

「福音的執事，加爾文博士敬啓」這是寫在信封上的字，裡面則以更親切的口氣寫道：

「我們滿懷熱情地向您推薦我們自己。因為我們確信，除了要推動、展示神的榮耀、神的神聖話語之外，您別無他求。我們謹代表小議會、大議會和全體日內瓦人民……我們迫切地請求您能回到我們這裡來，回到您的老地方、老事工上來；我們盼望，在神的幫助下，此事將會大有益處，將會結出更多的果子。我們的人民極盼望您回到我們中間。他們願意、並且一定會以您滿意的方式待您的。將會結出更多的福音果子。」

您的好朋友

日內瓦行政長官暨議會

1540年10月22日

蠟封的議會公章上刻著日內瓦的警句：

黑暗之後是光明

現在，這位被如此想要請回日內瓦的人坐在信前哭了。信使們表達了他們自己的請求之後走了。坐在加爾文周圍的是斯特拉堡的會議代表們。他請他們來，要聽他們的意見。交談中，他兩次不得不離開屋子，不讓那中斷他講話的眼淚流出來。

「請你們幫助我」，加爾文乞求他的同伴們：「告訴我該怎樣做」，請勿考慮我和我的感情，唯一考慮的是何種方式對福音的增長、對神的榮耀最有好處。我一直被痛苦纏繞。你們知道，我已為這決定掙扎了許久，但我沒有答案。我所信靠的朋友們，請幫助我，我需要你們的幫助。斯特拉堡的人們誠摯的回答說：「我們的好弟兄，你知道我們城市是多麼想要留住你。其實，當日內瓦的信使們到斯堡之後，議會特意派了快馬來告訴我們，不要對日內瓦作任何許諾，要我們留住你。若是依我們看什麼是對基督最有利的，我們就巴不得將你留在斯堡，但神若另有旨意，我們怎能擋住你的路？不過請留下來，等到這次會議結束，再考慮你當如何行」。

20年前，馬丁·路德在沃姆斯勇敢地站立在皇帝面前說「我站在這裡。我心無二願，上帝啊，求你幫助我！」這是路德的永垂不朽的話[註：當年路德在此勇敢地為自己的抗羅行為辨護]。現在加爾文也在這座城裡，遠離自己的家、遠離新婚的妻子。他與其他代表們擠在旅館的一間大宿舍裡。9月的那場疾病使他身體仍然很虛弱。等待期間，他與墨蘭頓在一起私下討論、辯論有關信仰上的各項事情。墨蘭頓就是在此給他起的外號叫「那位真正的神學家」。幾百名與會代表們越來越焦急不安，因為會議還不知道何時能開始，大會主席格蘭維爾公爵還未來到。一個月之後他終於來了。接著幾個星期，討論大會的日程和辯論方式，最後終於在1541年1月14日，辯論正式開始。加爾文在此足足等了兩個半月。

二個半月裡，他一直在為日內瓦的事掙扎。這不是新問題，這封送到沃姆斯的信並非出於意料之外，只不過是在他的重擔上加上了份量。日內瓦的這付重擔從未離開過他，哪怕是在離開這座叛逆的城市，成為和平的斯特拉堡公民之後。離開日內瓦五個月之後，加爾文曾寫信給那裡的教會；九個月後又寫信去安慰，勸告弟兄們要以愛和睦相處，1539年9月，他花了6天的時間，寫了封1萬5千字的長信給那位

想要把日內瓦勸回到羅馬教會的紅衣主教。那是一封怎樣的回信啊，主教大人從此閉上了他那張善於雄辯的口！

這位頗有學識的紅衣主教叫撒道萊特。1539年4月，他寫了封恭維、勸說的信給日內瓦。在信中，他以華美詞藻盛讚了日內瓦和她的人民。他說，「那些到處惹事生非的抗羅宗們，在貴城忠心的羅馬天主教裡鬧起如此的風波，實在令人傷心。如今，你們日內瓦人民勝利地將這些鬧事的牧師們趕了出去，我們是否可以以真實的愛心邀請你們回到母教的懷抱，回到那永世的羅馬教會」？

日內瓦無人能給撒道萊特的這封感人的信作答覆。後來，加爾文的朋友們將信送來，請他幫著回信。他能拒絕嗎？不僅要幫助日內瓦不致回到羅馬去，他自己也仍然是日內瓦的一份子。他給紅衣主教回了封信。加爾文以日內瓦教會的名義告訴撒道萊特：「當神將我放在此地，令我永遠對此教會忠心。關心此教會的安全是討神喜悅之事。因此，當我看到日內瓦教會所面臨這最險惡的網羅時，我當盡上最大的努力……誰可以來勸說我對此事保持沉默、漠不關心呢？」

加爾文給撒道萊特的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揭示了加爾文與羅馬天主教之間的爭執。此爭執影響、決定了他的一生。首先，此爭執的關鍵並不在於宗教改革的觀點，即：稱義的教義、神職人員的濫權、人為的聖餐變體、向聖徒禱告、教皇的特權等等，這些後來都會論到。對於加爾文來說，在所有這一切底下，最根本的問題是神的榮耀之中心性、絕對性。這也是加爾文一生從頭到尾的目標。

他在信裡對主教說「你那種對天堂生命的熱心，是使一個人完全獻身於他自己的熱心。即使是以聖潔神的名義，也是為要激勵他自己」換言之，哪怕是關於永生的寶貴真理也可以被歪曲、偏離到用來代替神而成為萬事的中心與目標。這就是加爾文向羅馬教廷的最大挑戰。這在他日後的寫作中一再、一再地出現。接著他向撒道萊特指出他應當如何行，這也是加爾文一生努力的目標，即：教導人、讓人知道人生最主要的動力應該是熱心展示神的榮耀。[註：此段引自《The Legacy of

《Sovereign Joy》，作者是約翰·派爾帕。

在斯特拉堡，加爾文不斷地聽到關於日內瓦的消息。教會的四位新牧師是軟弱的人，情願跟隨眾人，其中兩人是伯恩派來的。城裡的放蕩生活變得更放蕩，有人甚至吹吹打打地在街上裸行。

終於，對此的抵抗也漸漸開始。議會通過了更嚴格的法律，雖然他們沒有執行。那四個反對加爾文的行政長官下了台。其中之一因叛國罪被處以絞刑，另一同謀則從城牆上跳下摔死了。另外兩位行政長官迅速逃之夭夭。他們曾策劃將日內瓦交在伯恩手下，那兩位伯恩派來的牧師也走了。

在這一切不安之中，人們越來越覺得沒有加爾文那只堅定的手日內瓦無法生存下去。早在1540年3月，趕走加爾文還不到一年，朋友們就寫信希望他能回來。加爾文聳聳肩，在給法雷爾的信上說「我寧可死一百次也不願背那個十字架。在那裡我一天要死一千次，我將此事告訴你……請你務必盡全力阻止任何想要把我拉回日內瓦的努力。」

洛桑的那位可愛的維勒特牧師也聽到了傳說。他寫信鼓勵加爾文，考慮回日內瓦，並說那裡的新鮮空氣和良好氣候對加爾文的健康會有好處。加爾文苦笑著回信：「我讀到您信上的那段忍不住要笑起來。您表示了對我身體健康的關心而推薦日內瓦……我寧可乾脆一次死掉也不願到那個地方去受煎熬。因此，我親愛的維勒特，若您真的希望我好，請不要再提此事。」

1540秋，議會採取了行動。9月21日小議會委託議會領袖培林，設法將加爾文請回來。10月13日議會決定給加爾文寫邀請信。10月19日，大議會決定「爲了上帝的榮耀得以彰顯，務必要請加爾文來做牧師」。次日，日內瓦人民集合起來，人們喊著「我們一定要加爾文回來」，並一致決定派專人去斯特拉堡鄭重邀請約翰·加爾文回來。

此後，信件、特使不斷地來找加爾文。日內瓦又請抗羅宗的伯恩、蘇黎世去說服斯堡。蘇黎世答應去試試，可是伯恩卻毫無興趣，因爲他們想控制日內瓦的目的一直未能達到。許多人私下寫信給加爾文：「快來吧，弟兄啊，得勝地來吧，好叫我們因我們的救主神而喜樂！」另一封信上說「請不要說『不』」，那樣您就是在拒絕聖

靈而不是拒絕人。日內瓦教會很重要……沒有人能像您那樣有智慧、有能力、有力量地來帶領我們的教會。那兩位留下來的牧師從前曾反對加爾文，現在也說「我們在基督裡尊敬的父啊，您屬於我們，主自己將您給了我們，人人都盼望您來。」

維勒特答應到日內瓦作6個月的代理牧師，並寫信說：「不要再遲疑了，快來建立這個正陷於痛苦、悲哀和後悔中的教會吧。」

當然還有法雷爾。只要有人去斯堡，他就會送去一封「炸彈」。第一次就是他命令加爾文留在日內瓦的。加爾文在掙扎中給法雷爾回信：「你那轟在我頭上的炸雷很奇怪，我不知道為什麼，竟讓我心裡充滿了極大的恐懼和驚愕。你知道此事會令我生畏，我並不是聾子，你為什麼如此激烈地攻擊我，幾乎要危及我們之間的友誼呢？」

1540年10月23日，加爾文極有禮貌地從斯堡寫信給「尊敬的、榮譽的日內瓦議會與行政長。大人，我可以在神面前向您們證明，您們的教會對我來說是何等重要。在她需要的時候我決不會袖手旁觀……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不經過正常手續、途經就突然離開神召我在斯堡的服侍……此外，斯堡議會已決定要我與其他代表一起出席沃姆斯會議，我不能單單為一個教會服務……我向您們保證，我不會拒絕任何我能做的事，只要神允許，我會盡我的全力來服侍您們。」

收到特使們送來的信後，他從沃姆斯給日內瓦又寫了封信：「我可能還需要出席一個帝國會議，一旦我得以從此項工作中脫身，我一定盡全力幫助您們，假如斯堡教會和議會同意放我的話。」在給法雷爾的信上：「當我想到我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時，我將我的心作為祭，獻給主……我將我的靈魂捆起來順服神。」這是唯一的一條路，即使這意味著回到日內瓦去，回到他在給維勒特信中提到的「這是天底下最可怕的地方」去。但是，加爾文人性的一面掙扎著不願回到那座湖上城市，在那裡他會「一天死一千次，」他寫信給催促他回日內瓦去的蘇黎世牧師說「若是按我自己的感覺去做，我寧可到大海的另一岸也不回那個地方去。」

隨著日子漸漸過去，要作的決定已經明顯起來。在給維勒特的信上，他說「不知怎麼的，我也說不出是如何發生的，我開始傾向於做回日內瓦的決定了。」做這個決定雖不愉快，但卻是明確的。斯堡教會也答應，儘管布捨堅持說這只是暫時的，等到日內瓦教會稍有好轉走上軌道後，他就該回到斯堡來。

斯堡議會說，我們仍然保持你的公民身份，也繼續支付你的工資。加爾文將公民身份作為議會對他的尊重接受了，但工資他拒絕了。

沃姆斯議會失敗了。皇帝宣佈休會，第四次會議決定設在法國的拉提斯堡。1541年1月23日加爾文和同事們回到家裡。他們離開斯堡整整三個月了。在家住了一個多月後，又上了路。拉提斯堡的路途遙遠，多瑙河上的冰部分解凍，斯堡的代表們可以從水上走。他們乘大筏子將行李物品用毛皮包起來以免結凍，馬匹、書籍、炊具也都浮在筏子上。告訴法雷爾「我很不情願地被拖到拉提斯堡去，我可以預料這次行程不會順利……我很怕到時候會議又拖得很長久，這種會可以拖十個月之……但我必須跟隨主的帶領，他最清楚為什麼要讓我走這條路。」

在拉提斯堡期間，他們聽到瘟疫正在斯堡肆虐的可怕消息。每個人都為逃命離開那裡。依多萊特去了她哥哥那裡，弟弟和妹妹逃到了鄰近的一個小鎮。那個法國難民弗雷是位老師，也是加爾文最親密的朋友，死了。那位全房客的兒子也死了，他父親最以他為驕傲，加爾文從斯堡寫了封極感人的信安慰那位父親。

他寫信給法雷爾「我日夜都在思念妻子。她孤身一人，無人安慰也得不到支持。」這個斯堡來的人焦慮、痛苦地等候著會議的召開。

三月，四月，五月，辯論進展緩慢，好不容易有了點協議，但聖餐的事像以前一樣，又成了一堵牆。加爾文不斷地寫信給法雷爾詳細報道：「菲力浦和什捨對聖餐變體起草了一個大膽然而不真誠的理論，試圖想要滿足對手但又毫不相讓。這兩位好人懷著最良好的心願，也未存其它的目的……只想要推進基督的國度。」這種努力不會有結果的，他請布捨放他回斯堡去，布捨不太情願地同意了。

加爾文長途跋涉，於6月25日回到斯堡。除了見到依多萊特的高興之外，這次回家是很淒慘的。在他自己的家裡，在許許多多的家裡，到處是被瘟疫帶走的人留下來的空位子。加爾文四處探訪，安慰眾人。他依依不捨地看著斯特拉堡他所熟悉的人們和地方，就好像是對他們說，再見了。

日內瓦和其它瑞士城市的信不斷到來。他已經在神面前許了心願，他還得再等嗎？「你要等石頭喊叫起來嗎？」法雷爾在最近的信裡吼了起來「假如當年你離開日內瓦時你也像今天這樣拖拖拉拉的話，事情可能就不致於像現在這麼糟糕了！」。

日內瓦議會派了特使來接加爾文，要護送他去日內瓦。斯堡議會雖不情願，但還是讓他們的牧師走了。他們給日內瓦議會寫了封信「他終於到你們那裡去了，這是一個無可比擬的，主的少有的器皿。我們的這個世紀裡沒有出過像他這樣的人，真的，除他之外，你們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1541年9月初，加爾文隨日內瓦特使離開斯堡。他和妻子商量好，由他先去，然後再通知她晚些去。淚水充滿了他的眼睛，加爾文騎上馬離開了這座他度過了三年的和平城市。這是富有成果的三年，神將他送回日內瓦的暴風雨中去。沒有人知道，連加爾文自己做夢也不知道，幾年之後他的法國難民教會竟被皇帝下令離開這座和平的德國城市。布舍也被迫流亡英國。沒有人知道，他要去的那個狂暴的城市會變成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偉大的改革之城。

1541年9月13日星期二，兩位騎在馬背上的人走近日內瓦的科那文城門。聳立在前面的，是聖皮埃爾的鐘樓。

全付武裝的百夫長從頭盔下看到了兩個人，第一位騎馬的穿著日內瓦特使的禮服，手持國旗。後面那穿黑衣的是誰？他再看一眼就知道了。

這就是日內瓦全城都在等候的那一位。

第三部 黑暗之後是光明

二十五章

日內瓦再一次得到了加爾文。他穿著黑袍子站在熟悉的議會廳前面，二十五張臉都轉向了他。小議會的人們目不轉睛地看著他，他看上去比他們趕走他的時候老了些，但更有尊嚴，看上去比他們所記得的更和藹些、謙卑些，他們也知道，他在全歐洲比以前更有名些。

加爾文回來了，議員們鬆了口氣。日內瓦不能沒有他，他們準備了禮物歡迎他：一件嶄新的黑天鵝絨袍子，領口鑲了毛皮，還有加農街上的一棟小房子。這條街離教堂很近，屋後有片小院子，從那裡可以看到藍色的萊蒙湖。聖皮埃爾教堂裡巨大的石柱間新立起了一座木雕的精緻的講台。議會又派出特使和馬車去斯特拉堡接加爾文夫人和她女兒朱蒂絲。秘書記錄下了小議會的決議「永遠留住加爾文」。

日內瓦迎回了加爾文，加爾文回到了日內瓦。他沒有要求回來。他第一次路

過這裡時，也沒有要求留下來。同樣，他也沒有要求去斯特拉堡。但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他的那顆心是「被殺的犧牲」，是自願獻給神的。只要是他的主差遣，他就願意去。然而，想起那些可怕的暴徒和日內瓦的罪惡來，他不能不往後退一下。加爾文以略帶責備的口吻寫信給法雷爾：「如你所願，我在此安頓下來了。願神的旨意成全。」

加爾文刻不容緩地提出了計劃，在給法雷爾的信上說「我一回來向議會報道之後，就立即告訴他們，除非建立一個公認的管理機制，教會是站立不住的。神的話語裡對此教會管理機制已經有了描繪。此機制也在古教會裡實行。然後我柔和地指出了一些要點……」

堅定而柔和--這就是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大事上，對任何人不存懷恨之心，寬恕以前發生的一切，把那些容易使別人不舒服的事放在一邊；不惜任何代價，要控制自己不發怒，無論是頭痛、胃痛、哮喘還是其它疾病，都不能成為理由；不管是敵人還是那和平的歡迎底下所隱藏的問題都不能阻攔。如此去行就要去改革那陷入混亂的基督的教會，這也就意味著改革整個城市，因為整個城市都屬於教會。

上帝和天使在觀看，看著加農街上小屋子裡這個背負重擔的人，看到他跪著禱告。在他面前是一本翻開的聖經，他為自己禱告求力量，為這個教會，為這座城市禱告，他是被召來此地的。

加爾文回來後兩天，聖皮埃爾的克萊芒斯大鐘敲響，將人們召來開一個特會。議會全體議員身穿象徵日內瓦城市的黑、灰色相間的衣服坐在一起。加爾文站在新講台上，告訴眾人世界上正發發生的那些駭人的消息：土耳其軍隊侵入了匈牙利；德國各地城鎮鄉村裡瘟疫橫行；在法國，迫害宗教改革的火刑架上烈焰熊熊；講台上傳來清晰的聲音：「讓我們在主面前謙卑下來，讓我們為這個世界禱告，為我們的弟兄姐妹禱告，願主我們的神保守我們的城市，阿門」。

第一個主日，加爾文又出現在講台上，人們等著要聽他講被趕走和被請回來的原因。他一句指責、怨恨的話都沒說。他按照他的習慣，一卷書一卷書，一章一章，一句一句地宣講聖經。他接著三年之前離開時的那句經文開始講。

「回來後的第一個月裡，我有那麼多的事要做，那麼多的煩惱，我幾乎要累

倒了……然後這一切卻又使我得安慰得力量，因為我們努力不是妄然的，不會沒有果子」。這是他寫給巴塞爾一位朋友的信，他讓維勒特留在日內瓦幫助他，告訴法雷爾說：「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從我身邊被拖走」。

加爾文謙卑地寫信給父親般的布捨牧師：「對於我來說，我不想得罪任何人……直到……我忍無可忍。您不必為我所許過諾要忠心服事擔心。假如我在任何方面不能做到您所期望的，您知道我在您的手下，願意順服您的權威。請您行使一個父親向兒子所行的警誡、管教和一切權力。請原諒我的倉促……我被如此眾多的事情所纏，幾乎都不是我自己了」。

依多萊特開始在加農街11號打開行李，安頓起來。這裡比斯堡的宿舍好多了。議會已在房子裡放置了家俱，樓上的三間小臥室有兩張核桃木、一張楓木的床架；樓下的屋裡有一張方桌和長凳，4張松木長桌和十來把椅子；書房裡有張書桌，一隻大書架，兩條來訪者坐的長凳。依多萊特用斯堡帶來的東西把房子打扮得很吸引人。

街的一頭有一水泉，婦女們在此洗衣、取水，人們也在這裡飲馬。依多萊特在後院種上了蔬菜，用丈夫的工資將家安排得還過得去。加爾文的薪水是每年五百先令，再加上十二袋玉米和兩箱葡萄酒，這些糧食可以保證家裡每星期可以烤出20只麵包。加爾文的工資比其他牧師們稍高一些，議會說因為加爾文大師要接待很多過往的客人。

有時客人們不只是過往而是在此往下。女主人不得不經常盡全力安排她的收支。加爾文的妹妹瑪莉亞嫁了一位日內瓦人，有了自己的家。弟弟安東尼也結了婚，後來在城外買了房子，但他們全家一般都住在加農街的這幢房子裡。

這是住著加爾文夫婦、朱蒂絲、安東尼和妻子安妮及四個孩子。此外這扇門裡不斷的有訪客、信使們進進出出。

這不算是個安靜之處。在各種活動的喧鬧之中，加爾文準備了他的講章、書信，寫下了他那些偉大的書卷和著作。

第二十六章

小議會同意了教會有一個「管理機制」。加爾文回來才二個星期，一份詳盡的

文件已經寫成。《日內瓦教會章程》遞交議會審批，其中許多內容是加爾文在斯特加堡的三年和平年間在頭腦裡形成的。

小議會進行了討論，對《章程》作了些修改。大會議也如法炮製。兩個議會都要在文件裡確定他們對教會的權力，他們需要加爾文回來，但絕不想讓他或教會奪走他們的任何權力。議會沒有將修改過的版本給牧師看，就召集了全體公民。在聖皮埃爾高聳的尖頂底下，日內瓦人民於1541年11月20日聚集，正式批准了《章程》。

此《章程》包括了許多東西。它從教會的四種領導位置開始，即：牧師、教師、長老和執事。這也是加爾文為日內瓦教會所制定計劃的中心，是按新約教會的樣式設立的。他認真、仔細地設立了每個職位的規定與職責，《章程》裡也有教會的整套程序「每個主日早晨9點在聖皮埃爾和聖熱爾韋有主日講道……中午是兒童主日學，教導要理問答，……下午場講道在3點……此外……每星期一、三、五在聖皮埃爾教堂有講道」。只要誠心去教會，每個日內瓦人都有足夠的機會聽神的話。

洗禮必須在教堂而不是在家裡施行，是在講台前面不是在門口〔註：羅馬天主教在門口設聖水盂〕，主的聖餐設在講台邊上，會眾應有秩序地走上前領聖餐。

「任何人若因病三天以上不能去教會，應通知牧師……」禮拜六晚上是探訪監獄的時間，探訪對象是所有的犯人。

最棘手的問題仍然是誰有權決定開除某人教籍。加爾文再次論到此點，但這次要小心得多，對於有人犯罪並堅持不悔改，三次警告之後，教會必須通知他暫停聖餐直到他的生活發生「變化」。但是，即使是在這個叛逆的日內瓦，此事仍「應該以……適中的方式……因為這些措施乃是醫病之藥，為的是將罪人挽救回來」，這難道太過於苛刻了嗎？

這份《章程》是加爾文為日內瓦教會寫的，後來被全世界的教會所採納。它是所有改革宗和長老會教會管理制度的基礎。雖然各地教會在不同的時代作了些修改。例如，加爾文當時不得不允許「在教會目前的狀況下，長老由市議會指定」，因為當時的日內瓦，教會與政府緊密聯結在一起。這不是加爾文所想的，他在

《基督教信仰綱要》中明確指出，教會必須脫離政府的管轄。

這裡加爾文所做的最重的是按新約聖經的教導，重新建立起長老和執事制度。羅馬天主教是沒有帶職長老和執事的[即：在社會上有自己的工作，不領教會薪水]。加爾文恢復了基督教會裡帶職人員在教會中的領導地位。

這份經過議會爭論，修改過的《章程》仍保持了加爾文的基本思想，後來對許多國家許多教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議會在此文件的開頭寫上了如下的話：

「以全能上帝真神的名義，我們--日內瓦大、小議會的全體行政長官與全體日內瓦人民，在號聲、鐘聲之下，根據我們古時的傳統……在我們的領土範圍之內命令，建立起以下這套教會章程，並宣誓照此章程執行。因為我們視此章程來自耶穌基督的話語」。這份《章程》在紙上通過是一項成功，但將此章程付諸實踐則是另一回事。

《章程》花了二個月的時間得以通過，又花了十四個風風雨雨的年頭才真實付諸實施。日內瓦人民還來不及發出第一陣牢騷，瘟疫的恐怖已經來臨。加爾文給布捨的信上說「瘟疫已逐漸侵入日內瓦，我們即使能躲過這個冬天，一定躲不過明年春天。」

第二十七章

日內瓦的街上空蕩蕩的。學校、商店紛紛關閉。主日來到教會的寥寥幾位聽眾，一個一個都坐得遠遠的，互存懷疑的眼光。街上唯一能聽到的聲音是運屍馬車的鈴聲。車上堆著許多屍體，因為帶著致命的瘟疫菌，他們都不得正常的安葬。城牆壁外的傳染病醫院裡擠滿了瀕死的人。

瘟疫來到了日內瓦。那是1542年春，有人說是路過城裡的瑞士士兵帶來的。在這擁擠而又沒有衛生設備的窄小街道中，致命的瘟疫如野火般蔓延開來。什麼樣的牧師此時會到瀕死的病床邊安慰他們，為他們預備一顆面對死亡的心？那位法國牧師布蘭特走上前來。市議會記錄上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去了城外的傳染病院，忠心地一隻床一隻床位的探訪，直到他自己倒下死去。

加爾文不顧自己虛弱的身體和家裡待產的依多萊特，也提出了申請。議會的記

錄上記著當時加爾文被議會拒絕去醫院服侍「因為教會更需要他的服事」。

瘟疫在許多城市肆虐，斯堡也未能倖免。布捨失去了溫柔的妻子伊麗沙白。20年來她一直在照顧著布捨和他們家避難的人們。6個孩子死了4個。布捨的同工，那位富有學識的卡比多牧師在伊麗莎白死去前一天被埋葬。

日內瓦的瘟疫走了，可1545年又回來了。另一位年輕牧師自願去傳染病院服侍，死於醫院。人們被恐懼所擊而歇斯底理地相信這是一場陰謀。他們認為，有人在醫院用被病人感染過的東西做成油。他們將此塗抹在人家的門把上，想要害死這些人家而佔有他們的財產。加爾文看上去也相信這麼回事，或許是有過那種事。在寫給巴塞爾的信中他說：「神在這段時間裡苦苦熬煉我們。最近發現有人在城裡散佈傳染病已有三年之久……因為此事，已有15名婦女被處以火刑，有男人甚至遭更可怕的懲罰。有人在獄中自殺，監牢裡還關著二十五人。但此陰謀尚未停止，仍有人在人家門上抹毒油。你看，我們是處在何種危險之中。我們家雖被試煉，神卻仍然保守。」神雖然保守了加農街上這幢房子免遭瘟疫，卻將一個深深的悲痛送入加爾文的家：1542年7月底，加爾文寫信給剛回到洛桑的維勒特牧師：「我是在何等的焦慮中給您寫信啊，妻子早產，並且仍未脫離危險，願主保守我們。」

加爾文為他們的第一個兒子雅克司施了洗，孩子掙扎了二個星期，死了，依多萊特很久都未恢復健康，8月在給維勒特的信裡加爾文說：「請問候您夫人，我代表妻子對她的友誼與敬虔的安慰表示真誠的感謝，因為她自己太弱甚至連口述一封回信都不行。孩子的去世的確是神加給我們的一個嚴酷、痛苦的患難；但神自己也是一位父親，他知道什麼是對兒女最好的」。

20年之後，這位日內瓦牧師在回答敵人的指責時說：「鮑德英嘲笑挖苦我……說我絕後，我回答說，神曾給了我一個兒子，神也取走了我的兒子……但是在基督教世界裡，有我無數的兒子」。這些兒子們是屬靈的兒子，是跟隨他教導、學習他榜樣的人。雅克司死後三年，他們生了個女兒，很快也夭折了。兩年後，加爾文給朋友的信上提到了要為預期的第三個孩子施洗的事，但那洗禮從未發生，孩子出世時死了。依多萊特的健康一直未恢復。後來她可以開始在屋裡和後院做事，除了虛弱之外，她的不停咳嗽拖垮了她。儘管她自己身體不好，依多萊特卻給加農街上這座房子帶來了平安與秩序。有時身體較好，她接待不停的訪客，招待他們吃、住。

即使是她病了的時候，加爾文的家也仍然向客人開放。有人在依多萊特去世前兩年寫信給加爾文，「您在基督裡的好客，在全歐洲家喻戶曉」。

沒有人知道依多萊特的安寧、同情與摯愛給她那忙碌而充滿壓力的丈夫帶來多少平安。加爾文的工作量可以叫任何一個身體健康的人累垮：每天早上5點起床，若是病了，毯子上也會鋪滿了書；每星講道五次，教神學三次；每週四主持一次長老、傳道人的查經；探訪病人、犯人，他也有規律的探訪會眾，正如他在「章程」裡規定的。以上這些是他的日常職責。但這只是一個開頭而已。加爾文一直在寫信，他的門前集散著來自歐州各地的信使，收、發信件。日內瓦人想寄信或收信只要到加農街11號就行，加爾文的家就是日內瓦郵局。

除了寫信勸告、幫助、安慰各地的人們之外，加爾文也寫了許多小冊子、福音單張、專題論文和書。他將書記記錄下來的講課內容編輯成聖經註釋。他一卷書一卷書地教導聖經，對每個章節，每句經文都作詳細的解說。日內瓦議會一點兒也沒有浪費他們請回來的人，在他們要求之下，加爾文重新整理、編輯城市的法律。他和小議會秘書羅賽一起，花了大量時間，在一大堆有時相互矛盾的法律書中理出頭緒，然後開始將法律歸類、修改。

一個人難道能比這更繁忙嗎？但他還有更多的事要做：加爾文給婚禮、洗禮寫了詳細的說明，並規定應該在市政府登記註冊。或是有人急需幫助，加爾文會為他寫上封信給市醫院，「這個人的情況非常糟糕，實在可憐……是否可以請您們考慮幫他？……他是屬於我們城市的人，若是陌生人我自己會沒法幫助他的。」

最糟糕的是，他還要與敵人作戰。遭日內瓦城時或城外的人攻擊已是司空見慣了，特別是那些不贊同他的教義的人，每次都是征戰。這個渴望和平與隱靜的人，不得不將他的天性放在一邊，他不得不勇敢無畏地捍衛他所相信的聖經教導。有時候，他在這些征戰中使用的言辭或建議的懲罰太過於強硬。

但是，他在回日內瓦後開始的那些年裡，極有效地控制了他的忿怒。或許這裡有依多萊特的貢獻，這位默默無聞的日內瓦婦人很知足地呆在後院，耐心地、安靜地伺候她所嫁的這個鼎鼎大名的人。

第二十八章

「死亡上來了，進了我們的窗戶，進了我們的宮殿」耶利米先知的話在1544-1549年間也是真的[註：耶利米9：21]。1546年，英國的亨利八世死了，他把皇位留給了第三任皇后簡·西摩十歲的兒子愛德華四世。第二年死亡襲法國皇宮，狡猾的弗朗西斯一世丟下了他戴了三十二年的皇冠。他統治的時代法國滿了對抗羅宗的迫害，砍頭、絞刑、火刑。兒子亨利二世比其父更殘酷。弗朗西斯死後兩年，他的妹妹納瓦爾皇后瑪格麗特也死於巴黎。她一直深愛著哥哥，但她也保護了許多她哥哥會同意讓羅馬教會逼迫殺害的人們。克萊芒·馬路特不是國王，但他在1544年死去時卻留下了寶貴的遺產。這位法國詩人將一部分《詩篇》譯成法文詩歌。他寫的第一批詩歌被譜成大眾曲調，成為法國人非常喜歡的讚美詩歌。弗朗西斯打獵時也喜歡唱。加爾文在斯堡和日內瓦的詩歌本中讓人為馬洛特的詩歌配上新曲。他第一次遇見馬洛特是在弗拉拉堡的宮裡，後者從巴黎逃亡出來。1543年馬洛特在日內瓦住了幾個月，加爾文說服議會僱用馬洛特，他在那裡翻譯了五十首《詩篇》，這些都收集在1562年出版的日內瓦《讚美詩歌集》裡，他後來去了意大利都靈，死在那裡。

教皇們也住在宮殿裡，儘管他們自稱為上帝的代言人，但也無奈於死亡。1549年，教皇保羅三世死了，他曾將英國的亨利八世開除羅馬教籍，批准勞友拉的耶穌會，他也曾任命偉大的米開朗基羅為凡帝崗聖彼得大教堂的主建築師。教皇的遺體下葬前橫躺著，雙腳從鐵欄杆中伸出，供各地前來瞻仰的敬虔人們親吻。

在此5年的死亡中，馬丁·路德的死給抗羅宗帶來最大的哀痛。1546年1月路德從威登堡坐馬車去他的出身地塞爾本。一路上天寒地凍。主日早上他在自己受洗的教堂裡講道。離開此地回家的前一夜突然病了，死了。62歲的馬丁·路德被隆重地葬於威登堡教堂。當初他就是在此教堂的大門上釘上了他的《九十五條抗議書》。埋在他身旁的，是他的保護者弗德里克王子。墨蘭頓在葬禮上哭了。他為他的主人哭泣，他為一年多來進入路德宗各教會的麻煩、不和哭泣，此後有更多的此類痛苦和不和。現在路德一死，這些問題會更嚴重，在德國找不到一位堅強的領袖來繼承路德，他被稱為宗教改革之父。

在日內瓦加農街上的那幢房子裡，可以找到那位堅強的領袖。路德以他英雄的

勇氣所開始的宗教改革，將會由加爾文以他卓越的頭腦與永遠不停止的筆，來繼續下去並予以完成；路德將抗羅宗教會猛力從羅馬教會拔出，帶來了宗教改革；加爾文將會建立教會，使教會付諸實踐。他將宗教改革的真理寫在紙上，並向人們解釋，那重新找到的神的話應當如何應用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

這一切，那坐在書桌前、走在通往聖皮埃爾或議會廳卵石路上的日內瓦改教家並不知道。馬丁·路德離世時，他正忙於戰鬥之中。他在講道，在教課，他在接待訪客，在寫信，在寫書，在寫論文。無論是疾病還是健康，他一天都沒有退縮過。

沒有人從他那雙具有穿透力的眼睛裡和堅毅的嘴角上看到那正在吞噬他心的新的痛苦：依多萊特病了，醫生泰克斯特經常在她床邊，但也無能為力。1548年8月加爾文寫信給維勒特說：「我妻子請求您為她禱告，她被疾病折磨得支撐不住。有時似乎有所好轉，但隨即又病倒」。那極度的虛弱和不停的咳嗽是不是肺結核的症狀？這是一種當時的醫生所不明白的疾病。

1549年3月初，依多萊特病得起不了床。她丈夫則被各項不停的工作和問題煎熬著。來自法國甚至意大利的難民蜂擁進日內瓦，他們需要住處，需要工作。那些生活不檢點的放蕩派竭盡全力來刺激加爾文，攪起城裡人們對他們的不滿。他正在編輯《希伯來書》註釋，獻給波蘭國王奧古斯塔。在这一切繁忙之中，他盡量抽出時間在妻子的病床邊陪她，直到下一件事把他拖走。

依多萊特安詳地等待著死亡。她一生都未抱怨，現在也沒有抱怨。臨死前三天，一群人聚在她床邊為她禱告。加爾文再次向她保證會照顧她的兩個孩子。依多萊特發出微弱的聲音：「我已經將他們交給了神」。加爾文回答說，這不會阻礙他為孩子們做他所能做的。依多萊特斷斷續續地說：「我知道，你是不會不照顧那些交給了神的人的」。3月29日，依多萊特認真地聽著一位前來安慰她的傳道人的話，然後大聲地說話。在場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心已被提升起來，以下是她的話：「噢，榮耀的復活！噢，亞伯拉罕的神，我們眾先父的神！在過去那麼多歲月裡他們信靠的就是您，他們的盼望沒有落空，我信靠的也是您！」

「這些話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喊叫著禱告出來的。6點鐘了，我不得不出去。7點後他們把她轉到另一間屋裡，她一下子惡化，感到自己不行了，馬上說：『我們來禱告，讓我們來禱告，請大家為我禱告。』這時我回來了，她已經不能說話，看

上去神志已不清，我對她說了基督的愛，永生的盼望，我們的婚姻。她就要離開，然後就開始禱告……她聽著我的禱告，注視著我，8點之前她去了。如此安詳，在場的人都無法分辯她是活著還是死了」。這是加爾文在信上向法雷爾詳盡的傾述。

加農街上這個背負重擔的人，孤身一人。一個星期後他寫信給維勒特：「我的悲痛決非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一生最好的伴侶」。在給法雷爾的信上說：「我將盡全力不讓自己被悲痛所完全淹沒，朋友們也盡了他們最大的能力設法安慰我……願主耶穌堅固我……若不是主，這樣沉重的苦難早就壓垮我了。但他扶起跌倒的，使軟弱的變為剛強，讓勞苦擔重擔的得力量。他從天上向我伸出他的手」。

在依多萊特生命的最後一個星期裡，加爾文一次講道也未擔誤，一堂課也未拉下，一次會議也未缺席，甚至沒有人看出這個大理石般的男人裡面那顆焦慮的心。在自己的書房裡，他關上門與悲傷搏鬥；在街上，在講台上，他將這一些掩藏起來，照常他的一切工作。

三年前親身經歷過失去妻子的刻骨銘心般悲痛的維勒特寫信給加爾文：「我聽到了那些關於您的，難以置信令人驚歎的消息……您懷著一顆如此破碎的心……竟然……非但履行了並且超過了您一切的職責……繼續您所開始的吧……我最迫切地向神禱告……好叫您每天蒙更大的安慰，得更大的力量。」

加農街11號裡的生活仍然繼續著。弟弟一家都在，朱蒂絲一直住到她結婚。皮埃爾，一位駝背的僕人來照顧加爾文的生活。可是少了依多萊特，這個家是多麼不同啊。既使是她躺在床上時候，她仍將她的安寧傳遍整幢房子。在1550年的一封信中，加爾文寫道：「我的妻子，那位具有罕見品格的人，一年半前去世了，現在我自願選擇過一種孤獨的生活。」

第二十九章

「你自己知道，或者至少你應該知道，我是怎樣的人。無論發生任何事情，我天上主人的法律對我來說是那麼寶貴，我存一顆清潔的良心來維護它，地上沒有任何人可以使我畏縮、後退一寸！」說出此番錚錚之言的人，字字當真，決非兒戲。他是被要求回到日內瓦來的。現在，他正在把日內瓦變成一座這樣的城市——在那裡，他天上主人的法律將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威。這就意味著爭戰，一連串的爭戰。

從1541年到1555年，那十四個暴風驟雨的年頭裡充滿了爭戰。加爾文也用他的筆與日內瓦城外的異端與逼迫作戰。在這一系列的征戰中，他在自己的時代已經名揚四方。他是如此的強硬而才華橫溢，人們不是熱切地跟隨他，就是切齒地恨惡他。1551年，在老家挪揚，教士們召集大會慶祝他的死，後來才知道那是誤傳。1552年挪揚的那場大火燒燬了市區絕大部分的房子，他家位於「玉米市場」廣場的房子曾奇跡般地倖免，但後來卻被人憤怒地焚燬。在里昂，報告他死亡的消息不下十次。他的敵人們等不及他的死。羅馬教廷視他為頭號敵人。

一個勇敢、堅強的鬥士，這就是約翰·加爾文嗎？許多人知道得比這更多。他們知道，他因著基督的原故，是成千上萬人的朋友；他們看到，他是怎樣選擇過一種謙卑的，幾乎是貧困的生活；他們知道，在這一一切的難處之中，他仍然享受神所創造的美麗大自然；加爾文玩遊戲，也開懷大笑。儘管他每天被日內瓦的麻煩所纏，他的雙眼從未離開過世界。他以他的言行為他的主影響著這個世界---他也以他的言行影響著這個世界。目的是為了他的主。他非但不喜歡鬥爭，且畢生都致力於抗羅宗各教會的和平與合一。若要真正認識約翰·加爾文，你必須以這種方式來看他：他的鬥爭是為了使耶穌基督的教會得以純潔，為了忠誠於神的話語而進行的戰鬥。

約翰·加爾文是一位朋友，一位誠實、慷慨而全心誠意的朋友。他一生都有極親密的朋友。他在基督裡有著千千萬萬的朋友，許多人從未見過這位寫信安慰、激勵他們的人。法雷爾與維勒特是加爾文後半生二十八年裡的摯友。前者雷厲風行、勇猛無畏而充滿活力；後者穩重、慈祥而學識淵博。法雷爾比他大十二歲，維瑞特比他小二歲。加爾文在他的《提多書註釋》的序裡說：「我不知道在常人的生活裡是否會有像我們這樣的朋友，會有我們這種在工作上的緊密聯結。我將此書獻給基督的兩位重要僕人、在主裡最親愛的弟兄與同工威廉·法雷爾，彼得·維勒特。將此《提多書註釋》獻給他們倆，是因為我要象提多完成保羅在克里特已經開始的建造教會的工作那樣[註：提多書1：5]。我所做的是法雷爾和維勒特在日內瓦冒著極大危險、成功地開始了的工作」。加爾文現在正在努力完成。說到他們間迅速建立起來的友誼，加爾文接著寫道：「我與你們都在此作牧師，你我之間非但沒有任何嫉妒，反而成爲一」。

這篇獻詞是加爾文在依多萊特去世8個月之後寫的。朋友對於他，比任何時候都更為珍貴。這三個朋友並非沒有分歧。溫和的維勒特一般不會與他們產生爭論；但法雷爾與加爾文之間一向直言相對，從未有過一點兒躲躲閃閃。然而，在他們直言不諱之下，是他們的友誼與基督僕人間合一的堅固基礎。加爾文幫助朋友時毫不遲疑，聽說法雷爾需要一名管家，他幫著找到了一位敬虔、正直且上了年歲的婦人。因為他知道，不能給一個老單身漢找年青的女管家。他們倆之間最大的分歧是1558年法雷爾要娶一位年輕姑娘---另一位管家的女兒。

1540年維勒特的妻子去世時，加爾文勸這個「整個世界對他來說就是一座重擔」的人到日內瓦來，休息調整一下，他寫信給維勒特說：「馬上到我這裡來，讓我們一起找回您的心，聽那邊的人說，您好像整個人死了一般」。另一次，傳說維勒特中毒快死了，加爾文讓醫生特希爾特隨時準備換乘幾匹快馬衝到洛桑去。但後來證實那是謠言。

接下來是為維勒特找老伴。加爾文寫信給一位朋友「你大概知道維勒特弟兄還想結婚，為此事我和他一樣著急。我們這兒人倒是不少……但沒有看到一位滿意的……你若發現有合適的人……請告訴我」。結果，維勒特自己找到了。加爾文為他們證婚、祝福，後來又不斷寫信問候他們和他們的三個小女兒。

法雷爾和維勒特是加爾文晚年作牧師時的好友。但那些童年時代以及在巴黎、奧爾良作學生時的人們，也仍然是他的朋友。他們中間許多人後來到日內瓦來找他，或寫信給他。加爾文在挪揚一起長大的小漢昂熱告訴加爾文，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搬來日內瓦住。另一位是他在奧爾良讀法律時的摯友德尼埃爾，儘管他知道了抗羅宗的教導，加爾文也極力勸他遵循，但他始終沒有離開羅馬天主教。倆人在法律系做同學28年之後，1559年德尼埃爾寫信給加爾文，告訴他自己的兒子去了日內瓦。加爾文幫助了他的兒子，並寫信給老同學：「我仍珍惜您的友誼……我願隨時為您服務」。隨後還寄去了幾枚金幣送給德尼埃爾的女兒作新年禮物。加爾文仍記得多年前德尼埃爾為他所做的。

另一位學生時代的朋友搬來加農街與加爾文做鄰居，他是米契爾·科普，就是當年和加爾文一起逃亡的巴黎大學校長尼古拉·科普的弟弟。那位法國最偉大的思想家紀堯姆·布迪一家也搬來了日內瓦。布迪死於1540年，搬來的是布迪夫人與四

個孩子，後來其中的約翰成爲加爾文的摯友之一，也成爲日內瓦議會的重要議員。

依多萊特去世後一個月，八位法國紳士來到日內瓦請求留下。其中之一是英俊的西爾多·伯撒。當年在希臘文教授沃爾馬家裡見到加爾文時，他才十二歲。伯撒從小由兩位未婚而富有的叔叔扶養長大。後來成爲一名出色的學者。他曾過著無節制的生活。他的經歷有點類似加爾文，學了法律並且由叔叔安排從教會領取好處。一場大病後，伯撒變得嚴肅起來，轉向了抗羅宗信仰，並決定去日內瓦。住在沃爾馬家的這個男孩子已經成材，可以被基督的教會所用。洛桑大學邀請他去作希臘文教授，伯撒接受了。離開之前在聖皮埃爾和一位法國姑娘舉行了婚禮，加爾文牧師主持婚禮。他寫信給另一位牧師，「我有幸與加爾文、維勒特建立了友誼……每當我想到能成爲這些人朋友時，我非但忘記了流亡的痛苦，我也深深地體會出泰米斯多司的名言：若非流亡，我就真的迷失了。」

這位流亡的伯撒於1559年回到日內瓦作牧師兼日內瓦大學校長。他後來成了加爾文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收集了加爾文的書信，編寫了加爾文傳，並於加爾文死後任日內瓦教會領袖四十年。加爾文與他的朋友們，包括基督教領袖們，並非對所有教義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例如斯特拉堡的布捨，他後來被迫流亡英國後，在劍橋大學任教授。他在英國很孤獨。那裡濕冷的氣候也使他常常生病，「我真巴不得我能幫助您減輕負擔，減少您心裡的痛苦。我能看出您在受折磨」。加爾文是在給一位朋友，給他在斯堡時的父親寫信。在很多地方布捨是路德宗，他也曾是著名的沃姆斯會議上路德的夥伴。

慈運理的後繼人，蘇黎士富有才華的布林格也是加爾文的朋友。在他們許多的書信中，他倆討論了基督的教會、教義和教會的問題。遇到爭議之處，雙方都可以用堅定、強硬的措詞對話，但他們間的友誼卻一直非常親密。

當然還有那位溫和的墨蘭頓，老年時爲路德宗教會內的麻煩、爭鬥而擔憂。他是加爾文的朋友，有時候加爾文會強烈地指責他在路德宗教會中，站不穩立場。加爾文請求他在主的聖餐一事上，明確宣告他的改革宗觀點，可是墨蘭頓總是退縮下來。他本來可以減少改革宗與路德宗之間的距離，但他拒絕了。即使如此，加爾文仍尊敬他。1560年4月墨蘭頓死於威登堡，葬於路德身邊。直到死，他都不願開口。在路德宗與改革宗不停地爭議中，加爾文喊道：「噢，菲力浦·墨蘭頓，我求

您爲我作證！您現在與基督一起在神面前，等待著與我們一起分享那蒙福的安息。當您被重擔所壓、爲勞苦所迫時，您曾一百次地表示過想與我同生同死，我願意一千次地與您生活在一起，那樣，您就一定會變得堅強，願意站出來……」。儘管加爾文極盼望抗羅宗各教會的合一，但他仍然愛著那位因其鹹默而此合一變得更不可能的人。加爾文的朋友並非都是大人物，弗拉拉、斯特拉堡以及許多瑞士的城市，凡是他去過的地方，加爾文都有朋友。即使是那些他從未去過的地方，只是要是他的信所送到的地方，他就有許多朋友。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在基督裡的人們收到過他們在日內瓦的朋友的信。這位日內瓦牧師一再寫信給法國受迫害的普通百姓，很多信是送到監獄去的。他幫助他們，與他們站在一起。許多基督徒從他們從未見過的那個的寫信人的信裡得著力量，從容地走上火刑架。每年數以千計地湧進日內瓦的法國難民們發現，加爾文是他們最知心的朋友。他爲他們找到家，他說服議會辦起一家服裝廠使他們有了工作，他建立起各種語言的教會，有英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佛蘭芒語，他從未因工作太忙，病得太重而未能替人找到住處，找到工作，找到妻子，找到僕人。

日內瓦加農街頭的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一位朋友，他不但是基督的著名的鬥士，也是基督裡一位忠誠的朋友。

第三十章

「我們家吃飯的桌子，睡覺的床鋪，沒有一樣是我們的……那些謠言到底是哪兒來的？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沒有一寸屬於自己的土地……我從未有過買一畝地的錢……」但是敵人散佈謠言說加爾文花了幾千塊錢買了地產。甚至羅馬教皇都知道加爾文的貧窮，並且是他自己選擇貧窮的。保羅三世和皮烏斯四世教皇在加爾文死後，先後評論過：「那個異端的力量，就因爲金錢對他毫無吸引力」。在羅馬教廷，這種態度是聞所未聞的。

一天，紅衣主教撒道萊特隱姓埋名，路過日內瓦。他就是那位乘加爾文被趕出日內瓦時寫信試圖把日內瓦拉回羅馬的主教大人。撒道萊特想要親自看一看這個替日內瓦寫了那封著名回信的抗羅宗領袖。他站在加農街這幢簡陋的房子前納悶地問自己：這裡難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加爾文住的地方？他敲了敲門，出來開門的是加爾

文。身穿一件黑布袍子。撒道萊特頓時目瞪口呆，那些應該來開門的僕人們哪兒去了？在羅馬，即使是主教們都住在豪門大宅，有僕人隨時侍候。大主教、紅衣主教們則像君王一樣，住的是宮殿。眼前這位整個抗羅宗教會最有名的人竟住在這間小黑屋裡，自己來開門！

「我是真正富裕的人」，加爾文說「因為我對自己僅有的完全知足」。這些僅有的有時候不夠招待客人以及支付上門要求幫助解決醫藥費的窮人，但加爾文從未接受議會幫助。1546年議會記錄上有下面這段記錄：「加爾文病了，沒有錢支付全部的醫藥費，議會送了他十塊錢。之後加爾文將錢還來，議會決定用這筆錢買一大箱葡萄酒，讓他無可推辭。加爾文還是從工資裡拿出十塊錢，要求作為幫助最窮困的傳道人之用。就在這一年裡，他因為第二孩子的病負了債。那個小女孩很快就死了。這一年議會作出決議：「本議會決定，將加爾文目前使用的、屬於我們城市的傢俱，全部贈送給加爾文」。加爾文這才在屬於自己的桌子上吃飯，在屬於自己的床鋪上睡覺！

有一年，他一身的疾病使他不得不向議會借了二十五塊錢。當他將錢歸回時，議會拒絕接受。他告訴他們說：「若不接受這筆錢，我就不上講台，我也拒領這一部分的工資」。

另外一次，牧師們請加爾文出面為他們要求增加工資，他向議會建議降低他的工資，與其他牧師們均等。敵人尋找借口攻擊他，捏造事實說他很富有。在他的《提多書註釋詩篇註釋》序裡，加爾文作了回答：「若有人在我活著的時候，不相信我既不富裕也無錢財，那麼等到我死的時候，就可以向他們證明」。後來他的話被證明是真的，死的時候，加爾文所有的家產加起來不足二百五十元。假如他活得再久一點，他會更窮，因為他已經拒絕了他生命最後四個月的工資，他說他沒有掙得這份工資，怎麼可以接受？

「我因自己的境況而知足，我永遠都高高興興地生活在貧窮之中」。在這一點上，加爾文也跟隨他的主人。然而加爾文卻快快樂樂地享受那金錢買不到的東西，他享受上帝所創造世界的美麗：「天上小鳥的飛鳴是向神歌唱，地上走獸的吼聲是向神呼叫；萬物對他存敬畏，群山迴響著他的名字；波浪與泉水向他仰望，樹木與花草向他歡笑」。這些是1535年加爾文在為奧利維坦的法文新約譯本作的序中所道

出的富有。

加爾文也不乏幽默感，常有詼諧之語脫口而出。與朋友一起時，開懷大笑。只要身體允許，他也做些運動。有時和牧師們騎馬到郊外，有時在後院散步、欣賞湖色。偶爾也玩一下遊戲。也去一下弟弟安東尼在郊外的家。那是一種類似投馬蹄鐵的遊戲，他也喜歡與別人挑戰，玩一種在桌上投鑰匙球的遊戲，看誰投得遠而又不掉到桌下去。偶爾也打一下室內球。但加爾文沒有時間運動，就像一位在風浪中掌握舵把的船長，他忙於要將船安全地駛進港灣。這艘船不僅僅是日內瓦教會，也是整個抗羅宗教會。日內瓦的問題已足夠把加爾文牧師壓得喘不過氣來，但加爾文注視著世界其它地區，各國政府、各處戰爭、各項條約和各種政治陰謀，他都瞭如指掌。這些事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它們本身，乃是因為它們影響整個基督的教會，這才是加爾文最關心的。爲了建造教會，他寫信給國王們、王子們，他把他的聖經註釋獻給那些同情宗教改革的統治者：《希伯來書註釋》獻給波蘭，《使徒行傳註釋》給丹麥、瑞典，四封新約書信註釋給德國公爵，他爲奧地利的抗羅宗寫了一本基要真理問答，他給正在舉辦另一次帝國會議的查爾斯皇帝寫了封長信，列舉改革的許多要點。

加爾文寫信最多的，是英國的少年國王愛德華四世的七年統治期間。後來這位年輕的英王死於16歲，小國王的叔叔薩默塞特公爵是攝政護國會，坎特伯雷大主教湯瑪斯·克蘭麥也是攝政官員之一。他曾協助亨利八世改變了英國教會。原因是教皇不同意他離婚。此時，克蘭麥主教正著手改革英國教會。加爾文興奮不已，又一個偉大國家加入抗羅宗行列，他以他的筆竭盡全力來幫助、堅固英國教會。1548年他將《提摩太前書註釋》獻給薩默塞特公爵並附上一封長信，爲英國教會的改革提出建議。「願主使您成爲他聖殿的修殿者，好叫您侄兒的國度可以比美於約西亞」-- 那位舊約少年國王[註：歷代志下34章]。

公爵非常感激加爾文的話，公爵夫人還給加爾文寄去了一隻戒指。兩年半後，加爾文派了一名牧師去覲見那位十四歲的國王。他帶去了加爾文最近寫成的兩本聖經註釋，一本是《以賽亞書》，一本是《彼得、雅各、約翰、猶大書》，「特意獻給尊貴的英格蘭國王--真正的基督教王子愛德華四世陛下」。

愛德華四世去世前一年，加爾文送給他一份禮物，那是一本小冊子，書名為《約翰·加爾文牧師四篇講道集》，在附上的信裡，加爾文深情地寫道：「成為國王的確確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尤其是成為英格蘭這樣國家的國王……但我毫不懷疑，當陛下將王位與基督徒的名字相比時，前者就成為無足輕重了。正因為如此，上帝給您這樣一種無價的特權，讓您成為一位基督徒國王」。

加爾文寫給法國皇帝的信裡就不能這樣說了，在弗朗西斯一世和兒子亨利二世統治下，法國不斷地迫害基督教。在他們統治的四十五年裡，共有五萬多抗羅宗被殺害，成千上萬人流亡。在莫市，十四人在廣場上被吊成一圈用火燒死。三十年前這裡曾是法國宗教改革的發源地，一位巴黎的教授被投入站不直躺不下的深坑裡，六個星期後燒死。1545年由於一位紅衣主教向國王謊言誣告，法國西南部山區的瓦丹西地區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三千名勤勞、敬虔的男女村民及兒童喪生。慘案中，有40位婦女逃進一座穀倉，婦女們衝出來，被士兵的長刺刀一一刺死。許多村莊被毀滅，逃進森林的許多人餓死在那裡，一部分人最後逃到了瑞士，將此恐怖消息傳出。這些迫害深深地繫著加爾文的心，他給許多有影響力的人寫信，兩次去其他瑞士教會，為那些難民募款，說服瑞士各地官員寫信給法王抗議，後者回答說，你們小行政區管好自家的事就可以了。

在法國的迫害和德國教會的內部爭吵之中，加爾文努力使教會合一，至少是將慈運理派的瑞士各教會和日內瓦的教會聯合起來。與路德宗聯合起來的希望隨著路德越來越難預料的脾氣和墨蘭頓的軟弱，路德宗各地教會內一些激進分子的出現，以及後來路德過世而變得越來越渺茫。現在加爾文滿懷希望地與慈運理派的領袖協商瑞士教會的合一。他們之間的障礙仍然是對聖餐的不同解釋。1548年加爾文寫信給慈運理派的領袖布林格：「我比您更強調基督與聖餐的同在（屬靈上），但我們不會因為此點而不信同一位基督，我們同樣都在基督裡」。他將論聖餐的二十四條寄去，作為討論的基礎。

依多萊特去世後六個星期，讓加爾文很感安慰的，是他與法雷爾一起去了蘇黎世與布林格等人一起討論。合一看上去近在咫尺，加爾文也收到布林格的回信：「這是我所收到您寄來的，最令人愉快的信……我很高興，沒有什麼東西特別阻礙我們之間的認同……我完全同意，我們應該聯合起來，因為基督是我們共同的

主」。

1549年的蘇黎世《共同綱要》就是此聯合的證據。這個文件基本上出於加爾文之手。兩年之內，所有的瑞士教會都在上面簽字。加爾文至少在他寄居的國家實現了一定程度上教會的聯合。加爾文死後兩年，1566年瑞士眾教會的合一終於完成，並產生了著名的《海爾凡帝克信仰告白》日內瓦牧師一直盼望的事終於成就了。

在英國，克蘭麥主教也想讓教會合一。愛德華四世期間，英國的許多領袖都傾向於加爾文的教導，布捨也在英國並對此起了不少影響。克蘭麥想召開一個教會大會，討論抗羅宗教會在教義上的分歧。當時正值1552年羅馬天主教舉行天特總會[註：專門針對抗羅宗的會議]。他寫信給加爾文、布林格、墨蘭頓等說：「我請求您能前來參加此次教會大會。我們難道應該忽視召開教會大會的重要性嗎？這樣的大會有助於澄清、維護、重申真理。」第二年，英國的少年國王死了。這個教會大會一直未能開成，克蘭麥本人也在血腥瑪莉統治期間被火刑燒死[註：血腥瑪莉是英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天主教女皇，以大肆迫害、屠殺抗羅宗人士而獲此稱號]。

一向盼望抗羅宗教會合一的加爾文，在給克蘭麥的回信中說：「召開此次大會事關重大，我願為此大會作最大的貢獻，假如我的身體能如我的心願一樣，哪怕是穿越十個海洋我也會欣然前往」。

加爾文這位忠誠的朋友，對金錢毫無興趣的謙卑之人，這位具有長遠眼光為各國基督的教會和一不遺餘力的牧師，在建立的教會上，在使教會變得更為純潔、更為聖潔的征戰中，同樣也是無畏的勇士。

他不像路德和法雷爾，天生就是英勇的戰士。他恨惡哪怕是最小的戰鬥。但是，當神的工作要求爭戰時，加爾文隨時願意上陣。

第三十一章

一個接一個的敵人來到日內瓦與加爾文爭戰。

第一個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年輕學者卡斯梯裡奧。加爾文曾親自任命他為此地高中校長。他翻譯了新約聖經，並且想翻成一本最通俗的書。他請加爾文推薦、出版。加爾文認為此譯本太粗糙，有些地方不準確，但他沒有那麼多時間與卡斯梯裡

奧爲每一處錯誤爭辯。後者認爲加爾文不誠心爲他推薦而惱火不堪。事實上，對於卡期梯裡奧的信仰、教義加爾文也不能同意。這個二十六歲的校長宣告說《雅歌》不是聖靈啓示的，只不過是所羅門的愛情故事，不屬於聖經。他不同意《使徒信經》中那句「下到地獄」的話[注：《使徒信經》是古教會基於使徒們的教導總結、概括出來的教會第一份信仰告白，成文與第四世紀之前]。他也否認神在創世之前就揀選了那些得救的人，以上這些加爾文都未與他爭論。直到他提出申請，要成爲日內瓦牧師。他說校長的工資太低了，小議會同意了他的申請，但推薦、按立牧師的最後決定由教會作出，在加爾文的領導下，教會拒絕了卡斯梯裡奧，原因是他所持的觀點、教義不符合聖經，但教會提議給校長增加工資。

當不上牧師使卡氏惱羞成怒，他辭掉校長的職位。加爾文爲他寫了封推薦信給洛桑的維勒特牧師：「我爲他自己的決定感到很難過，請您務必盡力幫助他。」

但他到洛桑後沒有找到教師的工作，又回到日內瓦。1544年的一天，他出現在牧師、傳道人和其他人一起的下午聚會上。加爾文正在講解保羅的話「……在凡事上證明我們是神的僕人……。」[註：哥林多後書6：4]

卡斯梯裡奧突然站了起來，打斷加爾文，用嘲諷的口吻說：「你們這些日內瓦的牧師可不像保羅，你們總是隨心所欲，喜怒無常，生活放蕩，把你們的時間浪費在荒宴之中。」加爾文沒有回答，他控制住自己，合上聖經離開了。

小議會決定由他們來處理這次公開侮辱牧師的事件。他們下令卡斯梯裡奧離開日內瓦。他走的時候加爾文和其他牧師們還是給他寫了推薦信，他們雖然不同意他成爲牧師，但仍推薦他爲學者。但他卻滿懷對加爾文的仇恨離開日內瓦，並因著此仇恨後來出版了一本譴責索維塔斯火刑一案的書。

第二位向加爾文挑戰的敵人是皮埃爾·阿莫克司，他妻子是日內瓦城裡赫赫有名的放蕩自由派，公開與多人姘居。但小議會在皮埃爾的離婚案上拖著遲遲不辦理。最後離婚被批准，那個女人被判6個月刑，但他因離婚案的拖延而非常惱火。另一件事讓他惱火的事是他的生意：他是做賭博牌具的，因爲加爾文回到日內瓦後強調法律應該付諸實踐，他的生意大不如前。一天晚上阿莫克司請了四位朋友到他家喝酒。幾杯下肚，他開始攻擊加農街上的法國牧師和其他人。他大發牢騷，那幾個朋友也不斷點頭表示贊同。後來這幾個兩面朋友又去議會告發他。這在當時是觸

犯法律的，而他本人就是議員，結果他被捕入獄待判，加爾文要求將此事公開處理，以作警告。但小議會決定讓他私下道謙了事。

這一決定使加爾文非常生氣，因為全城的人都知道這件事。當時，類似的過犯都被處以公開羞辱的處罰，但他卻能以關起門來道謙了事。

加爾文在牧師們的支持下要求公開處罰這個毀謗教會、侮辱牧師的人。

加爾文的敵人們看到這是一個鬧事的好機會。很快，牢騷聲、威脅聲漸漸響了起來，人們擦起他們的火槍來，阿莫克司住的聖熱爾韋區最為混亂。為了防止人們鬧事，小議會議員們一起走到河對岸的聖熱爾韋廣場維持秩序，廣場上甚至豎起了行刑架以示警告。

很快小議會重新通過了判決：被告皮埃爾·阿莫克司因為侮辱神、誹謗議會、誹謗加爾文牧師的罪，本議會宣佈判處遊街示眾。「你剃光頭髮，手持蠟炬，先跪在市議會廳前大聲承認自己侮辱了神，誹謗真理，聲稱加爾文牧師傳異端，然後遊街到城裡的三個公共廣場作同樣的認罪，以此示眾」。

1546年4月15日，皮埃爾·阿莫克司按市議會的判決被遊街。懷着好奇心的人們紛紛圍觀，人們很快認識到加爾文真的要求議會執行法律。窮人為此很高興，錢財、地位哪怕是議員的地位也不允許任何人凌駕於法律之上。但對那些有錢有勢的放蕩派來說，這可不是件好事，他們對加爾文要把紀律帶到這個腐敗的城市來恨之入骨，他們恨他也因為他是個外國人。他們明裡、暗裡要與加爾文決一死戰，他們支持每一個挑戰加爾文的人，外來的敵人來了又去了，但這些自由派整整經過了十四年才被擊敗。

放蕩派中叫法爾夫的那家尤其痛恨加爾文。這是一家極富有而放蕩的豪門，父親弗朗科索瓦已經幾次三番被證實犯了姦淫罪。他說他真希望自己是小議會的行政長官，那他就可以把日內瓦帶回到無拘無束的老日子中去。他兒子加斯帕爾也因行為不檢點坐過監，出獄後，他故意糾集了一群狐朋狗黨到加爾文正在講道的教堂外大聲喧嘩地玩遊戲。另一個兒子叫約翰，有一次竟在自己的婚禮上應當莊嚴宣誓說「我願意」的時候，捉弄人地搖搖頭。他們家最糟的要數滿嘴髒話、藐視一切權威的女兒弗朗塞斯卡，她嫁給了市議員兼日內瓦軍隊的首領阿米·培林。

1546年三月，就在阿莫克司公開認錯之前，弗朗塞斯卡與丈夫在行政長官科納

的婚宴上當眾跳起舞來，早在加爾文來到日內瓦之前，城市的法律上就規定不准跳舞。現在，在教會的催促下，各項法律都要實施。

事後，科納在小議會裡爲此事作了誠意的道謙。但當弗朗塞斯卡被叫到小議會來時，她暴跳如雷，對著議員們破口大罵「你們這群蠢豬，無恥的騙子……」法警只好把她拖了出去，她丈夫培林突然想起要去里昂辦件事，而暫時逃脫了懲罰，弗朗塞斯卡被關了幾天後，女看守放了她。

她對加爾文恨之入骨，威脅著說「走著瞧吧，總有一天再把你踢出去」

加爾文幾次試著與法爾夫家處好關係，特別是與培林。當年他曾是日內瓦派到斯特拉堡去請加爾文回來的特使之一。可他熱衷於放蕩的生活，即使如此，要不是他老婆那可怕的怒火催逼著，他還是可能被說服的。加爾文給培林寫了一封堅定然而又不乏忠告的信：「我回日內瓦來既不是來過休閒生活，也不是來圖什麼好處，即使再次被逐，我也不會感到傷心……，我回來是爲了教會與城市的安全……我至死也不會改變初衷。」他催促培林要認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也勸告培林，願神向你顯明來自忠誠朋友的，哪怕是鞭子也比虛偽之徒的恭維之詞更寶貴。」

培林和他岳父一家的怒火在繼續燃燒。此外，還有兩位站出來與培林一起做放蕩派的領袖。一位叫菲利貝爾·貝爾特利耶，父親是有名的愛國英雄，爲日內瓦的自由戰死。菲力貝爾可不像他父親，他華而不實，然而又剛恢自用。另一位叫皮埃爾·旺代爾。他最喜歡的就是穿金戴銀在公共場合被人羨慕、受人伺候，他也曾因放蕩和污蔑教會入過幾次獄。此三人帶領日內瓦的所謂抵抗勢力要與加爾文正在建立起來的秩序和清潔生活決一死戰，他們不放過任何機會與加爾文鬥。

1547年發生過一場「馬褲」事件：一年一度的射靶節遊行到了，培林想讓他的部下穿上極不端莊的緊身開衩的馬褲遊行。他向大議會提出此要求，他認爲小議會會阻撓他。加爾文在會上指出，他反對的並不是馬褲，而是要指出這種花哨衣著與奢侈生活不是一個好趨勢。大議會否決了培林的要求。沒有那套開叉時裝，他不願和部下一起遊行。於是，這位加爾文稱之爲「我們的喜劇凱撒」的培林突然踏上了旅途。培林雖然在馬褲事件上敗下陣來，但他和那些放蕩派與加爾文之間沒個完。這位加爾文稱之爲「我們的喜劇凱撒」阿米·培林突然踏上旅途，他不願和部下們一起遊行。

第三十二章

日內瓦的不滿之情像片陰燃之火，等待風向再次暴發出熊熊火焰。教會在城裡各處的監督工作做得很好，十二位長老在各自所住的區內留心觀察，監視不法行爲。每個禮拜四早上，違法者被叫到小議會來受審。有人不參加主日敬拜、聽道，躲在家裡打牌；有人在教會裡大聲說笑，喧鬧影響教會秩序；有人聽到驢叫，嘲笑說，它在唱讚美詩呢，此人被罰趕出城外三個月。其他還有醉酒、偷竊、打架鬥毆、姦淫放蕩等等犯法之行。

要把這座素來以邪惡、放蕩著名的城市轉變成為神子民的教會，的確是任重道遠。議會作決定時常常前怕虎後怕狼，經常是加爾文和其他牧師們站出來，按照神的話敦促、批評並譴責，並且告訴大家什麼樣的城市和教會才是合乎上帝話語的。

有一陣子小酒店紛紛關門，餐館改成了「雅培」，每家都有一本打開著的法文聖經，吃飯前客人必須謝飯，否則不予接待，晚上9點即關門。

1547年7月，弗朗塞斯卡又與教會發生衝突，她因爲不檢點被牧師們召來，她對著阿貝爾·樸平牧師破口大罵。還未等議會宣佈懲罰，她逃出了日內瓦。出城時她在一條小街上看到樸平牧師走在前面，她策馬向他衝去，企圖撞倒他。馬從牧師旁擦身而過，她掉過頭，扔出一大堆惡語，飛奔而去。

第二天聖皮埃爾的講台上出現一封匿名信，所用的語言是本地很少有人知道的薩佛依語，「你這個大肚子[波平的名字含矮胖的意思]，你和你的同僚們若能閉上嘴會對你們有好處……你若逼人太盛，你會後悔的……你聽好了，到時別怪我不客氣」。能說、寫薩佛依語的只有格呂埃，他曾是天主教教士，被懷疑涉及維勒特、法雷爾下毒案而開除神職，那還是加爾文來日內瓦之前的事。

格呂埃獨居在一幢房子裡，他的不道德生活也是出了名的。議會對他住處搜查，發現一些他寫的污蔑教會、誹謗國家（即日內瓦）的信件與文章，有些內容明顯地犯了叛國罪。在當時的刑法之下，他承認了那些匿名信是他寫的。議會以多數通過了判決，砍頭示眾。按照當時的法律，這是公正的懲罰。三年後，有人從他屋裡牆縫裡發現一篇二十四頁的文章，其中包括對基督的輕蔑，說他是「無能之輩」；對童女馬利亞的子羞辱，說她是妓女；還把使徒們嘲諷是「一夥流氓」。事實上，

加爾文與格呂埃事件毫無關係，但人們仍因為加爾文的改革，把此事歸在他頭上。

1547年12月，日內瓦大議會召開會議，加爾文在往市政廳去的路上聽到吵鬧聲。走近一看才發現是一些議員手裡揮舞著劍，爭得面紅耳赤。加爾文跑過去喊道「你們若真要動刀，就從我開始！」後來加爾文在他的信上寫道：「朋友們把我拉了出來，生怕我受傷」，剛才還怒氣沖沖的議員們連驚帶羞地走進議會室。加爾文對他們作了一篇長長的、誠懇的講話，但他也知道，光憑講話是沒有什麼作用的，有時就像是對牛彈琴。沮喪、失望的加爾文寫信給維勒特：「他們的邪惡竟達到如此地步，我簡直就想放棄這個教會了，真的，我真的垮了，除非神向我伸出手」在給法勒爾的信上說「願神垂聽你為我們不停的禱告」。

培林及其同黨高興地按捺不住。1549年春，更多的放蕩派被選進了議會，他們在大議會裡已經能與支持加爾文的議員相抗衡。他們雖在小議會尚未佔上風，但也已有相當的勢力，培林自己也當選為行政長官，可謂是春風得意。

放蕩派的膽子越來越大，加爾文走在街上，包圍他的是侮辱和嘲笑，甚至孩子們也惡語相加。有人把加爾文的名字中抽出4個字母，組成「該隱」一詞詆毀他，有人把自己的狗叫「加爾文」。一次，一群無禮之徒在橋上遇見他，甚至想把他擠下橋去，下面是冰流的羅納河，這情景就像1538年他被逐出日內瓦一樣。

這年春天正是依多萊特病重，去世的那段時間，放蕩派對加爾文的仇恨達到了新高潮。加爾文受到各方面的攻擊，更不用說愛妻的去世。正如他信上所述：「請相信我，我滅亡了，除非神向我伸出他的手」。

這時又出現了兩人新的敵人，倆人都曾是天主教隱修士。他們從神學上攻擊加爾文，放蕩派也樂得看好戲。先是1551年來日內瓦的博爾賽。他已脫下修士的蒙頭斗篷，變成了江湖郎中，並自詡為神學家。雖然他不和加爾文當面衝突，但在別人面前批評加爾文的神學。

一個禮拜五下午，附近鎮上來的牧師講完道後，留下時間讓聽眾討論。博爾賽站起來譴責揀選的教義。他說這一教義純粹是「胡說八道，荒唐可笑」，你們把上帝變化了暴君，若上帝在創世之前就決定了一切，那麼他就要對罪負責。那個教你們這些東西的加爾文是個騙子，你們跟隨他是瘋了。

正巧這時加爾文進來，他站在後面聽著博爾賽慷慨激昂的長篇大論，然後出乎

他意料地走上前去，駁斥博爾賽，捍衛揀選的教義。加爾文以他驚人的記憶力，引述聖經中所有關於揀選的教導以及教會先父們如奧古斯汀的教導。以聖經進行辯論，誰能在加爾文面站立得住？小議會對博爾塞下了逐客令。

博爾賽老年時寫了一本關於加爾文的書。敵人所寫的關於加爾文的所有書中，這本可能是最惡毒的，裡面充滿了謊言、指責和作者的想像力。

1552年，小議會召開專門會議，聽取關於神揀選的辯論。這次加爾文的對手是土生土長的特羅利耶，他也曾作過獨身隱修士，現在與放蕩派為伍，反對加爾文，說他可以證明加爾文的《基督教信仰綱要》是使神成為罪的源頭，指責加爾文在日內瓦教會教導錯謬。

這是件引人注目的事，拖的時間也很長。法雷爾和維勒特也到日內瓦來與加爾文站在一起。議會的記錄上這樣寫道：「在聽了雙方的發言後……小議會通過了決議：《基督教信仰綱要》是部偉大作品，是聖潔的，加爾文的教義是神的教義。」但小議會也宣佈特羅利耶是個好人、好公民，此事不了了之。

敵人不單單在街上，也在議會裡。加農街上的牧師撐著他那本應安靜休息的身體，在種種試煉中爭戰。他的哮喘發展成了胸膜炎，這個在講道、講課、議會裡、家裡講話的人，因為呼吸困難不得不花力氣說出每一個字。嚴重的痔瘡使他坐臥不寧。腎結石那尖刀般的疼痛不停地折磨著他。假若痔瘡尚能忍受，他會騎上馬狂奔，試圖癩碎結石以便於排出，當時是沒有手術的。頭痛病從來未離開過他，有時痛得他眼睛幾乎看不見東西，整夜不眠。大多數的時候他一天只吃一餐。消化不良、痙攣、感冒則是家常便飯。

在遭恐嚇、侮辱、挑釁的年頭裡，這個遭敵人圍攻的病人沒有能看到前面的勝利。但是因著傳講神的話，教導基要真理和實施紀律漸漸地深入許多日內瓦的人心，世風開始改變。這些人不像與加爾文明鬥的放蕩派那樣發出聲音，但他們開始看到加爾文走的路，看到神的道，也看到加爾文所過的樸素、嚴肅的生活，一如他所信仰的那樣專一。

這種生活遠比培林和他那潑婦般的老婆他們所走的驕傲、放蕩之路要好。甚至在放蕩派具有勢力的大、小議會裡，略過半數的人知道，為了日內瓦的利害關係加爾文須留在日內瓦。儘管這些人也加入責問加爾文的行列，拒絕他的要求，他們有

時也幫助他排除障礙。他們促使他發怒，但他們知道不能沒有他，原因是因為這個人那種純粹的誠實，他那堅強有力的個性，他那顆才華橫溢的頭腦，在此一切之上，是他對他的主、對他主的話絕對的獻身。日內瓦，不，不僅是日內瓦，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他這樣的人。無論放蕩派興起多大的風浪，日內瓦議會再也不會叫加爾文離開他們的城市。

然而，在這些微弱的勝利前面，是一場最大的爭戰。

第三十三章

日內瓦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有個人被處以火刑。

奇怪的是，此人因異端被焚燒過兩次。四個月之前他被羅馬教廷處以火刑，但教皇手下的人不夠仔細，他越獄逃跑了。憤怒之下，他們做了個假人，裡面塞滿了他最新寫的書，剩下的這個人只好由抗羅宗的日內瓦來燒死他。

這個被燒兩次的異端分子是個西班牙人，名叫邁克爾·捨維塔斯。他早年的經歷頗似加爾文，父親是公證人，哥哥是神父，自己是學法律的，跟隨羅馬教會。像加爾文一樣，在法律系做學業生時，他以母語學習聖經，十八歲那年，他轉信了二十五年後使他走上火刑架的東西。

捨維塔斯說，神不是三位，那樣神就成了三頭怪物。這個西班牙人說：「在整本聖經裡找不出一個三位一體的字，耶穌是人，不是神的兒子，聖靈也不具有獨立的位格，而是神差到世上的靈。」二十五歲那年，他將這些革命性的思想寫成書出版。從此以後，他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他的書第一次在斯特拉堡印刷，後來斯特拉堡和巴塞爾議會都禁止出售此書。抗羅宗領袖們都把他的書視其為褻瀆神的異教之物。路德，墨蘭頓、布捨、慈運理、布林格都公開予以譴責。捨維塔斯清楚地知道羅馬教會對他的這本書會說什麼。書出版之後，西班牙宗教審判團最高議會立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將作者逮捕帶回本國。命令上說，可以不惜任何方式，哄他、騙他、許諾他都可以，務必要抓到他。他們甚至派他做神父的哥哥去勸他回來。

怎麼辦呢？抗羅宗拒絕了他、禁了他的書。羅馬教庭要把他直接送上火刑架。他曾想到去美洲新大陸。但他用了比較容易的方法，改名叫米契爾·迪維蘭奴夫[他

出生地城市名]，隱名埋姓過了二十年。

二十二歲那年他去過巴黎，與轉信抗羅宗不久的加爾文相約見面。不知何故，捨維塔斯沒有在約好的地方露面，害得加爾文冒著生命危險在那裡空等他一場。

接下去的幾年裡，這位精力充沛、才華出眾的年輕人做了不少事情。他為里昂的一家出版社編輯了一本世界地理書。到巴黎學醫，他也許是世界上第一個發現肺部血液循環的人。他講授地理學、天文學，他報告了一次月球與火星的月蝕現象。他甚至還大膽地以觀天象來預測起個人與國家的命運來。為了此事以及他侮辱一名教授的事，他被傳到法國議會受審。他的雄辯天才使他得以脫身，只是他寫的天文學書籍被查禁，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誰。

他在里昂附近的法國小鎮維耶納平靜地住了十二年。一面做編輯書刊，一面行醫。他是位模範天主教徒，也是主教的好朋友，可是主教做夢都沒有想到，此人認為教皇是「獸類中最殘暴、最卑鄙的」。

在假面具下生活的捨維塔斯此時正忙著寫另一本書，約翰·加爾文把他的名著稱為《基督教信仰要義》，為的是要重新建立真正的基督教會，捨維塔斯把他寫的叫作《基督教信仰恢復》為的是要催毀基督教會[註：引自雪佛的《教會歷史第八冊》]

1546到1547年間，35歲的捨維塔斯與加爾文通信。一開始，加爾文禮貌地回了信，並寄上一本《基督教信仰要義》。不久捨維塔斯將書退回，上面塗了多處侮辱性的評論。他先後給加爾文寫了30封長信，這些信的口氣既驕傲又尖銳。他也寄去了一本尚未出版的《恢復》，但加爾文覺得這樣爭論下去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他不再與捨氏通信。在給法勒爾的信上寫道：「捨維塔斯又給我寫了一封長信並寄來一本他的狂妄之語，假如我答應，他會來日內瓦，但我決不會答應他。假使他真的來，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決不會讓他活著離開這裡。」但是，加爾文並沒有向維耶納的羅馬教會當局告發捨維塔斯。

六年之後，《恢復》一書在維耶納郊外秘密地印刷出來。印刷人是一對姻親兄弟，都曾在日內瓦住過。他倆一位是放蕩派，另一位則喜歡加爾文的思想，後者似乎不知道他的兄弟所答應要印刷的是本什麼書。捨維塔斯在書的封面上用了他名

字的縮寫「MSV」（即邁·捨·維）把自己寫給加爾文的30封信放在附錄裡。

這時候，五位剛從日內瓦接受培訓的年輕傳道人返回祖國法國去作宣教士。一入境便被認出而入獄，整個抗羅宗世界都極關注他們的命運。抗議書與信使從瑞士各地教會湧向法國，加爾文也寫了抗議書，並給那五位傳道人寫了一封極為安慰和鼓勵的信。他們五人被關了一年，1553年5月被捆在一起走上火刑。

捨氏的書出版時，這五位傳道人還關在監獄。日內瓦一位抗羅宗寫信給里昂的天主教表哥，他們之間的關係極為緊張，尤其是在此五位被捕的傳道人這件事上。天主教的表哥常常在信上譏笑抗羅宗的表弟，說日內瓦教會毫無紀律，亂作一團。這次，表弟有件特別的重要的消息要為訴表哥：

親愛的表哥，你不必再抱怨日內瓦教會沒有紀律。就在你們附近住著一個異端分子。他褻瀆三位一體神，並且剛剛出版了一本充滿異端的書。現在卻在你們中間--在紅衣主教的鼻子底下悠然自得，而你們的監獄裡卻關滿了無辜的人們。此異端分子就是那個西班牙人捨維塔斯，他住在維耶納，化名叫米契爾·迪維蘭奴夫。在那裡行醫，我把他剛出版的新書前四頁附上作證據。

表哥一打開信，馬上跑去官方報告。他們召來迪維蘭奴夫，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個忠誠的天主教徒。無奈之下，官方只好請那位表哥給日內瓦寫信要求進一步的證據。

表弟回信說：「我沒料到事情會到此地步，但既然你已經將私下告訴你的消息公開，那麼神若允許……就把這個污移骯髒而害人的寄生蟲從基督教裡清除出去。要得到直接證據，我必須去見加爾文，他有捨維塔斯的原信，就是那些附在書裡的信。

這位表弟是加爾文的好朋友，他與加爾文爭論了許久，請求說，若加爾文不答應，他會很尷尬。最後加爾文同意了。當時加爾文知道這些原信會讓天主教逮捕捨維塔斯嗎？加爾文後來否認了他有意參予出賣捨氏的事，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的話。無論這些信是出於什麼原故被使用的，它們成了證據。捨維塔斯卑躬屈膝地又哭又賴，矢口否認。但證據在那裡，他被投入監獄，等候審判。那是1553年4月。

監獄位於小山坡上，後院有個園子。因監獄裡沒有像樣的廁所，那些有地位的犯人可以獲准去園子裡方便。第三天清晨四點，捨氏穿上厚厚的衣服，戴上帽子，

再把睡衣套在外面。他向獄卒要了鑰匙去園子，沒有引起疑心。他脫下睡衣，跳上圍牆，爬上隔壁的房頂逃之夭夭了。晨曦中只有一位農婦看見一個人匆匆走出城門。

城裡瘋狂地大肆搜捕，但未抓到他。維耶納市法院通過了判決，火燒捨維塔斯的模擬像。

四個月後，真正的捨維塔斯出現在日內瓦。他住在一家叫金玫瑰的小旅店，請店主爲他安排渡船去湖對岸的蘇黎世。

那是一個禮拜天，人們全都上教堂。捨氏也來了，有人認出他來，告訴了加爾文。加爾文立即通知議會將他逮捕。因爲法律規定，檢舉人必須與被告一起入獄直到審查完畢，加爾文的秘書自願陪捨氏一起入獄，這樣不會擔誤他的工作。

日內瓦教會1553年8月13日的記錄中寫著：「邁克爾·捨維塔斯被幾位弟兄辯認出來，爲了使他的異端和褻瀆不再污染世界，對此頑固不化、不可救藥之輩，教會認爲，予以逮捕是合適的。」

捨維塔斯爲什麼到日內瓦來？他在法庭上說，是去意大利拿波裡行醫，路過此地。但是從維耶納到拿波裡的方向與日內瓦、蘇黎世是南轅北轍的呀。他好不容易逃出羅馬的火刑，爲什麼跑到日內瓦來呢？是不是那位替他印書的放蕩派告訴他說，加爾文在日內瓦遭遇麻煩？他是否知道加爾文的敵人們一直希望推倒加爾文？是的，他很可能知道這些，那麼他是否想要讓這些敵人來支持他？他是否想在日內瓦散佈他自己的教義？或許他只是路過，懷著好奇心而已？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加爾文起草了一份39條起訴捨氏的文件。開庭審查斷斷續續持續了二個半月，有時是他倆之間以拉丁文作書面辯論，有時是面對面的辯論。

日內瓦的放蕩派們很高興地站在了捨氏的一邊。小議會專案組主席是培林，另一位放蕩派領袖伯爾特利耶也是專案組官員。捨維塔斯與那個在維耶納法庭上卑躬屈膝、又哭又叫的捨維塔斯今判若兩人——現在他不但很驕傲，甚至對加爾文不肖一顧。他看上去胸有成竹，污蔑加爾文爲「罪犯、殺人犯、可憐蟲、騙子、愚蠢的東西……你難道以爲能以自己的狗叫聲來堵住法官的耳朵嗎」？似乎加爾文成了被告。

加爾文一步一步證明他對捨氏的控訴。兩人繼續辯論，不但捨氏的話裡充滿侮辱與蔑視，加爾文說話也是怒氣沖沖，措詞強烈。他的話象尖刀般鋒利，對這個恬不知恥地否認基督是神的異端分子充滿了怒火，此人驕傲地堅持說，人生來是清白無罪的，嬰兒不應受洗，是人自己，而不是上帝決定人的救贖。

正當各地成千名忠信的抗羅宗基督徒們被火刑燒死時，難道能讓此褻瀆異端者逍遙法外嗎？對捨維塔斯必須繩之以法，當時的法律明文規定，神聖羅馬帝國的法律上白紙黑字寫明：否認三位一體的刑罰是死刑。

第三十四章

但是，判決捨維塔斯的權力不在加爾文手裡，此權力完全在日內瓦小議會手裡。捨氏入獄的那段時間，正是加爾文對小議會影響力最小的那段時間，因為放蕩派與加爾文之間正為開除教籍的權力作殊死的搏鬥。那個放蕩派領袖伯爾特利耶被教會告知不准領聖餐，原因是他醉酒之後和一群同夥與一位牧師爭執，並追打他一直到他家門口。現在小議會竟無視教會的決定，越俎代庖地宣佈恢復伯爾特利耶領聖餐的資格。

放蕩派大權在手，他們準備好要向加爾文在此最重要的事上挑戰。這也是加爾文進行教會管理機制改革的中心所在。加爾文強烈抗議，以培林為首的小議會對加爾文的抗議不予理采。

九月分領聖餐的那個日主來臨，加爾文面對小議會的二十五位議員，聲音因激動而發顫地說：「我發誓，寧可死也不讓主的聖餐被玷污……我情願死一百次也決不讓這種嘲笑基督的可怕事情發生！」

第二天早上，加爾文站在聖皮埃爾的講台上，他並不知道在他離開之後，小議會以多數票通過不准伯爾特利耶明天去教堂的新決定。

這是加爾文一生中最具有戲劇性的一個時刻。在分聖餐之前，他對著下面黑壓壓的會眾說：「我求神加給我力量，垂聽我的禱告，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將按照我主清楚向我顯明的命令去做。若有人已被教會會議決定取消領聖餐的特權，假如他還膽敢靠近主的聖餐桌，我必在托付給我的崗位上堅立，予以禁止」。

這個身穿黑袍的病弱的人沿著旋轉樓梯從講台上走下來，站立在聖餐桌後面，

舉起雙手為餅和杯祝福。人們走向前來，加爾文用他那雙具有穿透力的眼睛注視著，等待著伯爾特利耶那大搖大擺的身影走上來。但他沒有出現。

加爾文不知道伯爾特利耶未出現的原因，他只知道自己已經公開地反對小議會的決議，他在等待著他們對他的審判。他回到加農街的家，準備下午的講道，這將是小議會再次下令趕走他之前，在聖皮埃爾的告別講道。放蕩派贏了---除此之外他還能相信什麼呢？他們會釋放捨維塔斯，讓他在日內瓦散佈那惡毒的教義，這就是結局，只有神知道這是為什麼。

下午講道的信息是保羅給以弗所長老們的臨別之言，這段經文幾乎就是為加爾文離別日內瓦所寫的：「……你們知道……自從我……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服侍主……眼中流淚……」講台上傳來顫抖的聲音，那雙骨瘦嶙峋的手緊緊地抓住講台的欄杆。「……如今我曉得，你們以後不得再見我的面了……你們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凶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註：使徒行傳20：18-35]

但是那手持銀杖的信使沒有到加農街來傳令加爾文離開日內瓦。

加爾文對此緩期執行很吃驚。他繼續著他的一切職責，繼續著捨維塔斯的案子。

捨維塔斯的情緒很不錯，牢裡的虱子與惡臭雖然可怕，但那個放蕩派的獄卒送來了好消息。捨氏等待著加爾文的敵人們擊敗他，自己的無罪出獄已指日可待。他甚至大膽地寫信給小議會說：「大人們，我要求嚴懲那個污陷我的人……他的財產應判給我作為賠償……將他也投入監獄直等到最後判決，不是他死就是我活」。有趣的是，連捨維塔斯自己都期待著此案的最終判決將是死刑，但他沒有料到死的將是他自己。

小議會不顧加爾文的反對，決定向日內瓦其它城市的教會、議會徵求意見。小議會在類似的事上也向他們徵求過意見，得到的回答都是「溫和處置」。若這次的回答也是「溫和處置」，他們打算釋放捨維塔斯。

但這次來自蘇黎世、伯恩、巴塞爾和雪佛豪森的回答出乎意料----事實上，對於放蕩派來說，是個震驚。沒有一個回答溫和的，一個議會接一個議會，一間教會接一間教會都譴責捨氏，指出他的褻瀆必須被制止，以免再傷害基督的教會。伯恩

說，他若在這裡，判決將是火刑。

最後一封回信於10月18日送到日內瓦。培林趕緊作了反應，他先是推說病了，不能參加作決定的會議，然後又建議將此事轉交二百人的大議會決定，因為那裡放蕩派的力量更強。但小議會不想讓自己的權力被忽視，不同意將此事交給大議會，判決捨維塔斯的時刻到了。

「根據你否認三位一體，反對嬰兒受洗，頑固地執意要以你那散發薰人臭氣的異端來污染世界的事實……本議會決定將你定罪，並作出如下的最終判決：判處邁克爾·捨維塔斯和你的所有書籍以火刑」。這就是日內瓦小議會的判決，這是一份以全票通過的判決，連自放蕩都投了贊成票，因為他們知道不能無視來自那四個城市的一致意見。加爾文一聽到判決，立即請求小議會將火刑改成砍頭，因後者稍有憐憫，但小議會迅速否決了他的請求。

捨氏在牢裡也聽到了判決，這個完全出乎意料的結果使他瘋了一般地嚎啕不止。幾個鐘頭後，他終於安靜下來，幾乎是謙卑下來，但他仍堅持自己所信的東西。加爾文去看他，捨維塔斯請求饒恕，加爾文回答他、勸告他，一如從前對他所做的：「相信我，我從未因為你冒犯了我而要追究你的責任，你是否記得十九年前我曾冒著生命危險在巴黎如期赴約，為的是想要把你贏回主裡來。後來，在你流亡的那些年間，我難道沒有一再寫信勸告你那當走之路，直到你開始恨惡我，只因為我堅定的態度冒犯了你……但是……你應當向你所褻瀆的永生神求饒恕……乞求與神的兒子、與那位救主和好。」

法雷爾也來到日內瓦，也為捨氏請求。但捨氏仍被處以火刑，不像那些抗羅宗烈士們那樣充滿喜樂地走上火刑架，臨死時他充滿害怕，但仍堅持自己所信的，毫無悔意。

1553年10月27日，捨維塔斯和他的書被一起捆在火刑架上，死於火焰之中。這座小山叫作謝佩爾，他死時42歲。

從此以後，這個人的名字就永遠地與加爾文的名字聯在一起。聯在一起的原因是因為火刑，但是加爾文是唯一請求對他不使用火刑的人。判處捨氏死刑的決定權不在加爾文手裡，也與他那強有力的影響無關。那是日內瓦小議會在瑞士眾姐妹城市的勸告之下所作的決定，這些事實常常被遺忘了。

但加爾文確實在捨氏的死上有份，他要求議會逮捕捨氏，他起訴了捨氏，他在小議會進行了多次的辯論，證明此人的異端威脅基督的教會。雖然在真正判決時加爾文沒有參加，他確是同意的。儘管他反對使用火刑，加爾文也曾寫過一本小冊子稱捨氏為「那個自取滅亡的……異端分子」並為處死捨氏辯護。

其他的抗羅宗領袖也都同意此死刑。個性溫和，一直傾向於和平、妥協的墨蘭頓寫信給加爾文說：「基督的教會會感激您……您的政府所作的處死這個褻瀆者的決定完全符合一切法律」。這是一個火刑的時代，是一個人們相信審判他人關於神的信仰是他們的責任的時代。

今天，在捨氏赴刑的山坡上立著一塊石碑，那是多年後跟隨加爾文的人們立的，上面用法文刻著下面這段文字：

我們----偉大的改教家加爾文的，尊敬他的、感激他的兒子們----否認接受他的這個錯誤。這是一個他那個年代的錯誤。根據福音的原則、宗教改革的精神，我們相信良心的自由。

我們特立此和好的紀念碑。

1903年10月27日。

從二十世紀的今天往回看，加爾文在處理捨維塔斯事件上與他同時代的人沒有兩樣，是件令人傷心的事。正是因為加爾文在他所寫的著作中，在他所行的許多事情上，遠遠超過了他的時代，指出了一條寬容與自由、政府與宗教分離，每個人應以自己的良心來信神的路，這才是令人傷心的原因。

然而，神如此偉大地使用象加爾文這樣滿有罪的僕人來建造他的教會，來影響他的世界。這，才是令人讚歎的真正神跡。

第三十五章

日內瓦的痛苦搏鬥快要結束了，剩下的那些騷亂只不過是一頭垂死動物的抽搐而已。放蕩派漸漸衰退，他們在捨氏和伯爾特利耶領聖餐的事上都失敗了，最主要的是他們完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1555年2月的選舉結果，四位支持加爾文改革的

人被選為行政長官和議員，加爾文來到的這個所多瑪正在被改變成上帝之城。

放蕩派決定作最後一搏。他們在來日內瓦落腳的法國難民一事上大作文章。多年來，數以千計的法國難民來到日內瓦，並成為這裡正直、良好的公民。放蕩派們高呼著要趕走那些外國人，他們煽動說「這些人要把我們賣給法國，日內瓦只屬於日內瓦」。他們無法攪起誠實的百姓，於是糾集起一夥流浪漢、小酒店酒保、烤麵包的、船夫、漁民等人，伯爾特利耶和培林安排眾人酒足飯飽之後，給他們下了命令。他們計劃在某天晚上9點等巡邏完畢之後，叫這群人到街上，見法國人就殺，並說是法國人先動的手。

夜色來臨，可這群烏合之眾內部先開始混合起來。這群從中午開始大吃大喝的人，眼前什麼都是模模糊糊的。他們開始執行起骯髒的勾當，但充其量不過是在街上搞出許多鬧聲，一個個醉薰薰、傻乎乎地在街上跌跌撞撞，蹣跚而行，即使是頭腦最清醒的，手持利劍卻仍然一無所獲。

加爾文後來提到此事件時寫道：「那晚上神自己……看顧那些難民，讓他們都沉睡夢鄉……無人離開他們的家。」

大、小議會終於忍無可忍。放蕩派被帶來審問，伯爾特利耶、旺代爾和其他鬧事的自由派一共七人被處死，培林和他老婆逃到伯恩去了。

歷經多年患難，日內瓦迎來了和平。當周圍的國家、地區被戰火與災難搞得動盪不安之際，這座湖邊的城市則穩步地走上她宗教改革世界之城的地位。因著加農街上那幢房子裡的主人，日內瓦成為全世界宗教改革的大本營。

論到這座城市，蘇格蘭偉大的改教家約翰·諾克斯這樣說：「這裡屹立著自從使徒時代以來地球上最完美的基督的學校」。諾克斯在日內瓦生活了三年，成為日內瓦公民，他在聖皮埃爾隔壁向英國難民講道。1559年，諾克斯返回蘇格蘭，將他的祖國改變成為長老會教會的搖籃。長老會是根據加爾文所教導、所設立的教會管理機制的教會系統。法雷爾是另一位有話要對日內瓦說的：「寧可最後一個到日內瓦來，也不要第一個去其它地方」，這位紅鬍子的改革者當然記得從前的日子。

從極度邪惡到全然敬虔--這座宗教改革之城法律嚴明、條款細緻----除此以外，別無他路。這裡有保護人們的法律，也有懲罰人們的法律。加爾文通過他的影響使市議會通過了健康法，安全法，其中許多都是第一次出現在歐洲，下面是新法

律中的一部份：

不准在街上亂倒垃圾、糞便

屋內無煙囪不准點

陽台上必須做欄杆，以免小孩跌落

哺乳的母親不得帶嬰兒同睡以免悶死孩子

未經警察許可，屋主不得隨便出租房子

夜晚巡邏的人必須忠於職守

商人必須誠實經商，不得隨意抬價

日內瓦不召任何用納稅人的錢支付的士兵為任何國家或國王服務

每當選舉日來臨，聖皮埃爾的牧師一定會講一篇道，闡述公民有責任選舉敬虔之人，被選舉上的必須以上帝的法則，為上帝而統治百姓。

聖皮埃爾的牧師也是律師、外交家以及諸多事情上的專家。議會越來越多地轉向他求教，他也一直注意著城裡所發生的一切。為什麼不是呢？難道世上萬事萬物的研究、應用不都是為了榮耀神的名嗎？因此，第一位來到日內瓦開業的牙醫被送去見加爾文。加爾文用自己的口測試牙醫的技術，然後才推薦給他發照。有人畫了幅畫作為日內瓦與伯恩簽定聯盟的贈禮，議會請加爾文作藝術評論。有人發明了室內節能取暖的方法，議會問：加爾文以為如何？

與伯恩之間的聯盟協議快到了重續的時候，。儘管波恩不喜歡加爾文，日內瓦還是指派他作全權代表參加談判。這是件敏感的事，因為伯恩老是想在日內瓦的事上插一手，但如今一份雙方完全平等的聯盟條約首次正式簽字、加封。然而，從事這一切的這個人甚至還不是日內瓦公民。這怎麼可能呢？他本來早就可以是，但他從未主動要求過，免得有人以為他想要擁有權力。數以千計的難民們提出申請後都獲得公民權，然而這個被全歐洲稱為「日內瓦人」的加爾文，在這個他使之揚名的城裡仍然是個寄居者。

在加爾文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的書源源不斷地從印刷廠流出。他留給世界96捲著作，秘書將他講課時的內容記錄下來，經他編輯後成為聖經註釋。他的聖經註釋包括除了9卷舊約和新約《啟示錄》之外的所有聖經。他的筆從未停過，他也讓

好幾位秘書沒有閒著。一封書信接著另一封書信，那些被保存下來的書信裝訂成35冊。因著秘書們的忠心，加爾文的2000次講道內容也被保存下來。

現在，日內瓦教會知道了什麼是和平，什麼叫長進。牧師、傳道人達到18名。教會會議在教會的事務上真正有了權威，包括開除教籍的權力。

還有音樂。每當聽到日內瓦人唱起讚美詩歌時，怎能不叫人激動？17年來，他們擁有一位教唱的老師，他就是法國老師路易·布儒瓦，他不僅教兒童也教成人唱《詩篇》，他也是將《詩篇》列入教會告示欄的第一人。1562年《日內瓦讚美詩歌集》出版了，其中的許多曲子是布儒瓦作的，歌詞則是馬洛特和伯撒寫的，加爾文是這項工作老的導師。在這本1562的《詩歌集》裡，他留給了世界又一件珍寶。

在這些最後的年頭裡，最榮耀的是日內瓦大學的創立。這是世界上第一所抗羅宗大學，這也是加爾文多年來的夢想。他堅信上帝要他的僕人們接受良好的教育與培訓，成爲一批傑出的人材，尤其是傳道人，同時也包括政府官員、醫生、律師和各行各業的人們。

日內瓦能有一所這樣的大學嗎？這座湖邊的城市裡沒有王侯公爵、紅衣主教以他們的大名，捐贈巨款來建一所學校。如今的日內瓦人口已超過二萬，但三分之一是身無分文來到日內瓦的難民。出乎整個歐洲的意料，日內瓦竟然開始籌建起一所大學！每一位公民都爲此作出了犧牲，都與此有份。一位烤麵包師傅的窮妻子只能貢獻五個銅板，但一位富有的印刷商捐出一大筆補上了她的不足。就這樣，一步一步、一家一家地行動起來。律師們忙著替人寫遺囑，不忘爲他們的大學獻上一份。

離聖皮埃爾不遠的一座小山坡上，東南風迎面吹來。一根木頭加一根木頭，學校在這裡一點一點蓋了起來。加爾文常常拖著病重的身子到現場觀看。他被沼澤地蚊子叮咬後染上瘧疾，病倒已有數月。事實上，他再也沒有從這次瘧疾的高燒中完全恢復過來，但他一定要看著學校建起，夢想成真。

或許那是他的主意，在花崗石柱廊上方的正門上，要用三種文字用刻上：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舊約希伯來文〔箴言1：7〕

基督已經爲我們成爲神的智慧

--新約希臘文〔哥林多前書1：29〕

從上面來的智慧全然純潔、和平，充滿恩典、憐憫

--學者

們用的拉丁文〔雅各書3：17〕

今天你去日內瓦，仍可見到當年大部分的建築仍然屹立在那裡，兩邊加上了附翼。現在是一所中學，中間那部分仍然是當年加爾文在此走動、在此教導年青人的樣子。前院是一間當年的教室，裡面暗暗的。今天孩子們戲稱為「那間牢房」，因為期終大考都在這進行。

一所沒有教授的大學能算大學嗎？一個沒有最出色的教職班子稱得上是一個教職班子嗎？加爾文寫信去巴黎和歐洲各地，邀請抗羅宗的傑出學者們來此任教。正好此時洛桑大學的教授們與伯恩發生爭執，伯撒、維勒特和幾個同事決定離開洛桑大學到日內瓦大學來。伯撒被任命為校長，加爾文成為兼職教授之一。事實上，教職班子在建築物完工之前已經就位。

1559年6月5日，克萊芒斯大鐘的鐘聲伴隨著嘹亮的號聲，將人們召集到聖皮埃爾。日內瓦大學開學典禮隆重開幕。小議會秘書高聲喧讀了日內瓦大學校規。校規也是加爾文寫的。教授們被一一任命，學生們宣誓效忠於宗教改革的信仰。40歲的校長西爾多·伯撒以拉丁文作了優雅的演講。夢想成真的加爾文，像往常一樣用法文作了簡短的講話，並以禱告結束大會。那天，一定是他美好的一天。

更叫全歐洲吃驚的是，學校一下子就有九百名新生入學！他們來自歐洲各地，最多的是法國。有些學生本科畢業後，留下繼續在神學、醫學、法學上深造。

學校的畢業生們成了出色的學者。「日內瓦大學的小伙子們說起話來一點兒也不比索邦的博士們遜色」----這就是他們的聲譽。但他們不僅僅是學者而已，他們是基督徒學者，是世界上第一所抗羅宗基督教大學的畢業生。

此後的許多年裡，許許多多的名人都以自己是日內瓦大學校友而自豪。他們中間有卡斯帕·奧利維納斯，《海德堡要理問答》的作者之一，[註：此為抗羅宗著名的基督教信仰告白文件，成文於1563年]。

日內瓦成了宗教改革信仰的大本營。她有聞名世界的領袖，有忠實於神的話而井井有序的教會。整座城市都以言、行委身於改革宗信仰。現在又加上第一所訓練基督教學者的大學！牧師、宣教士們源源不斷地從此大本營裡走出，他們來到加爾

文的門前，請求差派他們到歐洲各地去。許多法國來的請求讓他們返回祖國，加爾文在給朋友的信上說「他們包圍了我的門，互相爭著要站個好位子……有時候我只好叫他們退後一點……我告訴他們說，在二十多個地方已經傳來宣教士被殺的消息，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擋他們」-一連法國皇帝也阻擋不了，他向日內瓦發出正式抗議，抱怨說從這個抗羅宗大本營出來的傳道人那麼多。

1559年是一個偉大的年頭。法國地下教會在巴黎舉行第一次大會。雖然人們爲了信仰被逼迫、遭殺害，法國的教會卻採用了加爾文設立的教會形式組織起來。加爾文以他的精神與書信參加了這次大會，這是他祖國的教會，他愛她，引導她，從遠方的大本營裡，他成爲她獻身的領袖。

6月正式開學的日內瓦大學多年後成了許多抗羅宗大學的楷模。

7月，加爾文渡過了50歲生日。儘管一身疾病，他環顧四周，從心裡感謝神在日內瓦所成就的工作，對於自己能從去年的瘧疾高燒中存活下來，他也充滿了感激之情。在那些病痛折磨的日子裡，他掙扎著完成了最後一版的《基督教信仰要義》，這是眾版本中最大的一版，有好幾次他以爲自己活不到完成此項工作。

神給了他時間。1559年8月，八十章巨著，洋詳四卷，從印刷廠出來。神真美好！他本不配，他根本沒想到神竟如此開恩，讓他完成此抗羅宗信仰的偉大作品，並在此後的幾百年裡向全世界說話。

1559年11月，一位議員提議，每次議會開會應請一位牧師來參加，給大家讀神的話，爲城市的各項事情禱告、祝福。此後，這成爲三個議會的光榮傳統。現在，神的話在講台上宣講，在大學裡教導，也在政府裡有其地位。

聖誕節那天，又多了一件讓人高興的事：小議會破例邀請加爾文成爲日內瓦公民。加爾文被深深地感動，一時都找不出詞來表達對他們的感謝。

但是，就在成爲日內瓦公民的同一天裡，他開始了劇烈的咳嗽，大量鮮血從口中吐出。醫生認爲是一條動脈血管暴裂，不知道這是晚期肺結核的症狀，加農街上的這個人在地上還剩四年半的時間。

第三十六章

走在卵石街上的這位身著黑袍的人，除了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之外，看上去更

像是死人。他的身體已經被各種疾病、過度的勞累消耗貽盡，但他那不可征服的精神仍然命令這具身體照常運作，那雙具有穿透力眼睛後面的頭腦，絲毫未喪失其敏銳性。

加爾文站在聖皮埃爾的講台上講道，在會議廳教神學，拖著自己的身體去大學的教室，回到家倒在床上後，秘書們圍在床邊，將那些從艱難呼吸之間吐出來的字句記錄下來，成為不斷發出去的信----特別是寫到法國去的信，在那裡抗羅宗與天主教之間即將爆發內戰。又一本聖經註釋編輯成文，又一篇關於有爭議教義的論文完稿。宣教士們被差派出去，各地教會不斷收到建議信、告誡信，一本接一本的書從印刷機下流出。

加爾文在給醫生的信中說：「這二十年來，頭痛從未離開過我。關節炎，痛風病使得四肢關節幾乎殘廢。腎結石太大排不出，給了我尖力般的疼痛。胸口象壓著鉛塊，每一口呼吸都必須付出努力」但是這個被疾病大軍圍攻的人沒有抱怨，他甚至以苦笑般的幽默給出差在外的伯撒寫信說：「你是在半夜之後才給我寫信，可我不得不七點就上床，混身患痛風的老人不就是如此嗎？」

1562年的一天，加爾文撐著走出城市。他自己家裡發生了姦淫罪，這已是第二次了，這個打擊太大、太令人羞恥了，他在加農街呆不下去。第一次是1557年，安東尼的妻子安娜與家裡的駝背僕人皮埃爾通姦被抓。後來又發現皮埃爾偷主人的東西已有三年了。安娜被逐出日內瓦，安東尼拿到了離婚證書，加農街上這幢房子裡再也不像從前那樣了。這次是依多萊特的女兒朱蒂絲。人人都以為她純結、敬虔，六年前幸福地嫁了人，如今站在教會會議前承認了姦淫罪。加爾文又氣又羞，掙扎著身子走到郊外安東尼的房子裡躲了幾天，然後回到加農街，回到他的工作崗位上去。朋友們來勸他停一下，休息幾天，他搖著頭說：「難道你想要主來的時候發現我在閒著嗎」？

1564年2月6日禮拜天，加爾文最後一次站在他所熟悉的聖皮埃爾講台上。他正在講福音書的相互合諧性，咳嗽突然爆發，這次他無法控制，熱血湧進口裡。他慢慢地、不情願地走下梯子。這篇道他沒有講完，會眾無聲地、焦慮地注視著他。

禮拜三，加爾文講了最後一次周間講道。講的是《列王記》。同一天下午在日內瓦大學他教了最後一堂課，教的是《以西結書》。離別的時候到了。他先去了市

議會廳，這裡是他多次來過的地方，曾在此被擊敗，曾在此獲勝利；有時被邀請而來，也有時不請自來。這次，他是被人扶著去的，時間是三月底。他想向小議會推薦一位新校長，伯撒將要接他的班。這次他不需要再爬三層樓梯，小議會特意用小碎石鋪起了一個斜坡。加爾文最後一次攀登上樓，兩邊的朋友扶著他。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穿過等候大廳，走進議會室的第一扇大門，門口坐著那位手持銀杖的信使。進門後是那條狹窄的走廊，一邊是陡峭的樓梯通到底層的監獄。這樣犯人可以被直接帶上來。過了第二扇門就是議會室，屋內有四扇窗戶，木雕的大桌子，牆角是那只火爐。

新校長被介紹、也被任命了。然後，加爾文手持帽子簡短地向小議會說了幾句話，他感謝他們對他生病期間的關懷，兩天前曾感覺稍好，但現在看來「我天然的身體已經不能再支撐我了」。秘書的筆蘸上墨水記錄下以下的話：「他克服極度的呼吸困難，以極其柔和的聲音說話。議員們紛紛淚下，這是他最後一次走進議會室」。

市政廳大門上刻著日內瓦的座右銘：**黑暗之後是光明**。加爾文比任何人都更使這句座右銘在萊蒙湖畔的這座城市成爲真實。

下一站是聖皮埃爾。

那是4月2日復活節主日，人們用椅子把加爾文從加農街抬到他曾在此講過無數次道的講台邊上。現在是伯撒講道。聖餐開始了，加爾文從伯撒手裡接過餅和杯，此時此地，他是否還記得被逐出日內瓦的那個復活節，他因著眾人的邪惡，拒絕分聖餐的那次？

會眾起立，唱最後一首詩歌。，合唱的歌聲充滿了尖頂之下的教堂，加爾文滿臉喜樂地唱著：「現在根據你的話，讓你的僕人可以平安地走了。」這是那首歌的名字。

在病床上最後一封信是寫給法國瑞尼公爵夫人的。信上向她再一次表示對她信心的確認，也催促她將外孫贏到抗羅宗信仰上來。最後一封拉丁文的信是寫給蘇黎世的改革家布林格的，向他報告法國、德國的最新消息。即使是在瀕死的床上，加爾文仍注視著世界，兩封信中都絲毫未提及死亡已經近在咫尺。死亡並不重要，重

要的是教會不可停止進步。

公證人被召來為加爾文立遺囑，倒並不是因為遺產太多需要公證，加爾文留下的最大的遺產不能以錢來計算。加爾文口述，公證人筆錄：「首先，我感謝神，他將我從黑暗坑裡提升到福音的光明之中……他對我如此憐憫，使用我、使用我的工作來……宣告他福音的真理……他將要向這個如此可憐的罪人顯明他是我的慈父。」

至於那點地上的財產：「那只朋友送的銀杯是愛的象徵，送給我親愛的弟弟安東尼。現金分給安東尼的孩子們。日內瓦大學10元，外國難民10元，同父異母妹妹瑪莉亞的女兒簡10元，安東尼的兒子每人40元，女兒每人30元，表弟大衛25元，因為他不夠成熟也不穩定。若仍有剩餘，也分給這些侄兒、侄女們，別忘了大衛，或許神開恩叫他謙卑，歸正」。

六名傳道人、一位教授簽了字，公證人朗讀一遍。

還有一點時間，可以對那些繼續教會，政府工作的人們說上最後幾句話。

4月30日，小議會全體議員列隊來到加農街11號，圍在床邊。加爾文再一次感謝他們的關懷與恩待，他請他們饒恕他在為他們服務的這些年裡所發的火，他所犯的其它罪。他勸說、警告也鼓勵他們說：「請永遠記住，唯有上帝才能賜給國家、城市力量。」他迫切地為議會，為日內瓦禱告，然後用右手與每一位握手告別。走出臥室的每一個人臉上流著淚，就好像是與一位父親道了永別一樣。

第二天來的是傳道人。不知怎的，加爾文竟能支撐著與他們說話，並且談了很久。他回憶起往事，他甚至都能感覺到那些對他不滿的人們唆使他們的狗在咬他的袍子，咬他的腿；他彷彿仍能聽到窗下連續幾十下的火槍發射聲，那是他被逐出日內瓦之前的事了。他又看見了市政廳前議員們幾乎打鬥起來的場面……他說「神召我去之後，你們還會有麻煩，你們要剛強壯膽，因為神要使用這個教會，維護這個教會，他也應許過會保護這個教會。」

「我的罪常讓我難過……我求你們饒恕我的惡，若我所做的有什麼善，那麼請以此為榜樣……。」「至於教義，我一直忠心地教導，神也賜我恩典讓我寫作……這是我盡了我的能力、盡了我的忠心所做的，我向此教義活，也向此死。請你們每一位務必要堅忍到底，彼此相愛、彼此扶持，沒有嫉妒。」

又一次握手道別，又一行淚流滿面的人走出加農街。

還有一封信要捎，還能是誰呢？當然是老朋友法雷爾。他說要來，加爾文想到他已上了年紀，不想讓他再勞累一趟：「再見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親愛的弟兄」，安東尼把這些話寫在紙上「既然神定意讓你留下，請記住我們的友誼，此友誼已使神的教會受益，它的果子也在天上等著我們，請不必勞駕來此。我呼吸困難，隨時都會停止，我為基督活，為基督死，足矣！無論生、死，基督自己就是屬他之人的獎賞，我將你和我的同工們交在神的手裡。」

——你的獻身的

約翰·加爾文

法雷爾還是來了。坐在這個二十八年他命令留下的人床邊，兩位朋友談著。然後，75歲的法雷爾走了，在與老朋友再見面之前，他又活了一年。

加爾文一直拖到5月27日。他不停地禱告，有時出聲，有時無聲，在劇痛中他常常呼叫：「主啊，還要多久？噢，主，你壓碎我，但我知道這是你的手。」

他在平安中死去，就像入睡一般，那是禮拜六晚上，那是一天的結束，一個禮拜的結束，一個生命的結束。一位偉大的僕人去了他主人那裡。

消息傳來，日內瓦的人們默默地聚在加農街上。小議會召開特會，秘書試著記下議員們的感情：『神以如此偉大而崇高的品格模鑄了他』。

教會的記錄本上，加爾文名字的對面，畫著一個十字架，下面寫著：「今年5月27日晚8時與9時之間，去了神那裡」。

禮拜天下午，長長的隊伍走向城外的日內瓦墓地。教授們、牧師們、議員們、公民們跟在那口松木棺材後面。只有踏在地上的腳步聲打破了主日的寂靜。加爾文在遺囑上要求：「我的遺體……按常例下葬，直等到復活之日。」墓地裡沒有他的墓碑，沒有墓名志。不久，日內瓦就無人知道加爾文的遺體下葬何處，至今也沒有人知道。

但那比墓碑更偉大的、活著的東西留下來。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日內瓦人的思想，他的著作強有力地活著。它們出自那活的道，它們延伸到了所有的基督教會。

通過它們，聖皮埃爾的傳道人一直在教導著、在模塑著基督的教會。他通過活著的男人、女人們說話。

這，就是約翰·加爾文---基督耶穌的偉大僕人。

這是一個活出他所說的下面這句名言的，謙卑的人：**榮耀單單歸於神！**

附錄

爲了幫助中文讀者更多地瞭解約翰·加爾文及其工作，特附上幾段評論文章。這些評論出自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甚至不同世界觀、不同神學觀的著名歷史學家、神學家和學者之筆。這些評論均摘譯自菲力浦·雪夫（Philips Schaff）的巨著，常被稱爲教會歷史百科全書的《基督教教會歷史》第八冊第三卷第八章。

一、加爾文與宗教改革家們（第八章第六十五部分）

約翰·加爾文是法國和法語瑞土地區改革宗教會的奠基人、組織者。他的思想影響了歐洲、北美的所有改革宗教會。

革命之後必有重建，加爾文是被上帝的護理之工所預定，以天才和良好教育所裝備，並以各種環境所準備的。沒有法雷爾，加爾文就不可能完成他的工作。因爲前者既不是神學家，也不是政治家，正如這位法國人在蘇黎世、在威登堡沒有他的位置一樣，瑞士人慈運理和德國人路德在法語區的瑞士也不會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每一位都在自己特殊的使命中，在特定的工場上完成無人可以比擬的工作。

加爾文比慈運理和路德具有更有利的條件，他可以在他們的基礎上建造。他不如前兩位那麼具有天賦，但他卻更具有能力。與他倆相比，他在行動上較遜色，卻在思想上、組織上比他倆更偉大。他倆在爭執中開採出石材，加爾文將其加工製成成品；他倆創出新思想，他將它們建造成爲一個系統。他的工作不是保羅而是亞波羅，他澆灌，神使之成長。

加爾文的個性不那麼吸引人，他的生活也不如前兩位那樣具有戲劇性，但他爲他的教會留下了更好的東西。他的名字永遠不會像路德、慈運理在他們四百週年誕

辰紀念時那樣引起大眾的熱情，也沒有人塑造大理石像、青銅像來紀念他。甚至他在日內瓦的下葬之處都無人知道。但他卻以他的一貫性，他的自制，以他的以聖經解釋聖經的、教義上的和辯論上的卓越成就超過他們。他曾經對並且還在對拉丁語系、盎格魯-撒克遜語系的基督教教會產生重大影響，是任何一位改教家所不可比擬的。

他使得小小的日內瓦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成爲抗羅宗的羅馬，成爲基督教有史以來最具良好紀律的教會。

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一種令人驚歎的例子，一個如此不具備吸引大眾的個性的人，竟然能擁有這般智力上的、品格上的力量，這麼強有力地控制他那時代和他以後各個時代的人們。以他的天性與興趣，他應該是個隱居的學者，但上帝的護理之工卻使他成爲眾基督教教會的組織者、統治者。

二、加爾文的歷史地位（第八章第六十六部分）

首先，加爾文是位神學家，是公認的基督教宗教改宗教義的系統神學領袖。與教會先父們象奧古斯汀，與教會學者如湯馬斯·阿奎那相比，他更具系統性，更爲有條不紊，難怪路德宗的神學王子墨蘭頓特別強調地稱他爲「那位真正的神學家」。

加爾文的神學立根於對聖經的透徹的知識，在所有改教家中，他是最具有以聖經解經能力的。他的聖經註釋被列爲古今以來最出色的解經書。因此，他的神學是以聖經爲本而不是學術上的，此神學具有對神的話的真理的滿腔熱誠與完全獻身。同時，他又是一位無懈可擊的邏輯學家、語言學家。

他具有一種極罕見的能力，來作清晰、有力，具有說服力的論證、說明。他建立起一整套教義，後人以他的名字命名。

加爾文主義比路德宗和阿米念主義更具邏輯性。羅馬天主教系統也同樣具有邏輯性，但無論是加爾文主義還是羅馬天主教系統都不是絕對邏輯性的。兩系統都至少在攸關重大的事請上令人高興地不具邏輯性：前者否認神是罪的源頭，不然的話就限制了神的全能；後者承認受洗的恩典不單單局限在羅馬天主教系統之內，此點打破了羅馬天主教自稱的絕對性。

加爾文主義神學建立在保羅書信中，對罪與恩典的深刻透徹的分析之上．．．．．。阿米念主義是對加爾文主義的一種反應，正如理性主義是對路德主義的反應一樣。

加爾文不像路德和墨蘭頓那樣多次地修改教義，前後也有矛盾。他從年輕時的信仰觀點一直到他生命結束，絲毫未改變過。他的《基督教信仰綱要》使得墨蘭頓的《羅格斯》和慈運理的《論宗教之真偽》失去光芒，《綱要》也從未被任何後來的神學書所超過。

加爾文的第二個位置是立法者與執行紀律者。他是教會新秩序的奠基人，此新秩序使抗羅宗教會協調起來、團結起來。一方面具有與羅馬天主教的強大組織結構抗衡的能力，另一方面又防止了宗派林立、互不信任的破壞性趨勢。

在此點上，我們可以將加爾文與教皇希爾德布蘭相比。他倆之間的最大差別是，鐵腕的希氏將他那個時代的羅馬天主教系統改革成嚴格的禁慾主義，建立了中世紀等級森嚴、排斥性的非婚神職人員體系；而加爾文則在社會法則的基礎上改革教會，建立起一個以眾信徒為祭司的民主化體系。前者強調教會的權力高於政府；後者強調基督的權威高於教會與政府。加爾文將屬靈的和屬世的力量聯合成為神的兩條臂膀，其前提是政府順服於基督的法律。英格蘭清教徒們依此原則於1620年建立起基督教社會系統，並推行了幾代人。十九世紀後，政府走向了宗教與非宗教的混合，越來越脫離任何教會信仰告白的原則。毫無疑問，加爾文一定會像他的現代跟隨者們在法國、瑞士、蘇格蘭、美國一樣，讓教會成為不受政府約束的、獨立的教會。

加爾文的道德和紀律原則反映出他的神學的嚴厲性。作為一個體系，它已經消失多年，但它那最美的果子仍然在加爾文主義和長老會教會系統中保持著純潔的、充滿活力的和高尚的道德性。以嚴厲的信仰告白與嚴格的律已相結合，加爾文成為歷史上最英勇的法國胡格諾派，荷蘭伯格派，英格蘭清教徒，蘇格蘭盟約者和美國新英格地區清教徒前輩移民之父。他們都以為了良心自由的原故可以犧牲世界上任何東西而聞名於世。

由加爾文的紀律所產生出來的此種精神從法國傳到荷蘭，從荷蘭延伸到蘇格蘭，並且以其一貫的抗羅宗自由的力量，在這些土地上延續。同樣是此精神，激勵

起最早期、貫穿於後期的英國清教徒們之中，密爾頓、歐文、巴克斯塔就是其中的一些典型人物。

此種精神武裝起了英國議會來對抗查理一世；激發起了克倫威爾將軍的輝煌勝利；更成為推動五月花號上清教徒移民先輩們的動力，將文明的種子第一次播種在西方那片新大陸上[即美國]。

加爾文的影響不僅僅限於宗教信仰上和道德規範上，它同樣影響到法國的文學、知識界。他在法國的語言、文字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正如路德在德文上一樣。

現代法文與法國文學是以加爾文以及同時代的拉比雷司（1483-1553）為分水嶺的。這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反映了法文的極端性。加爾文堅持極端的宗教信仰，拉比雷司具有超越眾人的智慧。一位在法國具有最高的神性；另一位在法國最具幽默感。一位是嚴肅的基督徒；另一位是伊壁鳩魯式的外邦人。一位代表了近乎暴君的鐵的紀律；另一位則以極度的自由而走向放蕩。加爾文創立了法國式的辯論與神學，以嚴肅的討論來達到教導人，使人信服；拉比雷司則建立起一個向人提供享樂的世俗系統。

下面的幾段是作者雪夫引自不同時代、不同觀點的幾位的評論，《教會歷史第八章後半部分》

歐奈斯特·雷南（1823-1892）

雷南是法國科學院院士，被譽為法國歷史學家的第一人。年青時他曾接受天主教神職人員的教育，後來對信仰產生懷疑。因此，他對加爾文的評論或許更令人吃驚。下面是雷南的「宗教歷史」第七版第337-367頁上的評論：

「加爾文是那種絕對的人，從一個單一的模子裡澆鑄出來。只需一眼就能看到他——從他的一封信或一件事上就可以來判斷他一慣的人。在他那不曲不撓的靈魂裡，沒有一個彎沒有一個折；從不知道什麼叫做懷疑或遲疑……對錢財、名聲、榮譽毫無興趣；不需任何修飾，生活簡樸，為人謙卑，為了使他人像他那樣，他可以犧牲一切……叫人無法理解的是，這樣一個無論從他生命還是他的寫作看上去如此

無同情心的人，竟能成爲他那時代如此重大運動的中心。他那張鋒利、嚴酷的嘴竟如此深遠地影響著那麼衆多的人。我們實在無法想像當年法國最高貴優雅、最得人心的瑞尼公爵夫人，在她那被全歐州智慧之花所包圍的弗拉拉宮庭裡，竟會被這樣一個嚴勵的人所俘虜，並通過他走上一條充滿荊棘的艱難道路，這種行爲唯有真正的信仰才能使其然。加爾文缺乏那種使路德成功的秘密：活潑的、深深的同情心與熱心，他也不具備弗朗西斯的魅力、冒險性與柔和動聽的話語。但他卻在那個基督教極需要行動的國家，比所有這些人都更成功，原因很簡單，因爲他是十六世紀最基督化的人。

荷蘭學者詹姆斯·阿米念（1560-1609） 阿米念主義的奠基人：

「除了學習聖經以外，我向我的學生們最極力地推薦的是學習加爾文的《聖經註釋》。我以爲它們寫得比海爾米契寫得更偉大〔偉大的荷蘭神學家1551-1608〕。因爲我確認，在解釋聖經上無人能望其背項。他的解經書應該比任何教會先父們傳給我們的都更爲有價值。因此，我承認他具有一種超過絕大部分，不，應該說是超過所有人的那種可以被稱之爲先知的靈，他寫的《基督教信仰綱要》也比《海德堡要理問答》包括更豐富、更精確的解釋」。

費利克斯·邦耐格（1814-1874） 日內瓦牧師，歷史學家

「讓我們不要將他所不會接受的稱讚加給他。唯有神是創造主。一個人之所以偉大，僅僅是因爲神看爲合適，來用此器皿完成偉大的工作。沒有一位偉大人物象加爾文那樣理解這一點。他總是不加思考、無需努力地將一切成就與榮耀完全歸給神。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加爾文曾經試圖將哪怕是成就中最小的一部分歸於他自己」。

馬丁·路德曾多次自滿地寫到，像他這樣一個可憐的修士竟能叫教皇顫抖，竟能如此攪動整個世界。加爾文永遠不會說這樣的話，即使是在他心靈的最深之處，他甚至從未看上去要說這樣的話。無論你從哪個角度來觀察、認識這個人，從最小的事到最大的事上，他永遠只有一種想法：神行萬事，萬事都出於他。你可以從這

一角度出發，再讀一點他寫的東西，哪怕是在你看來最驕傲、最帶權威口吻的那些字裡行間，你是否能找到任何證據，說他不是一位做工的、存一顆全然真誠之心的僕人，唯一的目的是爲了他的主人？……然而這個人，儘管犯有各種錯誤，卻成爲一個信心、敬虔、獻身與勇氣最美好的榜樣。

在今天的現代人的懶惰之中，再也找不到這種品格的人。因爲現在找不到一位像他這樣的人可以用使徒保羅所說的：「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見的主」[注希伯來書11：27]

西爾多·伯撒（1519-1605）日內瓦大學校長，日內瓦教會牧師，加爾文的接班人

「我與加爾文共同生活了十六年，可以爲他作見證。我認爲我完全有權說，在這個人身上展現了一個基督徒無論是活著還是死去的最美的榜樣，而這種榜樣招來誹謗的容易程度與人要去倣效的困難程度成正比」。

最後，讓我們來讀19世紀英國偉大的傳道人----被譽爲傳道王子的----司布真的一段話：

我所傳講的沒有什麼新奇，也並非新的教義。我最愛傳講的就是那些稱之爲「加爾文主義」的教義----正是基督耶穌所啓示的上帝的真理。

加爾文所傳講的，奧古斯丁汀傳講過，保羅傳講過，也就是我今天必須傳講的，不然我就是愧對自己的良心、愧對我的神了。我不能修改真理，我也

不知什麼叫作「去掉稜角」。約翰·諾克斯（john knox）的福音就是我的福音；那響徹蘇格蘭大地的，今天也必要再一次響徹英格蘭上空。阿們！阿們！

完